

#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 6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书号	202
号	119.6
军事学院军事资料室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六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

**第六辑**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9.5印张 192,000字

印数 000,001—150,000 册

书号：11310·3 定价：1.00元

内部发行

# 目 录

## 遵义会议专题资料

(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陈 云 ( 1 )

附：发表陈云同志《(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  
说明 .....编 者 ( 11 )

陈云同志对《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  
情况的调查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批复  
..... ( 13 )

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  
报告 .....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 16 )

附图：党中央、军委纵队进入扎西地区路线及宿  
营时间示意图

附录：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  
..... ( 35 )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  
经验教训决议大纲..... ( 55 )



张爱萍同志为遵义会议纪念馆书写的诗词二首

..... (59)

回忆录

我党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建 ..... 曾 三 (61)

庚申忆逝 (之一) ..... 张稼夫 (73)

回忆无锡秋收暴动 ..... 徐彬如 (141)

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经济组的活动  
..... 方卓芬 (148)

记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 ..... 勇龙桂 刘志诚 (166)

年 谱

罗荣桓年谱 (初稿) .....《罗荣桓传》编写组 (173)

## (乙) 遵义政治局 扩大会议\*

陈 云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召集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当着红军占领遵义以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行开幕，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会〕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会议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

（一）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如果今天来观察这个决定，我们应该批评这个决议

---

\* 这是一九三五年陈云同志向中央纵队传达遵义会议情况的提纲手稿的一部分。



只是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

## (二) 检阅反对敌人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的错误。

(A) 扩大会议认为四次围剿粉碎以后，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决议——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的决议是正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反对博古同志的报告——这个报告客观上是在说明不能胜利的保卫苏区来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是偏重于客观的——帝国主义对于国民党的帮助，白区反帝与革命运动不能与红军战斗配合，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与白区工作的极端薄弱等等——没有显著的把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到这些原因中的应有的高度。（当然在博古同志的报告中也说了主观的指挥上的错误，当然也不曾明显的把这个问题放在次要的地位。）这在客观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是企图掩盖指挥上的错误的，是不能得到教训的。

扩大会议认为我们没有胜利的保卫中区来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除了许多客观的而且重要的原因以外，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的。

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一切在苏区内部的后方工作是模范的，必须奖励的。但是正因为国内战争中军事指挥是党的总的政治路线的一个主要的部分；我们党正是由于军事指挥上在这个时期以及西征中是基本上错误的，因此在保卫苏区与顺利的粉碎五次围剿的意义上来说以及达到西征军预定的湘西目的地

来说是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

扩大会议认为蒋介石在五次围剿中没有完全成功，主力红军非但冲出重围，而且在川黔滇湘活跃着发展着。相反的在军事的力量上来说，经过五次围剿的一年半的血战，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是削弱了。

扩大会议认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决不是低落，相反的依然是发展的，几个苏区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的活跃，以及反帝与国民党统治下的全国经济的破产。中国苏维埃运动有着浓厚的历史的泉源，中国苏维埃运动与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B) 为什么说军事指挥上基本上是错误的？（把五次围剿起至西征到遵义分成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粉碎四次围剿以后到朋口战争及与十九路军订定作战协定以前。

这个时期，首先在东黄陂战争胜利以后（粉碎了四次围剿）因为当时对于胜利的估计不足，把红军主力停留在北线上一个短时期，以后向着闽江活动来开辟东战场是对的，朋口战争胜利了，这都是对的。这个时期一般的是指挥正确的，但是极大的错误没有集中主力，只有三军团与东线原有较弱的兵团与十九路军决战，如果那个时期，集中更多的力量，我们在东方战线上的胜利，必然远过于当时所获得的。

第二个时期——从与十九路军订立作战协定起，到十九路军的失败与敌人占领军事要点——黎川。

这个时期党中央决定与十九路军订立作战协定，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军事指挥上并没适应政治上的要求，当



时我们非但没有出建黎泰\*去侧击向延平前进的蒋军，反而把红军主力向着赣江活动，等到后来洛甫同志（他是军委的委员）知道而提出反对时，再把红军向东到永安沙县时，福建的人民政府的局面已经改变了。而使蒋介石把东方战线在自己的掌握组成积极的进攻苏区的战线。同时在个别指挥员的遗〔贻〕误之下失守黎川。

政治局扩大会认为这个时期，如果我们在军事上能够正确的指挥，那末我们完全有可能粉碎了五次围剿，国内形势将成另外一个局面，而有利于革命运动苏维埃运动的发展。

第三个时期——从十九路军失败以后的广昌战斗到主力红军出发西征时。

这一时期是五次围剿战争中最残酷的战斗的时期，敌人用最大兵力压迫我们于苏区内部，同时，我们严重的指挥上的错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不去尽力寻求运动战与敌人翼侧的活动而采取阵地式的与敌人堡垒对峙的战略战术，发明以“赤色堡垒”来抗阻敌人，在赤色堡垒与敌人堡垒对峙之下，用所谓有名〔的〕“短促突击”战术来作战：这个战术拒绝了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战术，放弃了外翼侧的活动。结果苏区边界上到处造了宫殿式的堡垒（当然不是说个别的必要地区的堡垒不是不要的），我们依靠这些堡垒和工事与敌人对抗。这个战术完全暴露我们的主力，完全在敌人面前暴露我们的弱点，使敌人的飞机大炮能够按照一定目标的配合步兵师团向我们进攻。结果，我们与敌人

---

\* 指建宁、黎川、泰宁——编者。

只是拚“消耗”(这[对]我们是不利的),许多赤色堡垒被毁于飞机大炮,一些被敌人占领来作为进攻苏区的军事据点。

“短促突击”的战术,使我们不能获得运动战中应能获得的胜利,(龙岗战斗)使我们在敌人的强大的火力之下受到极大的损失。在敌人以几倍于我们力量向我进攻时依然不得不退出赤色堡垒地带(建泰广昌\*)。“短促突击”在广昌战斗、三溪圩战斗、太阳嶂战斗、石城战斗,以及退出苏区时的许多战斗中红军的有生力量受到极大的损失。每次战役终是死伤二三千,三军团在一个短时期中全军团的老的连长完全死伤。即使在将要西征出发的前两天,军委的命令依然命令十三师在兴国城市死守。“短促突击”的结果,使一九三三年红五月直到一九三四年九月扩大来的十五万以上(将近廿万)的新战士,除去一部因为政治工作的薄弱、动员扩大[红军]时工作上的错误而使一部[的]减员以外,都在这个战术之下损失了。

第四个时期——开始西征起到黎平为止。这个时期是在指挥上组织上一般是错误的,已如前述不再重复。

总括以上四个时期来看,当时我们的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是基本上错误的。

(C) 右倾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

扩大会认为当时军事指挥上所采取的战略是单纯防御路线。这个战略之政治来源是由于对于敌人堡垒主义之我们可以战胜,没有信心。

这种单纯防御路线实际就在:

---

\* 指建安、泰宁、广昌——编者。



(a) 拒绝运动战与敌人的翼侧的活动。

(b) 企图以赤色堡垒的消耗战来保卫苏区。(把不失去一寸苏区土地的口号在战术上机械的运用)

(c) 敌人分六路进攻，我们也分兵抵御，这样就不仅居于被动地位。而且使我们主力不集中，各个战线上力量薄[弱]而处处受敌打击。

如果否认五次战争中敌人战略上的堡垒主义的特点，是错误的，但是诱敌深入的机会依然是有的，而且还不很少的，正因为我们采取的战术是敌人一出动——三里五里——即对敌进攻，这样使敌人更加小心而步步筑堡垒。在五次战争开始时敌人的堡垒还是十里一个十五里一个，因为我们的短促突击的结果，使敌人懂得在一里路的距离中筑上三五个堡垒。譬如：龙岗战斗，敌人才伸出五里路，我们即出击，暴露了红军主力所在，使敌人立即迅速的退回堡垒的据点，结果可以大胜的战斗，只能缴获一营敌人。这种类似的战役不能胜数，所有军团首长在扩大会上举出许多战役的例子是犯着这个错误，他们说“在这个战役中得到的军委命令，在出发以前，他们估计已经明知是劳而无功，但是只有服从命令。”即在退出苏区以前不久之东方战线上打击李延年纵队之温坊战斗是极大的胜利(俘获人枪千余)，但是这个胜利的获得，[正是]由于一军团首长不照军委命令——死守温坊来打击敌人——而自动的进行机动，从温坊退进苏区二十里路(可是他们恐军委的责备而两天两晚睡不着觉)，才能使敌人大胆前进，远离堡垒，而给以打击。至于后一时期只在分兵抵御，除了执行七军团之抗日先遣队北上外，其他在敌人翼侧后方的活

动，完全没有。

至于以赤色堡垒来对抗敌人的堡垒主义，这种“拚消耗”的战斗，谁都明白在今天我们所处的地位，运用了的时候是极端不利的。

分兵抵御的办法，不仅是我们完全居于被动地位，常被某一战线上的敌人佯攻吸引红军力量，而在其他战线上进行强攻，不仅是红军部队疲于奔跑，而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而且不合目前国内战争红军处于内线作战，必须集中主力——集中优势兵力去打击敌人的弱点——来各个击破敌人的分进合击的原则的。因为分兵抵御而不能集中主力，所以许多战役不能得到应有的胜利。就是温坊战斗以后，敌人的两个师迅速的增援——继续冒险前进——因为我们的其他军团没有集中，不曾取得继续的可能的胜利。

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

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 A、〔按：指李德，又用笔名华夫〕博、周三同志，而 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扩大会议指出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一切〔认为〕动摇，悲观，

失望的分子，与前进的布尔塞尔〔维〕克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扩大会议指出反对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时，必须坚决的反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

(D) 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

(一) 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 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 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 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扩大会中周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并决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同志的名字(华夫即A名，常用此名在军委刊物“革命与战争”上发表许多文章，特别是短促突击的文章。)在团以上的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

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在一切会议中对于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的〔是〕积极的拥护的。

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

**编者注：**文中疑为错字漏字或多余的字，均用〔 〕表示



(二)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为遵义会议之重要一环。毛泽东在会前曾向与会同志作报告，说明遵义会议之目的意义。(一) 决定整肃

查整肃中央组织使之更纯洁。这是遵义会议根据地内务之

(二) 检查在<sup>白区</sup>工作<sup>中</sup>之经验与教训。查白区工作

军伍队区以及政治工作局扩大会议即行结束。参加这个会议的

同志除政治局及候补委员外，一三年团的各军团长

及政治部主任林彪、彭德怀及五军团的<sup>各军团长</sup>政治主任及各副团长

加。会议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附：

## 发表陈云同志《(乙)遵义政治局 扩大会议》的说明

编 者

《(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是陈云同志为向中央纵队传达遵义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的手稿的一部分。手稿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威信到泸定桥的行军途中。现存中央档案馆。

这份传达手稿记述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历史情况。其中对遵义会议酝酿的过程、会议的主要内容，尤其是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手稿保留了许多尚未公布的历史资料，是一份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

研读《(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有助于加深我们对遵义会议伟大功绩的认识。这次会议认真检查了五次反“围剿”以来中央的军事路线，集中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决议取消原主管中央工作的三人团，结束了“左”倾错误对全党长达四年的统治，在危急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毛泽东同志在我党克服王明“左”倾错误的过程中有着卓越的贡献。他的正确主张在遵义会议上得到绝大多数与会同志的赞同。会议决议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中央军事指挥的领导工



作。从此，中国革命开始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在战争形势紧迫的情况下，没有详细地检讨政治路线。同时，大多数同志当时也还未认识中央政治路线的错误。因此，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这个结论对顺利解决当时迫在眉睫的军事路线问题，动员全党团结一致去克服长征中的困难，是必要的。

陈云同志传达手稿在内部发表，对弄清遵义会议的许多关键问题，帮助党史学界深入研究遵义会议，具有重大的意义。

# 陈云同志对《关于遵义政治局 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 报告》（征求意见稿） 的批复

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你们送来的《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已经看过了，现将报告中提出的尚未弄清楚的几个问题，尽我的记忆所及，回答如下：

一、关于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是否增补为书记处书记的问题，这个问题要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说起，六届四中全会没有设立书记处，也没有设常委，会后不久，王明去苏联，恩来同志去中央苏区，留在上海的中央领导成员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刘少奇以及卢福坦组成临时中央，博古为负责人。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卢福坦叛变，未去）。一九三四年初，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改选了政治局，毛主席、朱德、王稼祥、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等人被增选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刘少奇被增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但这次会议也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那么，为什么在有的历史文件中或一些同志的回忆中会出现书记处书

记、常委的名称呢？我想，这是由于当时中央虽然没有正式设书记处、常委，但有一个处理日常工作的领导核心，而这个核心的名称又不那么固定，不那么严格的缘故。所以，说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被增补为书记处书记也好，说他被增补为常委也好，只是表明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了党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核心。而不表明当时中央正式设有书记处和常委。

二、关于遵义会议前后，中央是否设有总书记职务？这个问题的答案和上面那个问题的答案有些类似，即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和博古虽然先后担任过党中央的负责人，但他们都没有总书记的称号。所以，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的工作，也只能是接替他在中央负总的责任，而不会是接替他任总书记。我记得，自从向忠发以后，我们党直到八大没有再设过总书记，不过，说博古和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后做过书记还是可以的。

三、关于董振堂同志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可以肯定地回答：没有参加。原因大概是，遵义会议是党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董振堂同志虽然是五军团的军团长，但在党内没有担负负责的职务。

四、关于通道会议的情况，这次会议我没有参加，因此不了解这次会议的情况，长征初期，我在五军团担任中央代表，而五军团担负的是长征队伍的后卫任务，距离中央所在的主力部队有几天的路程，在当时军情紧急的情况下，中央开会不能等后面的人都到齐是十分自然的。

另外，对报告中已考证清楚了五个问题，有些我虽然记不准确了，但我认为你们的根据是可靠的、充分的，



所以结论都是对的。

陈 云

八二、十二、廿八

**编者注：**

遵义会议的其他参加者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伍修权、李卓然等同志也审阅了《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征求意见稿），并作了批复。

# 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

(一九八三年二月)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下简称遵义会议），是我党的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但是由于对这次会议的一些重要情节长期未弄清楚，以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了“把党史资料立好，立准确”，我们对有关遵义会议的历史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现报告如下。

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除原有的遵义会议的决议——《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通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之外，在这次调查过程中，陈云同志还证实了《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他在长征途中所写的传达手稿（以下简称陈云同志手稿）。这份宝贵的历史文件为弄清楚遵义会议的真实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遗憾的是，会议的一些其他重要资料，如博古同志的报告，周恩来同志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发

言的文字记载尚未找到，有待于继续收集。

此次调查，在中央组织部、中央档案馆、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贵州省有关部门以及遵义会议纪念馆等单位的配合和协助下，经过反复核对考证，初步弄清了下几个问题。

### 一、遵义会议开会的时间

遵义会议决议上注明，该决议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但是，当年的有关资料证明，这个时间是不准确的。

从红军第一次占领遵义，以及中央领导同志进入遵义的时间来看：

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二十一时十分，军委电报通报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我二师今二时（按：七日晨二时）已袭占遵义”。同日二十三时，再次电告各军团：“总司令部决九时（按：应为八日九时）移至遵义城”。

一月八日，军委主席朱德又在《关于我军九日行动部署》电报中说：“军委纵队明日进驻遵义”。同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九日进驻遵义城的通令，颁发了口号和进城的八项注意。

军委进驻遵义后，一月十日五时四十分又电告各军团：“军委纵队昨日（按：九日）进驻遵义，将继续留此工作。”

我军占领遵义及中央领导同志进驻遵义城的时间，在敌伪资料中亦有记载：

当时任贵州邮区邮务长的王庆云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七日密报称：“遵义一月七日失陷”<sup>①</sup>；伪遵义县县长徐道



伟在呈文中也说：“至（六日）午夜十二时……新城失陷，始由老城北门撤退。”<sup>②</sup>

当时在湘黔边境追堵红军的国民党军第九十三师甘丽初部呈报称：“一、三、五、八、九军团一月三、四日由瓮安窜遵义，七日进陷遵义”。“毛泽东九日到遵城。”<sup>③</sup>国民党“追剿”军第二兵团总指挥薛岳，黔军副军长侯之担等在当时的有关文件、电报中所谈我军占领遵义的时间皆与上同<sup>④</sup>。

上述资料说明，我军是在一月七日占领遵义，总司令部于八日移至遵义，军委纵队则是在九日进驻遵义的。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随同军委纵队行动，因此，在一月九日之前是不可能召开遵义会议的。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应为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依据如下：

一月十三日二十四时，中央以“恩来”的名义发出电报通知：“卓然、少奇：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这是目前找到的唯一正式通知。

陈云同志手稿中说：遵义政治局会议“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sup>⑤</sup>会议从开幕的一月十五日起，经过三天，决议通过的日期应为十七日。这个时间，在军委机要干部伍云甫同志的长征日记中亦可得到印证。伍云甫的日记中记载：“二月十日阴。驻扎西（即威信县）。上午九时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洛甫报告五次‘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即一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sup>⑥</sup>

此外，当时军委发给各军团首长的电报亦可作为参考：

一月十四日十四时，军委电示一军团：在林（彪）、聂（荣臻）未回部队前，该军团“统归左参谋长朱主任统一指

挥。”一月十五日，一军团即以朱（瑞）、左（权）的名义开始向军委报告战况。

由于一军团林、聂，三军团彭、杨已先后离开部队，军委于一月十四日至十七日二十三时前，中断了给他们的电报。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同志因故迟到，参加了最后一天的会议。军委一月十六日二十四时，也中断了给他的电报。会议中间，彭德怀同志因黔敌进攻，提前返回了部队。会议结束后，参加会议的各军团首长除林、聂外，均开始陆续返回部队。从一月十七日二十三时起，军委又开始恢复发给彭德怀、杨尚昆和李卓然同志的电报。

至于遵义会议决议上为什么标明该决议是在一月八日通过的，现在尚未查清。陈云同志手稿中说：会议“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sup>⑦</sup>。这就说明，决议由洛甫写成文字是在会议之后了。当时戎马倥偬，事后标错日期是可能的。建议今后重新刊印遵义会议决议时，加注予以说明。

## **二、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员以及他们在党内外的主要职务**

据陈云同志手稿中记载：“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了<sup>⑧</sup>。

邓小平、伍修权同志和李德列席了会议。

参加会议人员以及他们在会议前的党内外主要职务

是⑨：

政治局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 毛泽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 朱 德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⑩
- 陈 云 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 周恩来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 张闻天（洛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 秦邦宪（博古）红色区域中央局的领导者、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⑪

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 王稼祥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⑫
- 邓 发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 刘少奇 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长征开始时为八军团中央代表⑬
- 何克全（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九军团中央代表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

- 刘伯承 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

李富春 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代主任

林 彪 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 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 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 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 五军团政治委员

邓小平 《红星报》主编<sup>⑭</sup>

李 德 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长征开始时  
为“三人团”成员

伍修权 翻译

未参加会议的军团首长，除九军团外，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同志亦未出席这次会议<sup>⑮</sup>。

### 三、遵义会议前的酝酿情况

早在反五次“围剿”时，毛泽东等同志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就曾提出过许多意见。据陈云同志手稿中记载：“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sup>⑯</sup>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sup>⑰</sup>遵义会议决议也指出：“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sup>⑱</sup>同志一个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虽是军委内部大多



数同志曾经不只一次地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sup>①⑨</sup>同志是徒然的。”<sup>②⑩</sup>

长征开始后，“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sup>②⑪</sup>周恩来同志回忆说：“过了湘江后，毛主席提出讨论失败问题，从老三界一直争论到黎平”<sup>②⑫</sup>。当时争论的中心是关于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遵义会议决议指出：“当红军到了湘黔边境，在当时不利于我的情况下，却还是机械的要向二六军团地区前进，而不知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针。红军到了乌江地域，又不知按照新的情况的变化，提出在川黔边转入反攻消灭蒋介石追击部队的任务”<sup>②⑬</sup>。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向中央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央负责同志在途经湖南省通道县时开了会<sup>②⑭</sup>，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于是红军遂由湖南进入贵州。

同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于贵州黎平举行会议。据周恩来同志回忆，在黎平会议上争论得很激烈。军事顾问李德要在黔东北和敌人硬拼，毛泽东同志则主张向黔北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同志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sup>②⑮</sup>。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

据地的决议》<sup>②6</sup>，确定了新的战略行动方针。

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草塘）召开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sup>②7</sup>。

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虽然逐渐取得多数同志的拥护，但斗争并没有结束。对此，周恩来同志后来回忆说：“从黎平往西北；辗转从黄光（？）、黄平，然后渡乌江，达到遵义，沿途争论。在这个中间，主席就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那时在中央局工作的主要的成员，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很多的中央同志都站在主席方面。”<sup>②8</sup>

陈云同志手稿中也指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召集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sup>②9</sup>因此，我军占领遵义后，政治局扩大会议遂于遵义举行。

遵义会议的召开，本身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的一大胜利。

#### 四、遵义会议进行情况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

的错误，并在组织上作了一些调整。

会议开始，由博古同志作了关于反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进行辩护。正如会议决议所指出的：“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sup>③①</sup>接着周恩来同志作了副报告。

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对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今后正确的方向。陈云同志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接见遵义会议纪念馆同志的讲话中说：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sup>③②</sup>周恩来同志后来在谈到当时的情况时也说：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当时错误领导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sup>③③</sup>

会上，其他同志也对博古同志的总结报告进行了批评。

经过三天的讨论，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会议的决议在会后由洛甫写成文字）。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在反对五次“围剿”的战争中，“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一部分的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而我们的突围的行动，又“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三个月的突围战役，红军“减员到空前的

程度。”“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sup>③③</sup>

据陈云同志手稿中记载：在“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sup>③④</sup>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会议着重指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sup>③⑤</sup>

“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sup>③⑥</sup>

扩大会最后作出了下列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sup>③⑦</sup>

博古同志在回忆遵义会议时说：“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问题。”<sup>③⑧</sup>

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取消了“左”倾错误领导的军事指挥权，这在当时是一个生死攸关、急待解决的问题。由于当时战争形势紧迫和大多数同志尚未认识到中央政治上的错误，因而，会议“认



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做，对顺利解决迫在眉睫的军事路线问题、动员全党团结一致去克服长征中的困难，是必要的。

## 五、关于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职务 和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

遵义会议期间，中央在组织上只作了部分的调整，至于洛甫同志接替博古同志的职务和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则是在会议之后完成的。

### （一）关于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的职务问题

一九四三年，博古同志回忆说，遵义会议之前，“三人团处理一切（博、李、周）”<sup>③⑨</sup>。这就是说，当时三人团实际上是党、政、军的领导核心和最高权力机构。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而周恩来同志仍是最高军事指挥者，这就是在实际上取消了博古领导全党工作和李德指挥军事的权力。但当时博古并未正式交出职务。陈云同志的手稿中提到：“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sup>④⑩</sup>

周恩来同志回忆博古同志交出职务的情况时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当时部队行进到四川、贵州、云南交界的地方，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里，“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于是，“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sup>④⑪</sup>现经查明，在长征途中，党中央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曾在鸡鸣三省这个村子宿营。（见附图）

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也提到这件事，可供参考。他写道：遵义会议之后，“毛只是进了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他本来就已是政治局委员了。博古开始仍然是总书记，一个月以后，也就是在一九三五年二月，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他才同意将他的职位让给洛甫，自己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sup>④②</sup>

可以认为：洛甫同志接替博古同志的职务，是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在鸡鸣三省，当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时决定的。

经查对，当时中央并无总书记职称，洛甫和博古也未用总书记的名义。

早在一九三一年，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即决定不设总书记。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博古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到：向忠发被逮捕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到酒店开会（明、周、卢、博四人）决定不设总书记。当时决定我为书记，我的实权是总书记，但是在中央会议并没有决定我是总书记。”<sup>④③</sup>

洛甫同志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在自述材料中说，王明、周恩来决定离开上海，提出新中央的名单时，“当时卢福坦想当总书记，所以我记得当时特别提到无总书记问题。”<sup>④④</sup>

周恩来同志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提到：“在分配工作时，曾向卢福坦解释不设总书记。”<sup>④⑤</sup>

由于博古同志的正式名义不是党的总书记，因而陈云

同志手稿中只是说：“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sup>④⑥</sup>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注释(九)中也说：“秦邦宪同志……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曾先后担任党的上海临时中央局和红色区域中央局的领导者。”<sup>④⑦</sup>周恩来同志一九七二年回忆说：遵义会议后，“撤销博古的那个声明也没有用总书记。”“这个‘总’字好象没有加上。反正他<sup>④⑧</sup>是书记就是了，因为其他的人作常委嘛。”<sup>④⑨</sup>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二日的武汉《新华日报》上刊登了《张闻天(洛甫)启事》，其中提到：“中共中央设有由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

由此可见，博古和洛甫同志当时并没有正式用总书记的名义。

## (二) 关于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

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sup>⑤⑩</sup>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中央军委又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sup>⑤⑪</sup>此时，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显然尚未成立。它究竟于何时何地成立的呢？以下的资料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三年说：长征途中，“在打鼓新场<sup>⑤⑫</sup>，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织三人团(毛周王)领导。”<sup>⑤⑬</sup>

一九四三年，周恩来同志在谈到当年撤销进攻打鼓新场敌据点的计划时说：在鸭溪会议上，“毛主席坚决反对那个军事计划，后来还是停止了……自此以后成立三人团，

集中军事领导，少开会议。”<sup>⑤4</sup> 一九七二年，周恩来同志再次谈到这件事，他说：第二次从遵义出发，大家一致要打驻守在打鼓新场的敌人。“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由于“大家一致通过”，“主席那个时候只好服从”。会后，毛主席“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象过去那样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有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sup>⑤5</sup>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八日，陈云同志在审查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时，谈到过三人小组成立的情况。他说：“成立三人小组是在遵义会议以后，四渡赤水时定的。大概在打鼓新场的地方。当时大家意见很多，就搞了个三人军事小组，决议上没有。”<sup>⑤6</sup>

洛甫同志在自述材料中也说：“在抢渡乌江以前，泽东同志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sup>⑤7</sup>

李德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第二次进遵义后，“成立一个‘军事领导小组’……成员有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sup>⑤8</sup>

上述材料，说明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是和第二次撤离遵义后，作出撤销攻打打鼓新场决定紧密联系着的。根据这些线索，我们查阅了当时部队行动的有关电报。这些电报记载：军委二次撤离遵义后，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一日，一军团林、聂曾发电报给军委，建议我“野战军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按：即打鼓新



场)、三重堰之敌”。十一日，军委在离鸭溪不远的苟坝附近发给一、三、五军团《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的电报。电文指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十二号可到新场。安、龚两旅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军委已于昨十号二十一时发出集中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地域之电令，以便寻求新的机动。”<sup>⑤9</sup>

上述电报记载了中央军委撤销进攻打鼓新场计划的时间和中央军委当时所在的地点。那时，红军处于强敌围困之中，情况瞬息万变，亟需成立一个具有权威的军事指挥机构以保证毛泽东同志实施正确的军事指挥，因而在改变进攻打鼓新场计划后即成立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一点，从毛泽东、陈云同志的讲话中可以看出，特别是在周恩来同志的两次讲话中说得更清楚。

据此，可以认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一日左右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的。

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在当时是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同志进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表明了新的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全党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遵义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为中国革命开辟了走向胜利的航道。

责任调研整理：李志光 陆友山

参 加 者：周 克 彭咏梅

## 注 释

①② 据贵州省档案馆提供的资料。

③ 引自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选辑的《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二辑第三十九册第 3893—1 页。

④ 薛岳在一九三六年冬写的《剿匪纪实》一书中说：红军“二十四年一月七日陷遵义。”（《黔滇川南追剿》第 7 页）侯之担在电文中谈到红军“渡乌江后，担部不得已，退至湄潭老岩一带，死守待援，匪节节进攻，担部以孤军固守遵义，至鱼晚（按：即六日晚），终以众寡不敌。担乃率部背进娄山关之线……”（引自胡羽高编《共匪西窜记》第 274 页，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贵阳羽高书店发行）。

⑤ 见本辑第 1 页。

⑥ 引自《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二辑第 13 页，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华书局出版。

⑦ 见本辑第 8 页。

⑧ 见本辑第 1 页。

⑨ 系根据陈云同志于一九四一年任中央组织部长期间所写的《六大以后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各届政治局委员名单》，并参照本人的简历和一九三五年一月前后党中央、军委的文件电报以及一些老同志的回忆。

⑩ 据中央档案馆一九八三年三月三日函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朱德同志是政治局的正式委员（见会议记录）”。陈云同志一九四一年任中央组织部长期间写的《六大以后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各届政治局委员名单》所列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朱德同志的名字。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陈云同志给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复函中再次证明朱德同志为政治局委员。

⑪ 博古的“红色区域中央局的领导者”职务，系根据《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一九六四年四月第一版）第 1000 页上的注释。长征开始时博古同志为“三人团”成员——见博古同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⑫ 据中央组织部于一九八〇年四月八日复遵义会议纪念馆函称：“陈云记得稼祥在遵义会议补为正式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同志在党的七次代表大

会期间的简历表中也填写：“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后补为政治局正式委员。”

⑬ 据中央档案馆一九八三年三月三日函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见政治局会议记录）”。陈云同志一九四一年任中央组织部长期间写的《六大以后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各届政治局委员名单》所列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有刘少奇同志的名字。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陈云同志给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复函中再次证明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同志的其它职务引自中国革命博物馆一九八〇年四月编印的《刘少奇同志生平活动年表》第8页。

⑭ 引自伍修权同志《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一文，其中写道：“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原载《星火燎原》季刊一九八二年第一期第24页，战士出版社出版。

⑮ 关于董振堂同志没有参加遵义会议的主要依据是：1. 陈云同志手稿所记载的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员中没有董振堂；2. 董振堂与李卓然当时同为五军团负责人，中央一月十三日通知李卓然、刘少奇去遵义开会的电报中并没有提到要董参加；3. 遵义会议期间，军委发给五军团的多次电报，指名给董振堂同志；4. 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陈云、杨尚昆、李卓然和当年在军委总部工作的叶剑英等同志都证实董振堂同志未出席遵义会议。

⑯ 即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同志。

⑰ 见本辑第7页。

⑱ 华夫即李德。

⑲ 即博古同志。

⑳ 见本辑第50—51页。

㉑ 引自《刘伯承回忆录》第4页，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第一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㉒ 据周恩来同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中的发言。

㉓ 见本辑第49页。

㉔ 邓颖超同志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七日在审查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二十八年党史陈列时，谈到通道会议的情况。她说：“上次你们提的问题，回去我问了恩来同志，在长征途中是否开过黎平会议和通道会议？恩来同志讲是有，开过黎平和通道会议”（根据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部提供的材料）。另据李德写的《中国纪事（1932—1939）》第124页记载：“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毛泽东提出“应该放弃在长江

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继续向西“进入贵州内地”的意见，得到洛甫、王稼祥和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

②5 同②2。

②6 引自《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第150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

②7 同上，第151页。

②8 引自周恩来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

②9 见本辑第1页。

③0 见本辑第35页。

③1 据遵义会议纪念馆资料。

③2 同②8。

③3 见本辑第50、37、48、49、52页。

③4 即李德。

③5 见本辑第7页。

③6 见本辑第1页。

③7 见本辑第8页。

③8 据秦邦宪同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中央档案馆一九七九年九月五日复遵义会议纪念馆函）。

③9 同上。

④0 见本辑第8页。

④1 同②8。

④2 引自奥托·布劳恩（即李德）著《中国纪事（1932—1939）》第141页，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

④3 据中央档案馆一九八三年三月三日复函。

④4 据中央档案馆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复函。

④5 同④3。

④6 见本辑第8页。

④7 同①1。

④8 指洛甫。

④9 同②8。

⑤0 见本辑第8页。

⑤1 引自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中央军委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



给各军团的《关于设前敌司令部并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命令》的电报。

⑤② 今贵州金沙县城。

⑤③ 据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插话。

⑤④ 据周恩来同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⑤⑤ 同②⑧。

⑤⑥ 据遵义会议纪念馆提供的资料。

⑤⑦ 据张闻天同志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的自述材料。

⑤⑧ 引自奥托·布劳恩(即李德)著《中国纪事(1932—1939)》第151页，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

⑤⑨ 本文所引电文，均存于中央档案馆。

附录：

##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 “围剿”的总结决议 (遵义会议)

(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

听了□□同志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及□□□同志的副报告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一) 党中央关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议中，曾经清楚的指出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反动对于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更加残酷的进攻，但同时指出了在这一剧烈的阶级决战中，帝国主义、国民党内部的弱点与革命形势的新的紧张化，这造成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得出了“在五次‘围剿’中间我们有着比以前更加充分的取得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的正确结论(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中央决议)。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

(二) 党中央根据于自己的正确估计，定出了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具体任务。一年半反对“围剿”的困苦斗争，

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特别中央苏区的党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在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成绩。扩大红军运动成为群众的热潮。动员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线，达到了十万人以上，使红军大大的扩大了。模范赤少队开始成为红军的现存后备军，赤少队的群众武装组织有了极大的发展。党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口号下解决了前方红军财政上的粮食上的与一切其他物质上的需要。苏区内部阶级斗争的深入，苏维埃的经济建设以及苏维埃政府与群众关系的彻底的改善，更大大的发扬了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斗的热情与积极性。一切这些造成了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有利条件，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对于这些顺利的条件，显然是估计不足的。这种估计不足，也必然得出在主观上我们没法子粉碎“围剿”的结论。

(三) 应该指出我们工作中还有许多严重的缺点：党对于白区广大工农群众反帝反国民党与日常斗争的领导依然没有显著的进步，游击战争的发展与瓦解白军士兵工作依然薄弱，各苏区红军在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相互呼应与配合还是不够，这些弱点无疑的要影响到反对五次“围剿”的行动，成为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重要原因。但决不应该以为这些弱点的存在，乃是不能粉碎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而□□同志在报告与结论中却夸张这些工作的弱点，对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估计，却又不认识与不承认，这就使我们没有法子了解我们红军主力不能不离开中央苏区与我们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究竟在那里。这就掩盖了我们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

术上的错误路线所产生的恶果。红军的英勇善战，模范的后方工作，广大群众的拥护，如果我们不能在军事领导上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则战争决定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主要原因正在这里。

(四) 国民党蒋介石以及他的帝国主义的军事顾问等，经过四次“围剿”失败之后，知道用“长驱直入”的战略战术同我们在苏区内作战，是极端不利的。因此五次“围剿”中，采取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财。紧缩我们的苏区，最后寻求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一部分的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应该指出，这一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五) 在目前中国国内战争的阶段上，在我们还没有大的城市工人的暴动白军士兵的哗变的配合，在我们红军数量上还是非常不够，在我们苏区还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在我们还没有飞机大炮等特种兵器，在我们还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当着敌人向我们进攻与举行“围剿”时，我们的



战略路线，当然是决战防御，即是我们的防御不是单纯的防御，而为了寻求决战的防御，为了转入反攻的防御。单纯防御可以相当削弱敌人力量，可以在某一时期内保持土地，但最终的粉碎敌人围剿以保卫苏区是不可能的，最后胜利的前途是没有的。只有从防御转入反攻（战役的与战略的）以至进攻，取得决战的胜利，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才能粉碎敌人，保卫苏区，发展苏维埃革命运动。

在这一战略路线之下，当我们还没有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时，我们对于进攻的敌人不应该即刻与之进行无胜利把握的决战，我们应该以次要的力量（如游击队群众武装、独立营团、部分主力红军等）在各方面迷惑或引诱敌人，在次要方面，主要的以运动防御钳制敌人，而主力则退至适当距离或转移到敌人侧翼后方，隐蔽集结，以寻求有利时机，突击敌人。在内线作战下，当敌人以绝对的优势兵力向我们前进时，红军的退却与隐蔽，足以疲劳敌人，使敌人骄矜懈怠，发生过失与暴露弱点，这就创造了转入反攻取得决战胜利的条件。要最审慎的分析与判断敌情，以便适时的恰当的部署战斗。不要由于敌人向我们挑衅与佯攻，而不必要的调动我们的力量与投入战斗，使我们疲于奔命，失去了在一定方向取得决战胜利的机会。为了求得胜利，当敌人按照其计划前进时，我们在突击方向，用不着去阻止它，应该待它进至适当距离，然后包围消灭之（即诱敌深入）。为了求得胜利，即使暂时放弃一部分苏区的土地，甚至主力暂时离开苏区根据地，都是在所不辞的，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能够消灭敌人，粉碎敌人

的“围剿”，我们不但能够恢复放弃的土地，而且还能够扩大苏维埃领土。一切这些，都为着使红军能够经常主动的有利的去战胜敌人的进攻与“围剿”，而避免一切被动的与不利的结果。

然而在五次战争中，对于这些原则却通通是违反的。共产国际去年二月来电说得很对：“我们觉得似乎在目前这一时期中，军事指挥所采用的计划和步骤，差不多可以说常常由敌人逼迫而产生的，敌人向我们挑拨，使我们常常不必要的改组我们的力量。因此我们的力量由于继续不断的变动，就不能积极的参加作战。我们觉得应该在那些我们已经获得了某些胜利的地方击败敌人，不要企图在全部战线上同时击败敌人”。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对于共产国际的这种指示是无法了解的，所以不但去年二月以前是如此，直至主力红军退出苏区仍是如此。甘心情愿把自己处于被动地位的单纯防御路线，并不是也不能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击败敌人，而是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阻止敌人。□□□同志过去提出过的“全线出击”的口号，在五次战争中则变为全线抵御，而在战略上则二者都是错误的。“不放弃苏区寸土”的口号，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而机械的运用到军事上尤其在战略上，则是完全错误，而适足成为单纯防御路线的掩盖物。

(六) 为了求得决战的胜利，在决战方面，集中优势兵力是绝对必要的。在目前敌我力量的对比上，敌人的兵力是绝对占优势，他们常常拿多于我们数倍以至数十倍的兵力向我们进攻。然而这对于我们不是可怕的。由于敌人是处于外线，战略上采取包围与分进合击的方针，这就造

成了我们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使我们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下，能够收到战役的外线作战（局部的外线）的利益，即是以我军的一部钳制敌人的一路或数路，而集中最大力量包围敌人一路而消灭之，用这种办法去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在战略的内线作战情况之下，只有集中优势兵力寻求战役的外线作战取得胜利，才能使红军经常握住主动权，敌人则迫使他陷入被动地位，而最后打破他的整个计划。

但是过去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为了抵御各方面敌人的前进，差不多经常分散（主要是一三军团的分散）兵力。这种分兵主义的结果，就使我们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就使我们的兵力处处薄弱，而便于敌人对我们各个击破，五次战争中，许多次的战役（如洵口战役，团村战役，建宁战役，温坊战役等）都由于我们主力不集中而未能得到伟大的胜利。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给红军的中心任务，是阻止敌人的前进与企图以“短促突击”消灭部分的敌人，而不是争取主动权，不是争取决战的胜利。其结果就是红军消灭敌人的数量极少，而苏区也终于受敌人蹂躏。

（七）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是我们工农红军的特长。共产国际在敌人五次“围剿”开始时（前年十月来电）即向我们指出：“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该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去年二月来电又重复的说：“很明显的，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战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攻敌人的堡垒地带的作战中，获得胜利”。国际这些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在五次“围剿”敌人堡垒主义下，我们虽没有象在一二三四次

战争中当敌人“长驱直入”时采取大规模运动战的机会，然而运动战的可能仍然存在，事实上已经多次的证明了（洵口、团村、将军殿、建宁、湖坊、温坊各役，特别是十九路军事变时）。然而五次战争中，由于对堡垒主义的恐惧所产生的单纯防御路线与华夫同志的“短促突击”理论，却使我们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而这种阵地战的方式仅对于敌人有利，而对于现时工农红军是极端不利的。

强攻敌人的堡垒，在目前技术条件下，是应该拒绝的。只有在堡垒不坚固或孤立的情况下，为了打击敌人增援部队，或为了调动敌人的情形下，才容许攻击敌人的堡垒。五次战争中常常轻易的强攻堡垒，其没有任何效果，是不足为怪的，因为这是把战争当儿戏。

对于五次战争中运动战的可能估计不足，因而把敌人五次“围剿”与过去一二三四“围剿”绝然的分开，因而绝然否认过去运动战的经验，绝然否认诱敌进来给以消灭的战法，并且不得不在实际上拒绝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这在单纯防御与短促突击的领导者是自然的道理。

（八）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的估计过高与对运动战的可能估计不足，便产生了胜利只能起始于战术上的理论，以为只有战术上的胜利，才能转变为战役上的胜利，然后由战役的胜利才能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们的变化（华夫同志的文章及□□、□□两同志给林彪彭德怀两同志的信），以为“在堡垒主义下，只能有许多小的胜利，而不能有痛快淋漓的胜利”（见□□同志政治局发言及□□同志红星报的文章），以为只有分兵抵御与短促突击才能对付堡垒主义。所有这些革命战争中机会主义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践



际，在五次战争中是完全破产了。

我们不能否认：堡垒主义造成了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新的困难（而他们最初却以左的空谈轻视堡垒主义，见□□同志红星报文章），不否认而且应准备红军的技术条件（飞机大炮），特别是堡垒内的工农士兵暴动，以战胜将来敌人更坚固的堡垒。但就在现时条件下，堡垒主义也是能够粉碎的。堡垒主义疲劳了敌人的兵力并分散了兵力，养成了敌人对于堡垒的依赖性，使他们脱离了堡垒即失去其胜利的信心，同时敌人无法不脱离堡垒向我们前进，又无法在全国范围内遍筑足以限制红军行动的堡垒。一切这些，造成了使我们能克服堡垒主义的顺利条件。因此我们红军粉碎堡垒主义的方法，依然是依靠于运动战，依靠在堡垒线前后左右发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红军的行动，以及依靠深入的白军士兵运动。所谓运动战粉碎堡垒主义，在堡垒线内即是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在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做运动战。只要我们灵活的、艺术的、出奇制胜的运用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我们就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堡垒主义。而且只有正确的战略方针，才能正确的领导战役，并正确的运用战术，以粉碎堡垒主义与粉碎“围剿”。单纯防御与“短促突击”，胜利主要不依靠于战略战役的正确领导，而仅仅依靠于战术，实际上只是对于堡垒主义的投降，到底不能粉碎堡垒主义。

（九）在持久战与速决战问题上，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的了解也是错误的。必须明白中国国内战争不是一个短时期的战争，而是长期的持久的战争，苏维埃革命，就在

不断的粉碎敌人的“围剿”中发展与巩固起来的。因此在有利的条件之下，我们完全应该从防御转入反攻与进攻，消灭敌人，粉碎“围剿”（如一二三四次战争及五次战争广昌战役以前）。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可以暂时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有生力量，在另一有利的条件下转入反攻与进攻（如五次战争广昌战役以后）。这是第一个基本原则。但同时必须了解另一个原则，即为了进行长期的持久战，对于每一次“围剿”与每一个战役，必须极力争取战局的速决。因为在现时，敌我力量的对比上，对于一次“围剿”与每一个战役采取持久战的方针，对于我们都是极端不利的。当着敌人以持久战来对付我们的时候（如五次“围剿”），我们必须运用正确的战略方针，打破敌人这种计划，在我们可能支持的时间之内取得决定的胜利，以粉碎敌人的“围剿”。拿我们的人力物力及军火补充的数量同国民党所有的去比较（即所谓同敌人拼消耗，见××同志红星报的文章），这种持久战的了解是根本错误的。在这些方面现时我们正处在绝对的劣势，这种数目字的比较只能证明相反的结论，即持久战对我们是没有胜利前途的。

正因为要进行长期国内战争的持久战，同时对每一个“围剿”与每一战役却要进行速决战，所以我们特别要谨慎的决定我们的战略战役计划。五次战争中单纯防御战略是根本错误的，在这种错误战略之下，进行许多拼命主义的战斗（如毛丁山、三溪坊、平疗、广昌等战役）同样是错误的，红军一定要避免那种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即使作战的决定在当时是正确的，但当形势变化不利于我们时，我们应立即应拒绝这种战斗。要玩弄暴动是极大的罪恶，玩

弄战斗同样是罪恶。

正因为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予红军以必须的休养兵力与教育训练的时间，这是争取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以为五次战争中没有休息训练的可能的说法是不对的，那只是单纯防御短促突击主义者必然的结论。以为红军行动积极化，便是使他经常的不停止的打仗而不必注重休息训练，也是不对的，须知没有必要的休息和训练，就不能好好的打胜仗。红军的编制，一定要适合现时国内战争的环境。主力还未充实就去建立许多新的师团单位是不对的。应该于充实主力之后，再去建立新单位。拿全无教育训练又无战斗经验的新兵师团去单独作战是不对的，应该使新兵师团中有老兵骨干，尽可能在初期使他们在老的兵团指挥之下，训练出战斗经验来。那种不必要的笨重的与上重下轻的组织与装备是不对的，应该是尽可能的轻装，必须充实连队与加强师以下的领导。

正因为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必须反对那种把保持有生力量与保卫苏区互相对立起来的理论。为了进行胜利的战斗，红军的英勇牺牲是完全必要的，这是阶级武装的特质，是革命战争胜利的基础，这种牺牲换得了胜利，这种牺牲是有代价的。但这不能适用于无代价的拼命主义的战斗，须知只有保持有生力量，我们才能真正保卫苏区。没有坚强的红军，苏区即无法保存。有了坚强的红军，即使苏区暂时遭到部分的损失，也终究能够恢复，并且新的苏区也只有依靠红军才能创造起来。

在战争持久战的原则之下，要反对当敌人的“围剿”被



我们用反攻战斗粉碎了之后可能发生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对疲劳情绪与过高估计敌人力量所产生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使我们懈怠消极，使我们停顿不动，使我们不能由反攻转入进攻，消灭更多敌人，发展更大苏区，扩大红军力量，使我们不能在敌人新的“围剿”到来之前取得粉碎新的“围剿”的充分条件。另一种是由于对自己胜利过分估计与对于敌人力量估计不足所产生的冒险主义。这种冒险主义使我们进攻得不到胜利（如无把握的及在当时无必要的进攻中心城市等），甚至于使反攻中已经得到的胜利归于消灭或抛弃，使红军有生力量过分牺牲，使扩大红军扩大苏区争取战略地区的发展与巩固的任务放弃不顾，这同样使我们不能在敌人新的“围剿”到来之前取得继续粉碎它的充分条件。因此，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是党在战略的进攻问题上即在敌人两个“围剿”之间的严重任务。

在战役速决战的原则下，要反对根源于恐慌情绪的仓猝应战，或对战略上初战的不慎重，或企图先发制敌一战不胜就认为没有办法，或借口速决战而不作充分准备，即对于敌人的“围剿”不作必要的与尽可能支持的时期内的一切准备，等等机会主义的倾向。速决战是要求具备一切必要条件（战略的优胜，战役领导的正确，运动战，不失时机，集中兵力等等）去消灭敌人部队，只有消灭了敌人的部队才能使战局速决，才能使敌人的进攻与“围剿”归于粉碎。

（十）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的内部的裂痕，使我们利于转入反攻与进攻，是我们粉碎敌人“围剿”的重要战略之一。福建十九路军事变是粉



碎敌人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党中央当时采取了利用国民党内部这一矛盾的正确政治路线，同十九路军订立了停战协定，来推动十九路军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然而当时的□□同志等却在左的空谈之下，在战略上采取了相反的方针，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军事上同时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相反的以为红军继续在东线行动打击进攻十九路军的蒋介石部的侧后方是等于帮助了十九路军，因此把红军主力西调劳而无功的去攻击永丰地域的堡垒。失去了这一宝贵的机会，根本不了解十九路军人民政府当时的存在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在军事上突击蒋介石的侧后方以直接配合十九路军的行动，这正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为了粉碎五次“围剿”。这并不是因为十九路军是革命的军队，相反的这不过是反革命内部的一个派别，这个派别企图用更多的欺骗与武断宣传甚至社会主义之类的名词来维持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我们在实际行动中表现给在十九路军欺骗下的工农士兵群众看，我们帮助任何派别反日反蒋的斗争，我们才能更容易揭破十九路军军阀的欺骗，在共同反日反蒋的战争中，争取他们到我们方面来。只有我们军事上采取与十九路军直接配合的方针，才能使我们在当时这一重要关键上不失去消灭蒋介石主力的机会，这种有利条件，是过去历次战斗中所没有的。然而在我们军事上没有去利用，这对于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们的目的，原来不过为了抵御敌人的前进，至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使自己转入反攻与进攻，在他们看来是冒险的行动。

(十一) 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首先应该说的：当我们看到在中央苏区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没有可能时（一九三四年五月至七月间，即广昌战役以后），我们应毫不迟疑的转变我们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苏区。国际六月二十五日来电曾经这样的指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的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在这个重要关节上，我们的战略方针显然也是错误的。在“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上，根本没有提出这一问题。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上虽是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然而新的计划的基本原则依然同当时应取的战略方针相反，“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补助方向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这些依然是新计划基本原则的第一部第二条。关于有生力量的保持问题，完全忽视。而这正是决定退出苏区的战略方针的基础。这一战役时机上的错误，再加上阵地战的发扬，给了红军以很大的损害。这

种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的矛盾态度，正是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到了转变关头必然的惊慌失措的表现。

其次，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同志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种巨大的转变不但没有依照国际指示，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把数百万人的群众行动的政治目标，认为不是重要的问题。在主力红军方面，从苏区转移到白区去，从阵地战场转移到运动战场去，不给以必要的休养兵力与整顿训练，而只是仓猝的出动。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密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错误。庞大的军委纵队及各军团后方部的组织，使行军作战受到极大的困难，使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使行动迟缓，失去到达原定地区的先机。这是根本忘记了红军的战略转变将遇到敌人严重的反对，忘记了红军在长途运动中，将要同所有追堵截击的敌人作许多艰苦的决斗，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所有这些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特别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于必要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的原则上，就使得自己差不多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不能有力的打击敌人。就使得三个月的突围战役，差不多处处成为掩护战，而没有主动的放手的攻击战。就使得口头上虽然经常说“备战”，而实际上除掩护战而外，却经常



是“避战”。就使得红军士气不能发扬，过分疲劳，得不到片刻的休息，因而减员到空前的程度。就使得“反攻”的正确口号在实际上变成了□□同志等的避战主义的掩盖物，而不准备于必要时与有利时机争取真正反攻的胜利。就使得以红军战略转变，迫使敌人转变其进攻中央苏区的整个计划，以保卫中央苏区，以粉碎五次“围剿”，以建立湖南的根据地，乃至高度保持红军有生力量的基本任务，都不能完成。所有这些，都是基本的战略方针采取了避战主义的必然结果。这种战略避战主义是从一种错误观点出发，即是说红军一定要达到了指定地区(湘西)，放下了行李，然后才举行反攻消灭敌人，否则是不可能的。对追击敌人(如周、薛两纵队)，就在他们分离时与疲弊时也是不敢作战的。而这种错误观点的来源，则在于不明了当前的环境是不允许我们这样简单地轻巧地径情直遂地干的，在于对追击敌人的力量的过分估计。殊不知这种简单的轻巧的与径直的干法，在短短的环境不严重的与小部队的行动，或者是可能的，而在数千里的五次“围剿”环境中的主力红军的巨大战略的转移则是不可能的。对不必要的与敌人无隙可乘的那种战斗，是应避免的，而对于必要的与敌人有隙可乘的战斗，则是不应该避免的。此次突围行动，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其主要原因正在这里。这一原则上的错误，一直发展到突围战役的最后阶段，当红军到了湘黔边境，在当时不利于我的情况下，却还是机械的要向二六军团地区前进，而不知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针。红军到了乌江地域，又不知按照新的情况的变化，提出在川黔边转入反攻消灭蒋介石追击部队的任务，而只



是看见消灭小部黔敌以及消灭所谓土匪的任务。虽则最后两次错误因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坚决的反对而纠正了，而在华夫同志等则适足表现其战略上一贯的机会主义的倾向。

单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不顾一切的拼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此外决不能有别的东西。

(十二) 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一切企图拿党的正确路线来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做辩护（如□□同志的报告华夫同志的发言）是劳而无功的。

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他的来源是由于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客观的困难特别是持久战堡垒主义的困难有了过分的估计，是由于对自己主观的力量特别是苏区与红军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了解。因此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是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全党内应该开展与深入下去。一切把这一斗争转变为无原则的个人纠纷的企图，必须受到严厉的打击。

(十三) 此外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一个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

之下，把过去革命战斗中许多宝贵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同志是徒然的。一切这些，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经常的现象。

同时政治局更认为过去书记处与政治局自己对于军委领导是非常不够。书记处与政治局最大部分的注意力是集中在扩大红军与保障红军的物质供给方面，因此在这些方面，得到了空前伟大的成绩，然而对于战略战术方面则极少注意，而把这一责任放在极少数的同志身上，首先是××同志与华夫同志。我们没有清楚的了解，战争的指挥问题，关系于战争胜负的全局。战争指挥的错误，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的成绩化为乌有。政治局对于这一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自己应该承认的，书记处的所有同志，在这方面应该负更多的责任，因为有些重要的决定或战略计划是经过书记处批准的。

然而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指出□□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经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去纠正，而且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而□□同志在他的结论中对于绝大多数同志的批评与自己的错误是没有承认的。必须指出，这种错误对于□□同志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但这一错误如果坚持下去，发展下去，则必然走到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

政治局扩大会认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

(十四) 最后，政治局扩大会认为：虽是由于我们过去军事上的错误领导使我们没有能够在中央苏区内粉碎五次“围剿”，使我们主力红军不能不退出苏区并遭受到部分的损失，然而我们英勇的红军主力依然存在着，我们有着优良的群众条件，我们有着党的正确领导，我们有着物质上地形上的比较良好的地方，我们有着全国广大的群众拥护，与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的胜利的配合，再加上正确的作战指挥，我们相信，这些困难，在我们全体同志与红色指战员努力之下，是可以克服的。同时，敌人方面的困难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活动地区远远的离开了南京政府反革命的根据地，蒋介石几年经营的堡垒地带的依靠是没有了，军阀内部的矛盾与不统一有了进一步的增加，我们主要的敌人蒋介石的主力在五次“围剿”中是削弱了，尤其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全国国民经济的空前崩溃，使全国民众更清楚的看到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而更加同情与拥护苏维埃革命运动以至直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些都是我们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发扬全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利条件。必须指出，目前的环境在党与红军面前提出了严重任务：这就是因为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国民党军阀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放松我们。我们在敌人新的围攻的前面，中央红军现在是在云南贵川地区，这里没有现存的苏区而要我们重新去创造，我们的胜利要在自己艰苦奋斗中取得，新苏区的创造，不是不经

过血战可以成功的。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为了战胜这些敌人，红军的行动，须有高度的机动性，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是确定了，完成作战任务则必须灵活的使用这些原则。红军运动战的特长，在五次战斗中是被长期的阵地战相当的减弱了，而在目前正要求红军各级指挥员具有高度的运动战战术。因此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是严重的工作。对战斗员尤其是新战士，则须进行必要的技术教育。在政治上，一切须适应目前运动战的需要，以保证每一个战斗任务的完成。红军更要从作战中修养与整理自己，并大量的扩大自己。严肃自己的纪律，红军对广大劳苦工农群众的联系，必须更加密切与打成一片，极大的加强对地方居民的工作，红军应该是苏维埃的宣传者与组织者。目前的环境要求党与红军的领导者用一切努力，具体的确实的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

白区党的工作，必须建立与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方式，必须有彻底的转变。瓦解白军工作必须真正开始。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是党目前最中心任务之一。在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苏区与闽浙赣苏区，党必须坚持对游击战争的领导，转变过去的工作方式，来适合于新的环境。最后，同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必须取得更密切的关系并加强对于他们的领导，以求得全国红军的一致行动与互相配合。

政治局扩大会相信放在我们前面的这些严重的任务，我们是能够完成的。完成这些任务是以后革命战争的新的胜利的保证。新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将使我们中央红军在



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将使我们恢复老苏区，将使全国各地的红军与苏区打成联系的一片，并将使全国工农群众的斗争转到胜利的大革命。

政治局扩大会相信，中国苏维埃革命有着他雄厚的历史泉源，他是不能消灭的，他是不能被敌人战胜的。中央苏区湘赣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变为游击区，不过是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中部分的挫折。这种挫折丝毫也不足以使我们对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前进表示张惶失措，实际上帝国主义国民党就是想暂时停止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内的活跃，以及全国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证明整个中国苏维埃革命正在前进中。

政治局扩大会指出过去党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对于我党的整个路线说来不过是部分的错误。这种错误也不足以使我们悲观失望。党勇敢的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的领导革命战斗到彻底的胜利。党在揭发了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

政治局扩大会号召全体同志，以布尔塞维克的坚定性，反对一切张惶失措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首先反对单纯防御路线。政治局扩大会更号召全党同志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

## 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

### 经验教训决议大纲

(一) 五次围剿中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二) 敌人在五次围剿中采取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材，紧缩苏区，最后寻求我主力决战，以到达消灭我们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

(三) 然而我们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红军受到了部分的损失，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这一路线同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四) 单纯防御路线，从各方面抵御进攻，而结果一

方面也不能防御，给敌人以各方面击破的机会，怕敌人占领每一地区与城市，而结果却不能不放弃苏区。决战防御的理由，首先是在寻找有利时机与敌人决战转入反攻与进攻，在不利的情况下，应该拒绝决战，主力应退却在适当距离，转移到敌人的侧后方，隐蔽集结，以疲劳敌人消耗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发生过失与弱点，使我们在决战中取得胜利，为了寻求有利时机，就是放弃一部分甚至大部分苏区的土地，也是应该的，只要决战胜利，围剿粉碎，那不但放弃的苏区可以恢复而且还可以扩大。

(五) 为了要从各方面抵御敌人，所以单纯防御路线，经常分散兵力，同样的也拒绝运动战，这种分兵主义，主要的一、三军团分散，使五次战役中失去了许多胜利机会，华夫同志短促突击的理论实际上取消了运动战，这种阵地战只对于敌人有利，对于红军是不利的，强攻敌人的堡垒，只是消耗了红军的有生力量。

(六) 粉碎堡垒主义在目前技术条件下，只有依靠运动战。这即是在堡垒线内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单纯防御路线取消运动战就无法粉碎堡垒主义，甚至产生在堡垒主义下我们只能取得小的战术的胜利的理论，这等于向堡垒主义投降。

(七) 对付敌人持久战的方法是在有利条件下坚决的迅速的勇敢的向敌人反攻或进攻以粉碎围剿，在不利条件下则可以以战略上的退却避免战斗，以保持我们的实力，等待与争取新的反攻与进攻的有利时机。有着坚强的红

军，即使苏区暂时受到损失也可以恢复，而且也只有依靠红军才能创造新苏区，同时为了连续战斗必须给红军以休息补充与教育训练的时间，单纯防御路线一方面不能粉碎围剿，一方面消耗自己的有生力量，正是敌人持久战所要求的。

（八）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是红军粉碎围剿的重要条件之一，十九路军事变给了我们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但我们在军事上却完全不去利用。

（九）在战略转变而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在决定退出苏区后依然无目的地在苏区内同敌人拚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成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特别是战略方针不能争取必要的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原则不变，而使自己处处处于被动地位，遭受敌人打击，使原定目的不能达到，红军大量减员，单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是拚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

（十）决议更说到华夫同志的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所造成的极不正常现象，指出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过去书记处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是不够的，最大的力量都在紧急扩大红军与保障红军的给养以及其他后方工作方面，而很少注意战略战术的直接领导，没有清楚了解战争的指挥关系与战争的胜负的全局，战争指挥的错误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化为乌有，但这错误的主要负责者是博古同志。同时，指出这



种错误对于博古同志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

(十一) 决议最后说到目前的环境依然有利于我们创造新苏区，九个苏区的变为游击区域，不过是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中部分的挫折，这种挫折丝毫也不足以使我们对于苏维埃革命前途表示张惶失措，实际上帝国主义国民党就是想暂时停止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在云贵川的胜利以及全国革命斗争证明整个苏维埃革命正在前进中，同时在全党面前提出了严重的任务，指出新苏区的创造不是不经过血战可以成功的，目前最中心的问题是用一切力量战胜云贵川的以及蒋介石的部队，加强红军扩大红军，发展与组织广大的群众斗争，瓦解白军，继续中央苏区湘赣苏区等游击区域的游击战争，正确的灵活的艺术的运用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目前争取胜利的战斗任务，我们相信这些任务是能够完成的，因此我们必然要胜利的。

中 央 书 记 处

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

悼念红军三军团参谋长邓平同志

长夜沉何时旦，黄埔习武求经典。北伐讨贼冒弹雨，平江起义助烽焰。  
讨贼冒弹与平江，起义助烽焰。苦运长征转教育，重任  
团剿新体。苦运长征转教育，重任  
道嘉琳灑热血三军——长征尖奇男

一九三五年二月于鸭溪

张爱萍

一九八二年一月敬书于北京

### 悼念红军三军团参谋长邓平同志

长夜沉沉何时旦，黄埔习武求经典。北伐讨贼冒弹雨，平江起义助烽焰。  
「围剿」粉碎苦运筹，长征转战肩重担。遵义城下洒热血，三军征途哭奇男。

一九三五年二月于鸭溪  
一九八二年一月敬书于北京

张爱萍

西江月 遵义大捷

一九三五年二月 张爱萍

枪夺娄山天险，直下遵义月明。  
鏖战竟日老鸦岭，援敌两师丧尽。  
长征首获大捷，转战历数艰辛。  
欢声动地如雷鸣，远望万山横亘。

一九三五年二月 张爱萍

张爱萍

西江月 遵义大捷

一九三五年二月 张爱萍

枪夺娄山天险，直下遵义月明。鏖战竟日老鸦岭，援敌两师丧尽。  
长征首获大捷，转战历数艰辛。欢声动地如雷鸣，远望万山横亘。

一九八二年一月书于北京 张爱萍

# 我党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建

曾 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党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同党的其他事业一样，也是克服了种种困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地发展起来的。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今天我们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已经发展到具有相当规模并正在向着现代化的目标前进。可是对五十多年前创业的艰难情景，如今了解的同志已是不多了。我曾参加过一些早期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为了使大家了解当时的情况，现在把我所记得的和张沈川等同志提供的一些史实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 (一)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以后，革命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屠杀，党被迫转入地下进行斗争；党领导的各地武装起义在一些地方相继取得了胜利。在党的“六大”以后，工农红军不断扩大，建立了一批革命根据地；白区（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也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我们仍处于被敌人封锁、分割的状态。党中央为了加强对各地党组织与工农红军的领导，为了帮助各地工农红军和革命、



根据地建立通讯联系，迫切要把无线电台建立起来。早在“六大”结束时，周恩来同志开始抓了这项工作，恩来同志在莫斯科时，就鼓励毛齐华等同志学习无线电通讯业务。回到上海后，他又立即分别约李强、张沈川同志谈话，要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学会无线电通讯技术，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李强原是学土木工程的，没有学过无线电。他入党以后，先是做群众工作，后来做军委工作。组织上决定他去学电台机务时，一切需要从头做起，困难是很多的。李强接受任务之后，即以无线电业余爱好者的身份，同当时在上海经营美国无线电器材的“亚美公司”和“大华公司”的商人交了朋友，并从他们那里购买了所需的零件、发动机和其他材料，以及许多有关无线电方面的书刊。他躲在赫德路的一所房子里，按照刊物上介绍的线路图，同张沈川一道钻呀、锯呀、焊呀，先学着组装收报机，然后再装发报机。

张沈川原是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的学生，当时任上海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书记。组织上让他去学报务，他坚决服从。可是到哪里去学呢？当时只能自己想办法。有一次他在报上看到“上海无线电学校”的招生广告，就改名张燕铭跑去报了名，经考试后被录取了。入学后他才知道，这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六军用电台台长和几个报务员，为捞取“外快”利用机关的房屋开办的学校。张沈川在这里学习了六、七个月，学习期间他非常勤奋刻苦。那些“老师”们看他已能上机工作，便在他们夜间外出游逛时要他代班，他也乐于尽“义务”，因此他们的关系搞得还不

错。学习期满后，学校允许他留在那里实习；实习期间他不仅不要薪水，而且还非常负责，所以既得到了“信任”，又学到了技术。

一九二九年五月间，张沈川利用几个深夜代班的机会，抄下了两本军用电台的密电码，把它交给了党组织。同年夏天的某晚，他在代班时，收到广西第四军用电台发来的一份明码电报，内容是李明瑞师长要财政部长宋子文拨给购运书籍款三千元，交给张沈川（张沈川和李明瑞师的政治部主任熟悉）。那时广西方面正在酝酿反蒋。张沈川取得现款后立即交给党中央宣传部，购买了大批进步社会科学书刊运往广西。不久，黄埔军校电训班毕业的三个学生被派到第六军用电台实习，他们是受过特务训练的。当他们在检查前两个月的收发报底稿时，发现了这份明码电报，当即向总司令部密告台长“利用军用电台，私通商报”，于是台长被撤职。张沈川事前离开了电台，没有惹到麻烦。

张沈川离开电台后隐蔽了起来，同李强在一起继续学习。他除抄收公开电报以提高收报技能外，还跟李强学着组装收发报机。一九二九年冬天，在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他们终于组装成功了第一部电台。他们利用这部电台同其他的业余电台试行通报，效能良好。同时，张沈川还收抄伯力和旧金山等电台的俄文、英文的政治新闻和经济消息，以此练习抄发报的技能。后来，党又派原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学过电台业务的黄尚英同志来和他们一起工作。同年十二月，中央派李强和黄尚英到香港九龙建立电台，一九三〇年一月初首次同上海进行了成功的通报。这就是我党自己制造的第一对通报电台。可惜黄尚英于一九三〇年八

月病逝，年仅二十岁。

李强和张沈川是我党无线电通讯事业的“母机”，他们为党培训了很多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第一批培训是采取学生分散居住，分散教学的办法，我就是这个时候的学生。当时参加学习的还有王子纲、伍云甫（吴竞生）、曾华伦、刘光慧（女）、赵荫祥（女）、蒲秋潮（女）等同志。但是除王子纲、伍云甫外，其他同志我都没有见过面，是后来才知道的。就是王子纲，也只见过一次，以后就不来往了。当时在上海，党的组织纪律是很严格的。为了绝对保守地下通讯的秘密，电台的同志终年深居简出，几乎断绝了一切社会关系。

我原来在汉口，没有职业。一九三〇年四月，汉口的党组织派我到上海学无线电，我非常高兴。组织上因为经济困难，只给了我十五元钱路费。当时我在一个小旅馆里已经住了很久，积欠了十几元房钱和饭钱，这十五元钱就是全部交了也不够，只好把蚊帐拿出去当了两元八角钱，又在两个穷同乡处挤出了十元钱。和旅馆结帐后，剩下的钱还不够买船票的。由于水手的帮助，用了“看黄鱼”的办法，我才坐上到上海的轮船离开了武昌。到上海时，我身边只有一角多钱了。下船后人生地不熟，一家饭店的接客的过来提起我的行李，要我去他们那里住下。到了饭店一看，每天房钱竟高达二元九角七分，我怎能住得起！只好拿出一件夹袍子去当了四元钱，第二天就搬到一个小旅馆去了。又过了一天，李强（化名张振声）找到我，给了我五元钱，让我安心住着休息，等他派人来接我。后来是王子纲来把我接到静安寺路西摩路口一处小阁楼中，同伍云甫

住在一起。因为这间阁楼住两个人实在太挤，又搬到赫德路一个稍大的亭子间住下。从此我就安下心来开始学习。

教我们的老师就是张沈川(化名沈哲)。因为伍云甫比我先来，他也能帮助我。我们的学习用具只有一个电键、一个蜂鸣器和一块干电池，再加上几张纸和两支铅笔。我们俩轮流着一个发，一个收，“滴滴答”、“答答滴”，天天都是这样练，真是够单调的。两个月以后，买来了两付耳机和一个矿石收音机，可以收听徐家汇天文台的气象资料，才使我们有了更多的兴趣。学习了四五个月以后，我们的收抄能力已达到每分钟 110—120 字，这时就可以上机工作了。

在我们学习期间，二房东看到我们整天在家里“滴滴答”、“答滴滴”地忙个不停，感到有些奇怪或是不放心。有一次他问我们这是在干什么，我们说因为没有找到事做，想学学无线电这门技术，以后也好找个职业。他又问我们在哪个学校学习，我们说没上学校，只是请一个朋友来教我们，每月给他一些车钱。当时上海这类情况很多，所以二房东也就相信了。

学习期间，组织上给我们每人每月七、八元钱的生活费(房租不算在内)，除了吃饭所剩不多，还要订一份报纸，买些生活必需品，因此生活过得比较艰苦。为了购买生活必需品，我们就挤伙食费，长期都是每天买一把小白菜，一块豆腐，或者一块“日本”咸鱼充当副食。如果买两角钱肉，就一定要放在菜篮子上面，好让二房东看到我们也能吃到肉。我还记得过端午节的那天，正好没有米了，八、九点钟还未举火。二房东来到我们屋里，问我们：“吴先



生，今天过节，你们吃什么好的呀？”这一问把我们都问愣了。伍云甫很机灵，即很随便地回答说：“今天我们不做饭，有个朋友约我们到他家里过节。”我在一旁听了觉得好笑，又补了一句：“到时候了，我们该走了吧？”这样就把二房东催走了。我们出门到马路上转了一圈，中午回家时送钱的同志还没有来，只好找出一件衣服当了一元钱，跑到远一点的小面馆里每人吃了一碗阳春面和一个烧饼。剩下的钱买了一点米面回家做晚饭。那时生活虽然艰苦，但想到我们是在为革命学技术，就觉得这种生活非常有意义，也不觉得苦了。

在学习期间，我们一般不外出，也很少和别人通信，为了保密，对外写信总是利用高级饭店或医院做通信处。因为这些地方在厅门口都设有一个信袋，服务人员收到信以后，如果在各房间都找不到收信人，便把信插在厅门口的信袋内，让收信人自己来取。当时我们常用“东亚大饭店”或“宝隆医院”做通信地址。因为这种地方一般人住不起，特务们以为是有钱人的来往信件，就不去注意了。二房东对我们这些外地的年轻人没有信件来往，曾经发生过怀疑。因此，我们还常常自己写信从外面投邮寄回来。

一九三〇年九、十月间，党中央决定从各地抽调一些同志来上海集中办一个无线电训练班，在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租了一幢楼房，挂出了一块“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招牌。训练班的实际负责人是李强，张沈川教报务，吴克坚管组织和财务。此时，在苏联学习无线电的一些同志已陆续回国，其中一部分同志在这个训练班中担任了教学和领导工作。方仲如教电学，兼管学员的政治学习和组

织生活；陈保礼(沈侃夫)教机务；毛齐华等都是教员。当时各地派了十六个同志来学习。学生对外的名义是工人，教师对外的名义是经理或工程技术人员。但是这个“工厂”没有隆隆的机器声，也不进原料，不出产品，进进出出都是些中青年人，于是引起了侦探的注意，他们曾借故来查过两次。

同年十二月的某一天，这个训练班终于被敌人破坏，张沈川、方仲如、陈坦、石光、苏刚达等二十人被抓走了。那时我和另外几个人已先后分配工作，所以没有被捕。伍云甫走到弄堂门口，看到二楼窗帘已打开(暗号)，就没有进屋。涂作潮当时提着一个油漆桶，走到“工厂”门口，法国巡捕以为他是油漆工人，要他“滚开”，所以也没有被捕。被捕的二十人虽经上海市公安局、南京军事法庭几次严刑拷打，但没有一人承认是共产党员，没有一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可还是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根据《危害民国治罪法》第六条“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的规定判了刑。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十个月的十七人，六年六个月的三人。其中陈保礼、麦建屏、谢小康、张庆福四同志都因患恶性痢疾，得不到治疗，两年内先后在狱中病逝。陈保礼同志临终前不断地说：“要听‘妈妈’的话！”就是要大家听党的话。在五十年后的今天，这四位经受了严峻考验的好同志仍然使我们深深地怀念。

从两次办训练班的实践证明，在国民党统治区集中办训练班是很困难的，还是采取分散训练的办法比较好。

我是在一九三〇年十月结束了学习生活，被分配到电台工作的。电台设在慕尔鸣路，由毛齐华夫妇兼作掩护人。

房间布置得比较“阔气”，有大衣柜、梳妆台、烤火用的电炉，以及花瓶、古书、麻将牌等等。收发报机放在大衣柜内，电瓶藏在楼板底下，电炉是用来掩饰通讯用电的。为了避免发报时邻家的电灯闪跳，引起人们的惊慌和敌人的注意，我们总是等到深夜一点到三点才工作。

读者都看过《永不消逝的电波》这部电影吧，那是一部反映了真实情况的影片，我们看后感到很亲切。当时，我们每天晚上都是那样紧张地工作，非常仔细和准确地把每一个字发出去或收下来。记得在我调到电台以前，张沈川在这个电台工作。一九三〇年八月间，他得了伤寒病，发高烧，医生让他休息。可是这部电台只有他一个报务员，怎能休息呢？因此每个深夜他都由别人扶着上机工作。结果病情日重，吃了药也不见效，以致引起了医生的怀疑。他的这种苦干精神，使我十分感动，并下决心向他学习。

我们的任务是负责与香港的电台联系。我们和香港电台的同志虽然相隔几千里，而且从未见过面，但通过工作建立了一种同生死共患难的同志感情。彼此都非常关切，非常熟悉，连彼此发报的手法都能辨认出来。后来香港电台的同志被捕了，我感到非常悲痛。直到最近才知道这个同志名叫邱德。

三十年代初，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党中央急需和各根据地直接联系。一九三一年一月，组织上决定要我筹建新的电台，准备直接同江西的红军通报。与此同时，党中央派涂作潮等同志进江西根据地。涂等原准备和敌军师长张辉瓒的家属一起进江西根据地，因为张辉瓒在国民党对我第一次“围剿”时，任前敌总指挥被我活捉，他的家属愿

意为我们护送无线电器材和人员到江西根据地，以换取张辉瓒的生命。但行至南昌得知张辉瓒已被苏区人民处决，于是涂等便冒着极大的危险赶回上海。他们回到上海一星期以后，中央又决定派涂作潮、伍云甫和我三人到江西根据地去。在这之后不久，中央还派王子纲、蔡威、宋侃夫等同志到鄂豫皖根据地，派喻杰生等同志到湘鄂西根据地，去开展无线电通讯工作。

我和涂作潮、伍云甫三人是由党内交通护送，绕道香港、汕头、福建，到达江西中央苏区的。在我们之后，中央还先后派来了几批从事无线电通讯工作的同志，现在记得的有王逸群、岳夏和杨兰史等同志。

## (二)

一九三一年三月，伍云甫、涂作潮和我到达江西宁都清塘。这时，红军已经建立了第一个无线电台和第一个无线电人员训练班。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的龙岗一战，我军俘虏了张辉瓒师万余人，缴获了这个师的无线电台。当时由于群众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和对无线电器材的用途不了解，把很多器材都砸毁了。毛泽东同志知道后马上下了命令：以后必须妥善地保护无线电技术人员和电讯器材。在打谭道源的战斗中，便完好地缴获了他们的电台。一九三一年一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就以这些器材和参加我军的国民党部队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建立了我军第一个无线电队。开始时只是抄收新闻，



接着就办起了我军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无线电队的队长是王诤同志，政治委员是冯文彬同志，教员有刘寅同志和吴如生、韦文宫等人。王诤同志和从国民党部队被俘后参加我军的其他一些技术人员，成了我军训练无线电技术人员的主要老师。在以后的工作中，王诤同志为党的无线电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国民党十七路军宁都起义时，刘光甫、海风阁、荆振昌、闻述尧、陈士吾等一大批起义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带来了许多电讯器材。从此，我们的无线电通讯队伍，就由党中央从白区输送来的同志、在战争中参加我军的和国民党军队起义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以及我军自己培养训练的工农出身的青年战士三部分人组成。并且成立了一个由王诤为局长、伍云甫为政委的通讯联络局，统一领导这一工作。

训练我军无线电技术人员的训练班，很快就由一个发展成为几个，后来又发展成为一个通讯学校。一九三三年，在瑞金通讯学校的学员已扩大到一千多人；分设无线电通信、电话通信、旗语通信和司号通信等专业。还办了一个机务人员训练班，由涂作潮领导。此外，成立了一个专门保管、修理和购置器材并装配收发报机的材料厂。

历次调来训练的学员，不论是学报务的或机务的，大都是政治机关的青年干事、指导员、党或团的支部书记、宣传员和司令部的通信员、侦察员、司号员等，他们都是部队的优秀青年。虽然他们的文化程度最高的才有高小程度，有的只上过初级小学，有的只是在参军以后才学了一点文化，但是他们来到训练班以后，对学习都非常刻苦，因

此进步很快。他们还发扬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对各种器材和文具都非常爱惜，一支铅笔用到只有二、三厘米长还舍不得扔掉，用两块竹片夹起来再用。什么勤务他们都抢着干。每当遇到敌情，他们总是以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精神，主动帮助教员和技术人员，勇敢地承担起最艰苦的任务。在行军中，他们发扬团结、互助精神，自觉地担负起保护机器安全的责任。他们就是这样一些纯朴、勇敢、既平凡而又伟大的战士，使我非常佩服和感动。这些小英雄通过勤奋学习，很快就掌握了无线电通讯这一专门技术，还学了英文、算术和政治常识等，成了无线电通讯这一行的内行和骨干。有的离开学校就担任了队长、政委或指导员。直到今天，他们中还有很多同志在电讯战线或其他战线上担任着重要的领导工作，发挥着老干部的传帮带作用！

### (三)

我们刚到江西时，由于原来缴获的发报机功率太小，没能与上海党中央沟通联系。第二次反“围剿”的前夕，逼近我军的国民党二十八师有一部功率较大的电台，它的呼号是“XN 5”，声音很响亮。我军司令部的同志和我们都在议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一定要把这部电台首先夺过来，好尽快和党中央沟通联系。五月间战斗开始后，我们在机上特别注意监听敌人这部电台的声音。果然，在战斗打响几个钟头之后，他们就呼叫“救命”，不久也就“哑”了。我们知道敌二十八师正在被消灭，这部电台一定

会被我军缴获，便全都高兴地鼓起掌来。后来我们就是用这部电台同上海党中央联系上的。

在第三次反“围剿”的繁忙行军转移中，我们始终争取和坚持了每天的架线工作。一九三一年九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党中央的电台和我们第一次叫通了。首先听到上海信号的值班员是刘寅。他高兴地立即把这消息告诉我，我马上发了一个密码电报去。这是江西根据地同上海党中央的第一次无线电通报。这晚是我们全台同志最快活的一个夜晚，大家互相祝贺，忘记了一切疲劳。记得当时有同志问我，和我们通报的上海台的报务员是谁？为了保密，我自然只能以微笑作答。从此我们和党中央使用密码经常联系了。

不久，我们中央根据地又同鄂豫皖根据地和湘鄂西根据地的电台沟通了联系。一九三二年以后，我们就可以从瑞金派出电台到湘鄂赣和闽浙赣根据地去，并且把中央根据地培养的学生派到上海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其他城市去。自从党中央建立的第一部电台，于一九三〇年一月同香港电台沟通起，到一九三二年同全国各大根据地沟通，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从此，我党我军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新的面目出现，而且随着革命的不断胜利，逐渐发展和壮大起来了。

# 庚申忆逝（之一）

张稼夫

## 前 言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大力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工作，到六中全会已大见成效，许多被混淆了的是非曲直问题，得到了纠正，保证了我们党能够继续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前进。这是一项关系到我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成败的大事，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是应当大书特书的。在十年动乱期间，被混淆了的事，既有现实问题，也有历史问题，既有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也有个人的功过荣辱问题。我亲身体会到坚持实事求是，既需要理论、见识，也需要勇气、胆量。在“文化大革命”中别有用心的歪曲事实者不乏其人，无知和幼稚的受骗者也颇为众多。对于后一种情况，可以谅解，然而谅解不能促使受骗者觉悟过来。这个情况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使后来者了解革命前辈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从中汲取教益，少走弯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经历至今萦绕在心头。一伙又一伙的外调者使得我应接不暇，写了许多证明材料。诸如，山西的青年抗敌决死队，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十二月事变，民族革命大学等许多问题，本来不成



问题的事竟然成了糊涂账，都来调查。其实，那是我们党在山西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局外人是难以理解的。例如：仅仅为了一个山西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的问题，外调者问：牺盟会是不是反革命组织？我回答：不是反革命组织，而是革命组织。外调者又问：牺盟会的会长是不是阎锡山？我回答：不错，阎锡山是会长。我的这种回答，不要说红卫兵听了要吃惊，就是不了解山西情况的参加革命较晚的干部也不好理解：反革命头子居然是一个革命组织的领导人，这真是不可思议！但是，历史事实确是如此，不能改变。为此，我对外调者不得不仔细地介绍抗日战争时期山西的形势、特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牺盟会以及其他组织的产生及其发展的历史，还要特别地反复地说清楚，阎锡山只是名义上的会长，实际主持工作的人则是共产党员薄一波、牛荫冠等同志，从上层到基层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掌握了实际领导权，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绝大部分外调者听了我的介绍，看了我写的证明材料，是满意的；有的甚至说，好象上了一堂政治历史课，气冲冲而来，欣欣然而去。与此同时，我又被迫交待我的历史，这就使我对于走过的道路作了一番又一番的回顾；本已模糊的某些历史情况，经过回忆，又历历在目。而那些历史情况又正是目前的年轻一代所不了解的。由此，我就想到，应当向新的一代介绍革命斗争的历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前两年，出于一种阶级友谊和政治责任感，我写了怀念林枫同志的文章。有些同志看了文章以后，劝我把个人的经历，特别是从太原失陷到晋西事变的这一段经历也能忆述一下。因为从领导角度能够讲述

清楚这段情况的人，已经为数不多了，并且通过个人的经历把当时党的工作的某个侧面反映出来，是有意义的。由于这些同志和近代史研究所同志的一再鼓励，我就不揣浅陋，写上几页，聊胜于无吧。

写这篇材料的本意是想总结一下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哪些作对了，哪些作错了，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加以叙述和总结；不文过饰非，不隐恶扬善，不为自己树碑立传。待这个材料写完，又感到没有多少可取的经验，深感抱愧。在写作过程中，从童年写起，是为了说明我的性格形成的过程，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在写作的方法上，只写我经历的事，听来的事不写，或非写不足以说明问题时，也要少写。因此，从一个地区的工作情况来看，我写的这份材料可能不连贯，不全面，那也只好宁付阙如，也不强不知以为知了。

我在一九八〇年即庚申年，开始写了个提纲，打了个腹稿。所以就把题目定为《庚申忆逝》。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中共山西省委、太原市委、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聂元素同志和有关的一些同志的鼓励和支持。我的写作过程是这样的：一九八一年六月我去太原，向山西省文联借调了李束为同志，向太原市委宣传部借调了黄征同志，首先由我口述录音，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的是黄征同志，在黄征同志整理的文字资料的基础上，由李束为同志加工写成本文的征求意见的初稿。初稿打印以后，许多同志提出修改意见，有的同志还提供补充材料。一九八二年春我根据这些同志的意见，请黄征同志来京，帮助我在中央档案馆和北京图书馆查阅并复印了若干必要的档案、文件

和报纸，力求本文的时间、地点和情况，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改正我自己记忆中的失误之处。五月，我得到云南省委的同意，约请李束为、黄征同志来到昆明，把稿子修改了一遍。在修改过程中，有许多地方在文字上，曾经过王修同志的加工。所以我写成这篇文章，既包含了李束为和黄征同志的大量心血，也得到了中共云南省委和以上所有同志的支持、鼓励和协助。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在修改稿写完以后，我为了慎重起见，将全稿从头至尾，又认真地审阅了一遍。当我读到第十段我将离开晋西北去延安时，想在后边再增加一点，将我自从一九二七年四月入党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的学习和锻炼的过程，回顾和总结一下。未料我这一写，就停不下笔来；当我写到若干“以身作则”地对我进行过党性修养教育的同志，特别是写到抗战以后和我相处最久的林枫同志时，就不得不写长了许多。因此，我决定将它另行列为一段，便成为这一稿中的第十一段。

张稼夫

一九八二年七月于昆明

## (一)

公元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五日，我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西北安村的一个中农家庭里。父亲四、五岁时害了一场大病，成了聋哑人，铸成了终身痛苦。母亲是个童养媳，生了我们兄弟姐妹七个。其中五个未成年，先后得病死去。

二哥从小就有些傻，家里人不喜欢他；于是我便成了全家的宝贝。

我的外祖父岳庆余，是个以编柳条筐子谋生的手艺人。他虽然是个文盲，却很会讲故事，他给我讲得最多的是关于葫芦王的故事。葫芦王是当地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曾经和李闯王的部队一起攻打太原。李自成失败以后，他仍然在吕梁山坚持斗争，劫富济贫，深得群众的拥护。外祖父讲故事有声有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我开始懂事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了。满清皇帝被打倒，建立了中华民国。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山西的同盟会员策动当地清军管带姚以价等起义，打死了巡抚陆钟琦，成立了督军府。那时，原为清军八十六标标统的阎锡山混入革命队伍，窃取了革命成果，当了山西的都督。接着，他又投靠窃国大盗袁世凯，为复辟帝制效劳；他凭仗他在山西的特殊地位，统治山西长达四十余年之久。后来山西一些有点进步思想的人，就形成“反阎派”，包括各种政治倾向的人，但都是反阎的。

记得小时候念的《革命三字经》，书的横眉上画的是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头像。课本是共和、排满的内容。奇怪的是，当时也有保皇党康有为写的《国贼孙文》的小册子，和《革命三字经》并行不悖，形成鲜明的对照。我们那个小村子也受到这些影响，民主与封建，革新与保守的斗争也就逐渐激烈起来。村里有个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名叫张鹏举，有钱有势，豢养着好多马匹，雇着好多长工，经租很多土地，是个经营地主。他仗势欺人，横行乡里，人们



敢怒而不敢言。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终于跳出一个对手，这个对手叫张序龙，人们称他为三老爷，或关东三。三老爷是个贫农，辈数大，为人正直，下过关东。村子里有打架斗殴、家庭纠纷等事，请他出来排解排解，就解决了，所以他在群众中颇有威信，起着族长的作用。三老爷对于张鹏举的横行霸道自然看不惯，在群众的支持下，站了出来，代表全村群众和他斗争。到县城打官司，和张鹏举打架，吃了亏，挨了打，也不灰心，不让步，终于把他斗倒了，而且把他赶出村去，不许回村。这件事大大鼓舞了穷人们的斗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作恶的人是可以斗倒的。

但是三老爷并不是民主势力的代表人物。他虽然代表群众打倒了恶霸张鹏举，热心公益事务，名声也好，那只不过有些正义感罢了，并不具有先进的民主思想。而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的人则是张晋瑜，号子玉。张子玉长期在外地生活，和参加辛亥革命的人物以及日本人有接触，在天津大德玉汇兑庄工作，常回家住。他带回一个留声机，装上一个大喇叭放唱片，哇哇响；又经常骑一辆自行车在村里村外走来走去，铃子咣啷响；他还能用铜烟袋和电池一接触就嗤嗤响，放火花。这都使村里人感到惊奇。他对人们说，天上的雷电是阴电和阳电碰到一起引起的。我听了觉得很新奇，很有趣。他不信神，从天津写信来劝大家把盖庙的钱用来办学堂，并向人们宣传自然科学知识。虽然他对人很热情，但是人们都叫他“魔鬼”，因为他不信神，还想打掉神像。尽管他被认为大逆不道，但是他的一系列言行在许多人的心里却引发了民主与科学的火花，播下了

追求进步的种子。他留给我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

就是在这种封建和民主、保守和革新的激烈斗争的环境中，度过了我的童年。新的和旧的东西经常在我头脑里打架，生活向我提出了许多我不理解的新问题，我思索，希望有人引导我找到明确的答案。这就初步养成了我一生中喜欢思索，凡是我尚未理解的事情，不肯轻易盲目接受的性格。

父母寄希望于我的，并不是知书达礼，作官为宦，更不是希望我成为一个造福于人民的政治家，只不过是期望我成为一个能写会算，养家糊口的买卖人。在我入私塾以前，母亲便教我识字。说来也奇怪，她一字不识，但教子心切，便从识字的邻居那里一字一句地学来，然后教给我，日积月累，我竟从母亲那里学会了《百家姓》、《三字经》和《千字文》这类启蒙小书。当我进入私塾那天，母亲特为我打了一个烧饼揣进我的怀里，烧饼上还用簪子扎七个孔，这大概是洞开七窍，顿开茅塞的用意吧。

我的第一个启蒙教师叫韩仲禄，交城县城头村人，是个清朝末年的秀才。他爱喝酒，喝得高兴了，就给人们讲故事。《聊斋》、《三国》、《水浒》，神、鬼、狐、仙无所不谈，讲得有声有色，在我的幼小心灵上幻化出若干的稀奇古怪的历史社会现象。现在想来，这大概和念书本一样，听讲故事也是一种启蒙活动吧。当时我们的课本是《论语》、《孟子》之类，不分句逗的古文本版书。我在本村学了四、五年，《四书》、《幼学琼林》、《诗经》都念了。到了民国四年，文水县的一个高小毕业生，分配到我们村里当老师。韩老师只得回到城头村继续教私塾，我也跟他到城头村学

习。韩老师有个侄子名叫韩璧，号玉人，交城县高小毕业，失业在家没事干，和我很要好，常常教我学习各种新学科。他不信神，不信鬼，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他到庙里把财神爷的胡子拔下来，还打耳光，说你这个财神爷不公道，为什么只让富人发财，不让我发财？他还把庙里的小菩萨搬回来，夜里拴在尿盆上。我是又吃惊，又开心，感到新学比旧学好。我在这里只学习了一年。这短暂的一年里，韩璧给我的影响很大，是我的头脑里无神论思想初步确立的一年。

一九一四年，文水县成立了甲种实业学校。这是我们县成立的第一个仿效西方建立的科技学校。校长是个留日学生，教员也有很多是留过日的。学校里设农、工、商科。那时，旧的东西在人们的头脑里还很深，许多人对洋学堂不了解，几乎没有人肯送自己的孩子进这个学校。于是采取了拔壮丁的办法，每百户选送一个学生。有的村子没有人去上学，就在城里雇人顶替。我们村没人愿意去，我因受韩璧影响，自己要求去，经三老爷同意被选拔去了。

我是在一九一七年进甲种实业学校的。那时正是智力突飞猛进时期，接受能力很强，很快地适应了学校的环境。这个学堂和私塾大不相同，完全是新东西：立正、稍息，学军事体操，打野外，数理化，专业学科，还学英语。新鲜得很啊！但是好事多磨，文水县农会的会长高叙宾企图把这个学校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成为培植私人势力的阵地，想方设法破坏这个学校。我们的老师就发动学生闹学潮，把农会砸了个稀巴烂。农会会长雇上人，扬言要和学校打架。我们有位老师名叫张仰仁，是陆军测量学校毕业的学

生。他听说农会要打架，就穿上军装挎上洋刀，带上手枪，准备和农会会长打架，把农会会长吓住了。可是，到了暑假，高叙宾趁机夺了权，把原来的教师都解聘了。张仰仁老师说，我们干不成，叫他们也干不成，雇了辆大棚车，把各班的优秀学生带上，到太原考学校。这样我就到了太原。

张仰仁老师有个朋友叫肖增绣，文水大象镇人，在太原山西省立商业专门学校当校长。张仰仁通过肖增绣的关系，把我们全部放到商专附设的中专乙种商业学校继续学习，他就回到陆军测量学校去了。商业学校是比较进步的学校，宣传新文化运动，大讲爱国主义，演出反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话剧。我还记得演出《亡国恨》那个话剧的情况。戏里讲的是朝鲜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故事。据说这个剧本是农业专门学校的一个化学老师编写的。演出时，台上台下，慷慨激昂，掌声雷动，宣传效果极好。商校有个学生名叫姚聪，安邑县人，在学校办了个“互助贩书社”，影响很大。当时，具有各种思想倾向的势力都比较活跃，新出的书刊也是多种多样，给出版商写封信去，他就把书报刊物寄来，卖完再把钱寄去。这个书社给我提供了读书的方便，大开眼界。另一个同学叫支应抡，号文才，晋南闻喜县人，和我特别好。他的大哥是反阎派，在陕西冯玉祥的部队里当军官。他介绍我结识了不少晋南反阎派人物。

就在我在商校读书的时候，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消息传来，我们都很激动，纷纷走上街头，游行、集会，向当局请愿，声援北京青年的爱国行动。伟大的五



四运动，是我走向社会斗争的第一步，它使我进一步认清了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树立了改造旧社会的信念。

我在商校只住了一年。由于不喜欢商业，第二年便考入省立农业专门学校学农业。在农校住了四年，于一九二三年毕业。在这期间，把我原来的名字张法古，改为张稼夫。所谓稼夫者，即“只问耕稼，不问收获”，到处散播革命种子的意思，很有点虚无飘渺、自由主义的气味。

我在农校学习的时期，结识了不少进步青年，其中，有当时一中的学生，后来成为山西早期地下党负责人的王振翼、贺昌、李毓堂、王瀛等人。王振翼和贺昌在太原办《平民周报》，宣传马克思主义，我几乎每期都看。后来，他们组织“SY”，即社会主义青年团，要我也参加。我由于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SY”都要听共产国际的指令，没有独立性，故未参加。我自己办了个“真社”（真理之社），向教师募捐和收集各种报纸、杂志以及书籍，供同学们阅读。我同贺昌、王振翼、王仿、姚聪、郭秀峰等人，还集资在开化寺办了个“晋华书社”，推销各种进步书籍。“书社”由姚聪担任董事。这一时期，我读了很多的书，进步的、落后的，革命的、反革命的，各种思想倾向的书都读。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人的经济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罗素的数理哲学；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的佛学；欧洲和无政府主义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读了不少。总之，接触的面很宽，感到都新鲜，都有道理。我好比在十字路口，反复比较，思想斗争很激烈，不知道那一种理论能够救国救民。我也和同学们争论，常常是无结果而散。

我记得看过朱谦之的两本书，一本是《革命哲学》，一本是《现代思潮批判》。他什么都批，批马克思主义，批无政府主义，最后批他自己，什么都不要了真是可笑得很。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马克思主义有说服力，如剩余价值论、价值、价格、利润的理论，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和压榨工人阶级的本质，分析得十分透彻。我在农校的第二年，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也更多了。正因为如此，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我常常受到申斥，罚我闭目静坐自省。我好动，坐不住，就罚我面墙立正自省。然而，这一切，不仅不能使我屈服，反而更进一步加深了我对旧政权的厌恶，坚定了推翻旧制度的信念。

## (二)

一九二三年暑假，我在农校毕业了。当时，凡是山西省立高等学校毕业的学生，毕业后都发给五十块银元到外地去参观。回来后必须到“育才馆”接受阎锡山那一套反动的培训，合格者才委以各种名目的工作。许多先进学生都把“育才馆”称作“奴才馆”，不愿意去那里受训。我是学生会的主席，校里反阎派的主要人物，当然不愿意为阎锡山政府办事，所以领取了五十块银元后，便到北京去不回来了。

到了北京，我想继续求学。学什么，心中无数。我在追求、探索救国救民，改变现状的真理。但是，我当时还没有能力去总结经验教训，指导下一步的努力方向。读书很多，可是杂乱无章，不知所从。已经二十岁了，仍在万

状纷纭的意识形态领域，横冲直闯，没有明确的世界观。一种苦闷的情绪萦绕在我的心头，常常是惶惶不可终日。那时，正是五四运动以后不久，北京的各个大学都比较进步，只要不要文凭，哪一个大学都可以进去旁听，只要是穿长衫的，进出畅通无阻。我的盲目性很大，没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只要有可能，什么课我都去听。我本来学英语，听说蔡元培、马叙伦、鲁迅常去世界语专门学校上课，我也去学世界语。这时，我经济拮据，生活发生了困难。我想用半工半读的办法继续求学，曾计划成立个贩书社，一边卖书一边求学，未料到北京的房租押金太贵，此路不通，只得另作打算。我又曾联合了几个人，想到蒙古去搞“新村”。所谓“新村”，也就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一种不切实际的设想。当时，欧、美、日本都有办新村之说。但讨论来讨论去，不知该如何办，终于无结果而散。接着发生了曹锟贿选事件，我参加了一个学生敢死队，反对贿选总统运动。不久爆发了直奉战争，冯玉祥倒戈，曹锟被打倒，宣统皇帝被逐出皇宫。戏剧一般一幕接着一幕，北京城热闹得很。这时由冯玉祥率领的国民一军和胡景翼率领的国民二军进驻北京。胡景翼是老同盟会员，颇有胆识。他经过刘守中把我们那个学生敢死队改编为学生队，收编到第二军，列为营级编制。学生队的队长是陈春培，云南人。我被任命为上校政治教官并兼营军需职务。胡景翼收编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其目的是吸收新鲜血液，逐步改造他那支落后无知的旧军。所以我们这支学生队受到他的特别重视和信任。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孙中山先生到达北京，胡景翼派我们学生队去给孙先生当卫队，受到了孙先

生的赞赏。

不久，国民二军调驻开封。胡景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王用宾为秘书长，他们为了扩大学生队，又招收了一些青年学生，把学生队分为两个队。一队队长是陈春培，二队队长就是刘天章同志，他是陕西人，北大的学生。此时，学生队干得有声有色，革命气氛非常浓厚。到开封后，国民军要扩充队伍，就派我到长沙招学兵。当时，毛主席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但是以赵恒惕为首的反动势力也很猖狂，斗争非常激烈。我拿着胡景翼写给赵恒惕的公函，带了两个人，一个叫田嘉禾，湖南湘西人，一个叫薛同文，山西霍县人，到了长沙。赵恒惕的参谋长龚浩负责接待我们。我们在长沙登了招生广告，报名的十分踊跃，一下子就招了好几百名青年学生，顺利完成了任务。这次和我们一同来长沙招兵的还有王英如。王英如字亦侠，山西临汾县人，太原女师毕业，曾担任临汾县女子高等小学校长，后来考入北京世界语学校。我和她就是在这个时候结婚的。

大约在一九二五年的夏秋之交，军长胡景翼因臂上患疔疮突然死了。岳维峻接任二军军长，李纪才任开封警备司令。这些人行伍出身，看不惯学生队的革命作风，一上任就把我们的枪支收缴了。学生队处于解散的状态。这对我的打击很大。这时黄埔军校正在招收第四期学员，我就把好多学生送去考黄埔军校。没想到却惹恼了队长陈春培，说我拆他的台，撵我离开了部队。于是我就和王亦侠到了北京。

我们到了北京就去找高长虹。他是“狂飙社”的主将，



山西省孟县人，是我在太原结识的朋友，当时他住在北京沙滩的一个公寓里。他通过郑效洵介绍我去北京汇文中学教书，我当了不到一年的中学教员。

一九二六年夏，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北伐军节节胜利，短短三个月，就打到武汉，国民政府也随着迁到武汉。武汉成了全国革命中心。消息传来，我们心情非常激动。不久又听说，黄埔军校在武汉开办学校，并且招收女生队。王亦侠要去报考女生队，我也要去投奔北伐军，这样我们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北京。于一九二七年初，先后到达武汉，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活。

一九二七年初，共产党的中央机关也迁到了武汉。群众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前线不断地传来胜利消息。在总工会负责人刘少奇等同志领导下，数十万劳工群众举行示威大会，革命群众占领并收回了英租界，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我们就是在这种高涨的革命形势下到达武汉的：王亦侠考取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女生队，她是山西籍唯一的女生。我经人介绍到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教员。这个讲习所是毛主席继广州农讲所之后在武汉创建的第二个农讲所，毛主席任所长，周以栗同志任教务主任。周以栗分配我教农业常识课。当我在太原农专上学时，就十分重视实际应用。回到家乡我就将学到的现代农业科技，讲给农民听。但农民不感兴趣，这是由于土地分散和农民的贫困化，无法采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因此，当我在农讲所讲农业常识时，就想到当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改革后，不采取合理化办法是无法应用现代农业技术的。我讲农业常识课，实际上重点讲的是农业经济，

农业组合，即农业生产组合、消费组合等。因为当时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但土地分散以后，怎样组织起来应用现代农业技术？这是个新问题。所以我重点讲农业组合，实际上就是合作化。讲义全部由自己编写。我白天上课，晚上写讲义，常常通宵不眠。离我的住处不远，就是铁军四军叶挺独立团的营房，往往军队的起床号响了，我才能躺一会，然后就去上课。尽管如此，由于受到整个革命形势的感染，不但不感到疲乏，白天还要挤时间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当时国民革命军的总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的著名左派人物邓演达，副主任是郭沫若，宣传科长是潘汉年。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办了一张《革命军日报》，它的副刊叫“革命青年”，副刊的编辑是高歌。高歌是高长虹的弟弟，我和他是在北京世界语学校认识的。他经常约我写稿，在“革命青年”上发表，署名张勉，有时也署勉子。

在这段时间里，我结识了不少共产党人。我亲身体会到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解放，表现出的那种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远大的理想和求实作风，倍感钦佩。不久，即四月十二日，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时刻，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残酷地屠杀共产党人。这一血的事实给了我极其深刻的教育，认识到，中国的革命依靠旧军阀以及他们领导的旧军队，是没有成功希望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党，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我坚定地选择了共产主义的道路，向组织提出了我的入党要求，把入党申请书交给了曹汝谦同志。曹汝谦同志，字效公，山西省应县人，当他在广州工作时，很受周恩来同志的器重，北

伐时被分配在何成濬师担任党代表。在武汉这段时间里，我和他交往甚多，受益非浅。我的入党申请书是经他看后，然后由他送交党组织的。四月下旬，曹汝谦同志找我谈话，通知我已被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从此我被吸收进我国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行列。

### (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以后，鉴于当时的险恶形势，毛泽东同志指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提前毕业，分散回去搞农民运动。这时，曹汝谦同志调到湖北省政府警卫二团担任党代表，住在南湖。我也被调到曹汝谦同志那里当宣传干事。王之铭在那里当组织干事，郭扶人当秘书长。

四月下旬，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大会对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批评，但是没有能够真正加以制止和克服，也没有在组织上把陈独秀从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大会以后，他仍以总书记的身份发号施令，继续推行投降主义路线，使革命陷入愈来愈深刻的危机，使党的事业招致了极大的损失。不久，在五月中旬，驻扎在武汉西侧，用以防备四川军阀的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的收买和策动下，乘革命军远在河南前线，后方空虚之机，勾结十五军刘佐龙部和川军杨森部，悍然进攻武汉。夏斗寅率领叛军一直打到离武昌十里的纸坊，形势非常危急。就在这危急关头，叶挺同志率领部队从河南前线，星夜返回武汉，向叛军进行英勇反击。武汉的工人、农民、

纠察队和学生，都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斗。我们警卫团和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生，包括女生队，全部上了火线，打退了夏斗寅叛军的进攻。但是，战斗刚刚结束，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蒋介石的策动下，又于五月二十一日在长沙发动叛变。反革命武装查封了湖南省总工会，解散了省农民协会、国民党省党部、省党校和其他革命团体，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装解除，并捣毁了省特别法院，将监狱中被监押的土豪劣绅尽行释放。所有拥护武汉政府，反对蒋介石、铲除土豪劣绅的标语，都被撕毁。大批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逮捕残杀。反革命势力还组织了反动政府，成立了清党委员会。蓬蓬勃勃的革命中心武汉，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就是历史上的“马日事变”。

与此同时，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高喊“左派站过来，右派滚出去”的汪精卫，却摇身一变，露出了他的反革命真面目，下令禁止土地革命，解散了湖北省两个最大最有影响的黄岗和黄陂农民协会，扼杀农民运动。汪精卫还撕毁了国民政府聘请苏联军事顾问的协议，接着又召开秘密会议，在七月十五日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他还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的口号，并在全省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全国性的革命团体，如中华全国总工会也被解散。不久，宁汉合流。至此，轰轰烈烈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终于因蒋介石、汪精卫的相继叛变革命而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曹汝谦等同志和我隐蔽下来，根据中央的指示搞兵运工作，疏散、安置从前线撤退下来的部队



人员。这时党中央发了一个指示，号召党员转入地下，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积蓄力量，待机而动。但是在军队中工作的党员必须听候中央的统一安排，不准自由行动。这项工作是由周恩来同志亲自抓的，具体的工作由曹汝谦同志等搞，我也参加了这一工作。从事军事工作的党员干部，分别安排在京山、黄冈、麻城、六安、亳州等地，因为这些地方，我们党的群众工作有基础，便于掩护。当时的武汉已是一个恐怖世界，只能悄悄地接个头，告诉他们去哪里，找什么人，给点路费，立即离开武汉，奔赴目的地，想多谈一会都不可能，紧张极了。

兵运工作结束以后，曹汝谦同志说党中央将迁往上海，通知我作些准备，和他一同去上海，接受新的工作任务。王亦侠这时由于有了身孕，行动不便，我就通过北伐第六军十八师的关系，把她安排在十八师师长张轸的家里当家庭教师，以此为掩护，隐蔽下来。在十八师有一个团，从团长一直到营、连、排长，不少的人都是我在河南开封搞学生队时的士兵。团长周屏仲就是学生队的一个连长。十八师的师长张轸是国民党的左派，后来在解放战争中起义。临上船时，曹汝谦同志接受上级指示，要他随何成濬的部队到北平去。他向我交待了到上海后的接头地点、人名和暗号，我便一人离开武汉。到了上海，我按照规定去接关系，不料暗号对不上，联络站已经被敌人破坏。我只好又回到武汉。此时曹汝谦同志已去北平。我和组织上失去了联系。为了站住脚跟，隐蔽下来，通过张轸和周屏仲我就到了十八师，被任命为师部的少校参谋。宁汉合流以后，程潜也倒向蒋介石一边，回师西征，去打唐生智的部队。

张轸对此很不满意，成天骂娘。后来，蒋介石进一步收买和控制这支部队，把所有国民党的左派都换掉了。原第六军的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林伯渠同志也被“礼送”出了第六军。其他一些党员也都转入了地下，停止公开活动。蒋介石另派了国民党右派分子张在礼到六军当政治部主任。这时我也不想在十八师呆下去了。大约是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下旬，十八师在半壁山和唐生智的部队打了一仗。这时，我得了痢疾。病好了以后，我就向张轸提出，不再跟部队走了，请他们把我送回武汉。回到武汉时，王亦侠快要生产了，在武汉也很不安全，我俩商量决定先回山西，将来把孩子留在老家，再去找党的关系。就这样，一路冰天雪地，风声鹤唳，回到了临汾。这时已是一九二八年年初。由于农讲所和黄埔军分校中的叛卖分子的告密，阎锡山对我和王亦侠已经发了通缉令，我们的处境更加困难了。

风声越来越紧，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消息不断传来。阎锡山也挂起了青天白日旗，到处搜捕共产党员。我们认识的一些人，杀的杀了，没有杀的也关进了反省院。我和王亦侠已经看到了通缉我们的文告内容，看来在临汾呆不住了。我俩商量，由她带孩子到山区农村隐蔽起来，我避开太原走茅津渡，沿陇海路去上海或北京，找党的组织。

我听说嘉康杰同志在运城，路过运城时我去看望了他。他是大革命时入党的，夏县人，是我在太原省立农业专门学校时的老同学。他对人热情，办事大胆，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他原在运城办了个河东中学，太原还有分校，有点教育救国的思想。入党以后，把河东中学改名为中山中

学，继续办教育，其目的则是培养一代新的革命战士，宣传革命思想，志在大干一番革命事业，影响颇广。他见到我非常高兴，竭力劝我留下来，他说目前去上海、北平，能不能找到党很难说。又说，咱们在中条山打开一个局面，建立苏维埃，同样是革命，到那时党自然会来找我们。我感到嘉康杰颇有雄心壮志，干劲十足，他那一套想法很合乎我的口味，被他说服就留下来。他说，通缉令没有什么关系，眼前先避一避风头，过一段时间就没事了。他是个坚定的反阎派，说话时总是骂阎锡山。他把我安排在夏县水头镇附近的一个道观里，派了两个学生保护我，照顾我的生活。白天，我哪里也不去，坐在土窑洞里修改在武汉农讲所的讲稿，晚上出来放风，有时到附近村里看蒲剧。光阴似箭，不知不觉暑假已过。嘉康杰看着风声不太紧了，就以我的农业专门学校出身的招牌，仍用我的旧号张宜今这个名字在运城招生。这时，他又租了两处大院子，扩大中山中学。我也给他鼓劲。这时，王亦侠也来了。嘉康杰跃跃欲试，计划把学生拉上中条山大干一场。

这一年的冬天，我得了肺病，大吐血，不能教书了。嘉康杰就把我介绍到平陆县第三区岔口村一个名叫冯子健的人那里养病。冯是一个地方实力派，自己有矿山，有武装，也是个反阎的人。阎锡山的县政府也不敢轻易动他，他那里可以做我的庇护所。我和王亦侠去了以后，经冯子健提议，准备把王亦侠安排在岔口学校教书。不料这件事被这个地区一个姓郝的绅士知道了，他老婆在岔口教书，怕王亦侠抢了她的饭碗，就偷偷地给县政府写了个报告，说我们是共产分子，在岔口宣传赤化。县长彭继先就派人

和冯子健谈判，要他交出共产分子张稼夫夫妇。我还记得，县上派人来抓我的那天，下着鹅毛大雪。但是，冯子健不允许在他这里抓人。最后，双方商定，人可以不抓，但必须限期离开平陆县，实际是驱逐出境。看来在这里呆不住了，冯子健就派人护送我们出境。这样我和王亦侠一齐去了北平，时在一九二九年初。

我在北平到处打听曹汝谦同志的下落，想接上党的关系；但无法找到曹汝谦同志，自己却被阎锡山的黑手发现了。当时阎锡山是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他的部队驻扎平津一带。第三集团军的政治部，住在北平东四六条。里面有我在武汉农讲所的一个学生，名叫田莘年，他向政治部主任李冠洋告发了我，说我是共产党，并报告了我住的地址。政治部要来人抓我。但是政治部里还有我一个朋友，名叫朱紫晶，给我通了信，要我躲一躲。我还有一个文水甲种实业学校的同学，名叫梁宝信，黄埔四期的学生，在北平市党部工作。我找到他，请他帮助疏通一下，这才没有抓我。但是，住在北平仍有危险，而且曹汝谦同志也无音信，党中央在上海，我想还是到上海去为好。我和王亦侠商定，通过我的一个朋友蒙仲目的帮助，王亦侠到陕北榆林女师教书，我就到上海去了。

#### (四)

我到了上海，住在四川路“狂飙出版部”，当时高长虹不在上海，只有郑效洵在那里守摊子。那时上海白色恐怖十分严重，要找到党组织并不容易。后来为了维持生活，



我就把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讲稿，改写为《中国农民经济问题》交给郑效洵，让他帮我找地方出版。郑效洵就去找潘汉年和张申府。潘汉年在武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办《革命军日报》时，我经常给报纸写稿，同他来往较多。张申府是我在北京时认识的。他们看了我的稿子后，把我介绍给陈翰笙。陈翰笙是江苏无锡人，北大历史系的教授，曾留学美国，和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的关系很好，和苏联塔斯社也有联系，在学术界颇有影响。他在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中受过伤，现在是中共党员。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以后，蒋介石要在南京建立中央研究院，聘请蔡元培先生任院长。蔡元培和蒋介石有矛盾，不愿意去南京，就在上海搞了个中央研究院上海办事处应付蒋介石，任命杨杏佛为办事处总干事。此外，蔡元培在上海又办了个国际书刊交换处，同时，又在法租界福开森路办了个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下设民族学组、法律学组和社会学组，他自己任所长兼任民族学组组长。法律学组组长是王云五，社会学组组长是陈翰笙。社会学组的主要任务是搞社会调查研究，特别着重于农村调查研究。同时，上海的北新书局的《北新月刊》也要出一期“农村经济”专号。因此陈翰笙看了我写的《中国农民经济问题》书稿后，非常高兴，说这部书稿可以发表，预付了我二百元稿费，并聘请我参加他领导的社会学组，和他一起到无锡去搞农村调查。这样，我就成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成员。既然有了立足之地，就有了充裕的时间找党，也就不那么发愁了。

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地下党负责人是李苍江，他是

江苏宜兴人，无锡师范毕业，名义上是在社会科学研究所搞剪报工作。他对我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要吸收我入党，向潘汉年作了报告。潘汉年知道我在武汉写过入党申请书，他说如果有人证明我已经入了党，就可以恢复党籍。否则，就由他和李二人介绍我重新履行入党手续。我对他们说，曹汝谦同志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现在北平搞兵运工作，可通过组织查证。不久，经过曹汝谦同志的证明，很快恢复了我的党籍。从此，我又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心里踏实多了。这个党支部共有十多个党员，其中有一个女同志，名叫吴婉贤，支部常在她家开会。我们这个支部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党支部，都在法租界，均为文化机关支部，属上海市委法南区委领导。交通大学地下党的支部书记是乔魁贤，成员有孙克定、王镇钰等人。另外还有刘芝明，是东北人，“九·一八”以后，在上海组织“东北旅沪同乡会”，他以东北旅沪同乡会会长名义，宣传抗日，活跃得很。法南区委书记是一位姓李的同志，我们都叫他大老李。具体负责和我们联系的是邓拓同志。那时我们的对外半公开的组织叫做“社联”，即社会科学家联盟，是上海八大联之一。

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前，我们的支部书记是李苍江同志，四中全会以后，他调走了，支部书记就由我接任。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一、利用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招牌，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我们在许多学校、机关，建立了“社联”基层组织，对外称“社研”，即社会科学研究会，是学术团体，组织工人、学生和职员学习马克思主义。我们还经常到各个基层的“社研”组织去讲课，办夜校，教

育、培养了不少工人和青年学生，扩大了党的外围组织。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壮大了党的队伍。

二、利用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合法身份，掩护党的干部和各种活动。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叛变，使中央受到很大损失。恽代英等同志就是这时牺牲的。那一时期，我们社会科学研究所成了“保险柜”，这是因为有蔡元培和中央研究院的招牌，又是在法租界，我们为学术机关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许多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到我们这里隐蔽过，有时还在我们地下剪报室开会。由于党的纪律，对于来我们这里隐蔽或开会的人，从不打听姓名。直到在延安见到刘锡五、曹轶欧等人，谈起在上海的情况，我才知道他们曾在我们那里隐蔽过。当时，“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命令基层党组织搞飞行集会，游行集会，散发传单，而且是定时、定点，给党的基层组织造成许多无谓的牺牲和极大的困难。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服从上级指示，参加了这些活动。同时我也向中央写过报告，希望改变这种作法，充分利用我们合法的身份，多吃一些调查研究工作。这样的报告我不止写了一次，都是通过邓拓同志转给中央的，但都是石沉大海，没有反响。

三、进行调查工作。如，一九二九年暑假，我们社会学组到无锡作农村调查，参加这次农村调查准备工作的有：陈翰笙、王寅生、王立我和我。王寅生是陈翰笙的学生，无锡师范的学生，后来考入北大，曾经在李小峰的北新书局工作。王立我是从金陵大学请来的，河南罗山县人，后来到了陕西武功西北农学院。另外还吸收了上海劳动大学、同济大学、无锡师范的一些学生参加这次调查活动。其中有刘端生，钱俊瑞、张锡昌、徐

燮均、李白英等。在整理调查材料的时候，薛暮桥（当时叫薛雨村）、孙冶方（当时叫席勉之）、姜君辰等同志也参加了。我们学习《资本论》，研究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分析当时农村的阶级状况，划分地主、富农、自耕农、佃农等几个阶层，列出表格，选择典型，一村一庄，一家一户地进行调查。我们调查的内容很细，包括农业生产水平，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农民的消费标准，各种税捐、人口数目等等。这种深入的调查工作，使我们了解到农村的许多真实情况，对于国民党统治下的广大农民的悲惨境遇，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尤其是，通过调查培养、锻炼了自己接触群众，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又如，一九三〇年暑假，我们去河北清苑县进行农村调查，也是采用这种方法。当时，北平的社会调查所也派人参加了，其中有该所的韩德章等人。参加这次农村调查活动的还有：保定二师的石凯福、项世澄以及薛品轩等人。通过这次调查，使我了解到北方农村情况和无锡农村情况的很大差别，河北的经营地主多于纯粹出租性的地主，中农户数的比例大于贫农户数等等。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寇对上海发动进攻，驻守上海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的推动之下奋起抗战，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但蒋介石反动集团却采取妥协投降政策，下令十九路军停止抵抗，破坏上海军民抗战。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激愤。我们地下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发动上海群众进行支持十九路军的活动，宣传演说，募捐劳军，组织救护队，抢救伤员，大长了十九路军将士的志气。我们还和交通大学党支部共同组织了



“徐家汇民众抗日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受到上海军民的赞扬。但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方法方式不够谨慎，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发现了社会科学研究所有共产党组织，于是国民政府下令让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迁往南京，置于国民党中央的直接监督之下。临行前，党中央派人找我谈话，说四中全会以来，南京地下党组织屡次遭到破坏，希望我们到南京后，把南京地下党组织恢复起来，并决定要我担任南京市委筹委书记。

我在上海工作将近三年。在一九三一年时，我的肺病大发作，大吐血。在海格路红十字医院，接受人工气胸疗法，动了手术。手术以后，我每隔十天都要到医院里去充一次气。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迁往南京以后，也没有间断。当然，病是一件坏事，但是病却给了我一个来往于南京、上海的借口。我按时到上海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工作，传递情报，并得到指示。

我们是在二月间搬迁到南京的。这里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控制极严。我第一次来南京工作，人生地不熟，还要时刻戒备敌人的暗算，行动格外谨慎。为了便于工作，我每天中午去中央大学吃包饭，尽可能多认识一些人，和知识分子以及上层人物接触接触。我也利用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公开身份，胸前戴上中央研究院的圆牌，进出于国民党南京党部和各大专院校。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有进步人士，也有反动分子。我因人制宜，对进步人士和不那么反动的人，就宣传我们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倒行逆施的劣迹。对于其他一般的社会关系，通过接触我能得到一些我们需要的情报。例如，南京党部有个叫

荆有麟的，是晋南人，我就利用老乡关系，从他那里收集到不少有关国民党内幕的情报。在南京市兵工署，我们也通过一位过去的同事张辅良，了解到若干兵工署的内部情报，及时报告了上级组织。

在南京市委筹委工作期间，我发展了两个党员，一个是张西涛，一个叫李光军，都是山西省平陆县人。张西涛是黄埔军校四期学生，入党后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其中包括搞到国民党内部用的军用地图，以及对苏区的“围剿”计划等重要军事机密。李光军是黄埔武汉军分校的学生，入党后工作很积极，也为党做了不少工作。

南京地下市委筹委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但是上级党组织一再催促我们要在南京开展群众性的骚扰蒋介石后方的活动，以牵制“围剿”苏区的注意力。于是，我们在南京市内贴标语，散传单。我到中央大学吃饭，还把传单散在饭厅和校园里，甚至把标语贴在南京市警备司令部的围墙上，确实弄得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不安宁。同时这也引起中央研究院负责人的不安，到七月份就把我解聘了。于是，我就到上海请示上级应当怎么办。和我接头的是黄大伟同志，他指示我回山西，在老家西北安村养病，同时建立联络站，负责中央苏区和陕北苏区的联络工作，并说这是中央决定的。他还告诉我，等我回到山西，就把我的组织关系转到北方局，由北方局派人和我联系。我回到南京，把筹委的工作安排了一下，就离开了南京。

我在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了将近三年，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工作了四个多月，兢兢业业，不管工作多么紧张，身体怎么不好，但是心情非常愉快。在党的领导下，受到

很大教育，增长了很多知识，积累了一些斗争经验。但是由于工作的不够谨慎，暴露了身份，给党造成了损失。后来，据我所知，我离开南京不久，一九三三年的下半年，张西涛同志不幸被捕。接着，石凯福也被抓起来了。李光军被迫出走，到了天津。他给我寄来一封信，说他“失恋了”。暗示他和组织失去了联系，问我怎么办？当时，我也和组织上断了联系，因此，也无法给他帮助。其余的党员以及进步的人士均被解聘，逐出中央研究院。南京市委筹委又受到一次打击。从我们在基层工作的人的亲身感受中，可以看出“左”倾冒险主义为党招致的损失是多么严重！我常常回忆这段历史，并且提醒自己：这一惨痛教训，是万万不可忘怀的。

## (五)

一九三二年七八月间，我离开南京回到山西老家工作。到了临汾，和王亦侠会齐，一起回到了西北安村。

我回家不久，广惠渠发大水，从汾河引水的大渠孔村堰决口了。我在家协助家乡搞水利，还被乡亲们选为村长。我在社会上也广交官员、士绅、知识分子以及各阶层的人物，建立了广泛的社会联系。当了两年村长，把我的家产赔了个精光，一时传为奇谈。但我的社会联系越来越广泛了。交城县的公安局长白仙渊，浑源人，是我在太原农校的同学，要我介绍些人给他。我就把那些比较正直、会武术的小伙子给他介绍了不少，实际上也是安插我的人，抓枪杆子。我在西北安村一共呆了两年多，算是站稳了脚跟，

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等待北方局组织来和我接关系，但始终没有等来，也不知出了什么问题。朝思暮想，心急如焚，于是起了外出找党的念头。那时我的肺病又发作了。我对乡亲们说要到外地看病，实则为了避免村里人继续选我当村长。于是便到北平去了。

一九三四年冬，为了和北方局取得联系，我到了北平，住在宣武门附近的一个小公寓里。我一面看病，一面找熟人打听北方局的消息。

一九三〇年我在河北搞农村调查时，认识了北平社会科学调查所的韩德章等人。韩德章等知道我到了北平，就和我取得了联系。这时我才知道他们在天津编《益世报》副刊“中国农村经济”，每星期出一至二期。韩德章约我为《益世报》副刊写文章，我刚到北平，生活无着落，当下也难找到北方局，就答应了。把我在山西农村了解到的情况写了一篇文章，以张稼夫的名字，发表在《益世报》的副刊上。我用张稼夫的名字公开发表文章，意在找党，其实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以后薛品轩来看我。他和我曾在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一起工作过。他为人正派，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也了解我们党的一些活动，有时还为党做些事，但当时没有入党要求。他被解聘以后，通过关系回到北平，在北平法商学院学习。他看见我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张稼夫三个字，大吃一惊。对我说：“你怎么这样大胆，上海、南京的国民党特务正在找你，你还敢把名字写在门口！”接着，他告诉我，张西涛被捕了，石凯福后来也被捕了。石凯福被捕后写了脱党声明，表示不革命了。他让我赶快把门口的牌子摘掉，



重写了一个假名字，又劝我另外找一个地方住。我问他，石凯福现在在哪里？他说，石凯福出狱后，觉得没脸再见人，隐姓埋名，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又把来北平找北方局的事告诉他，他说愿意帮忙，劝我不要着急。事实上，以后我和北方局接上关系，他起了重要作用。薛品轩走了以后，我就从公寓搬了出来，后来根据薛品轩的建议，搬到北大农学院附近的罗道庄一个小小的农村公寓住下，一边养病，一边打听北方局的所在，有时也到城里看望朋友。与此同时，给报纸、刊物写点文章，以维持生活。《动乱前夕的山西政治与农村》，就是应薛暮桥同志之约，在此时写的，署名悲笳，发表在《中国农村》杂志上的。这些文章都是以我在文水县西北安村当村长时收集的材料为基础写作的，其内容也都是以山西农民的悲惨生活事例，揭露阎锡山的黑暗统治，以及农民的反抗斗争。

一九三五年末，在北平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大中小学生纷纷上街游行示威，抗日爱国运动波及全国。我也投入了这一运动，参加了示威。也就是在这一运动中，我认识了一些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知道我的情况，也很同情我，但都无法找到北方局。后来，经过薛品轩的介绍，我结识了张路一，他从薛品轩那里了解到我的一些情况，对我很亲近。有一天，他领来一个小青年，这个青年人连童声还没变。张路一说，他叫张骁，他可以帮忙为我给北方局送信。我自己心里顾虑重重，可是，除此而外，别无他法。最后，我还是写了个报告，叮咛再三，把报告交给了小张骁。从此以后，我再没有见到他。直到前年，我在科学院教育局见到一个名叫张

文松的同志，觉得此人很面熟，我通过人事部门一查，原来他就是当年帮我送报告的张骁。我问他还记得不记得送报告的事，他说为了送那个报告，还受了批评。就在张骁把我给北方局的报告拿走以后不久，北方局一个姓李的同志托人转告我，说我给北方局的报告收到了。经调查研究，认为报告是可信的，同时对我在文水县的工作表示赞扬。但又说，北方局至今没有收到过上海党组织转来的关系，待查清以后通知我，要我安心养病。至于工作问题，待以后安排。这时已是一九三六年春天了。

不久，我得到红军在山西渡河东征的消息，并且看到了“东征宣言”。接着又得知，红军已经占领了晋西地区，先锋部队南到侯马，北达晋祠。这消息使我兴奋不已。红军已经到达我的家乡，我还坐在北平干什么？于是我就匆匆离开北平，回到了山西。

## (六)

我从北平回山西的打算，是想和红军接触，尽我的力量做一些工作。但我回到山西时，红军已完成任务，发出回师通电，撤回黄河西岸去了。于是，我就到了太原。随后，通过赵青誉介绍，到了省立第一师范教书，暂时有了个立足之地。

红军东渡时，阎锡山惊恐万状。红军回师以后，阎锡山便掀起了白色恶浪，在太原和各县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甚至逮捕普通老百姓。只要被认为是可疑者，就被刑讯，甚至虐杀。在太原市，任意搜查民房，无端检

查邮件，没收、焚烧书店进步书刊，没收货物，查封商店。这一时期的山西，特别是红军经过和影响所及的地方，城市里百业萧条，乡村是路断人稀，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但是阎锡山的暴行，压不住群众的愤怒，革命的烈火终究是会燃烧起来的。

我到太原不久，北方局派李宝森同志来太原，负责恢复中共山西省工委，整顿党组织的工作。他是山西清源县人，过去曾在山西大学读书。他爱人是太原城内大风客栈老板的女儿，也是共产党员。李宝森同志到达太原后，托郭森宇给我捎来一张条子，说要找我，这样我们就在约定的时间会了面，接上了我的组织关系。

我长期在南方工作，对于山西党组织的情况，只听过一些传闻，并不了解内情。这次回到太原，才知道一些情况。据了解，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由于阎锡山宪警特务统治和残酷镇压，以及山西党组织受“左”的影响，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轻敌，所以屡遭破坏。不少优秀党员被捕被杀，有的被迫离开山西，开展工作相当困难。例如一九二七年夏，山西省委书记王瀛同志刚回到山西，即被捕杀。此后，党组织一再恢复，又一再遭受破坏。不过阎锡山一般是采取比较隐蔽的先打进来然后一网打尽的做法，或假借种种名义加以暗杀、拘捕，关进监牢、训导院或反省院（中央系），具有很大的欺骗性。阎不仅对中共如此，就是对于蒋系国民党系统的CC和复兴社也是一样，他们均无法在山西境内存在。红军东渡回师之后，尽管阎锡山加强了镇压，革命力量仍是有增无减。我党的抗日主张经过我军东征宣传，就更加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党的力量又有

了新的发展。李宝森同志领导的我们这些党员，接受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工作搞得比较扎实。在此基础上，根据北方局的指示，恢复了山西省工委，李宝森同志任书记，武永祥同志任组织部长。武永祥是平遥县人，曾在太原师范读书。他以“新新通讯社”记者的身份作掩护，未离开过太原，也保护了一批党的骨干力量，并保持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恢复山西工委的工作，开始主要是依靠了武永祥保存的骨干力量。工委的宣传部长是赵仲池同志。我是工委的文教委员，负责和新闻、文化界人士的联系。当时，和我有联系的有亚马、卢梦等人。卢梦现在在北京文艺界工作，他是我介绍入党的。刘子超、温建功、宋维静、朱宝善等人也是由我联系。从外地回到山西来的人也由我负责联系，如雷任民同志，他于一九三六年回来以后，就是由我接转的关系。后来，为了加强文化界的工作，又办了一个中外书店，推销一些革命书籍，建立了一个文化界接头的地点。

一九三六年十月，北方局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派张友清同志来山西，主持省工委的工作。张友清同志是陕北神木县人，是我党的久经考验、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他年轻时曾在太原第一中学读书，和郝广盛同志在北京中国大学入党，曾在黄埔武汉军分校学习，李光军是他的好朋友。那时他们于礼拜日常到我的家中来聚会。郝广盛同志在反击夏斗寅时牺牲了。张友清原名叫张学静，是被送到安徽亳县杨虎臣部工作的，随后长期担任地方党的领导工作，曾担任过北平市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等重要职务，和张友清同志一起先后来山西的还有徐子荣同志和赵振声（即李葆华）同志。他们来太原后，张友清同志就住在胡



西安家里。胡西安是共产党员，和阎锡山有点亲戚关系，住在他家不但保险，还便于了解官方情况。赵振声同志住在武永祥家里。那时，我住在太原南新华街，徐子荣同志住在我家。我是个穷教员，不大为人注目，工作倒也方便。后来住在我家的还有一个省工委的秘书，名叫张永青，榆次县人，对外他就叫我表哥，叫王亦侠表嫂。当时王亦侠负责太原纱厂和纸烟厂的女工工作。我们和张永青同志处得很好，至今他还叫我们老两口“表哥表嫂”，改不过口来。

张友清主持山西工委工作以后，李宝森同志调离，又增加了徐子荣同志为工委秘书长，赵振声同志任工委组织部长，武永祥同志任组织部副部长，其他人事没有变动。恢复省工委以后，又恢复了太原市委，赵林同志任书记。市委主要任务是在厂矿和学校开展群众工作。当时，山西的形势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日本侵略者侵占了内蒙，正向绥远进犯，危及了阎锡山的“势力范围”，所以，他就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并于一九三六年的十月间进行了“绥东抗战”。大约就在这段时间，周小舟同志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到达太原，紧接着中央又派彭雪枫同志到太原工作，这样，就大大加强了对阎锡山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通过上层的和基层的关系，特别是群众运动，促使阎锡山的防共反共政策有所收敛，在推动阎锡山接受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成效是显著的。

在张友清同志来太原之前不久，薄一波同志接受北方局的指示回到太原，和阎锡山搞统战关系，晓以大义，推动他参加抗日。接着，根据北方局的决定，又成立了一个十六人组成的工作委员会，由薄一波同志负责，开展对阎

锡山等上层人士的工作，直接受北方局领导，不和山西工委发生联系。当时，太原还有一个由王世英同志负责的特科系统，主要任务是搞情报工作，也不和山西工委发生联系。这三个系统各自为战，统一由北方局领导，工作成效非常显著。阎锡山在我党的统战工作推动下，又迫于形势，从他自身的利益出发，开始向抗日联合方面转化。九月，宋劭文、戎子和、刘玉衡等同志发起筹备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由薄一波、牛荫冠等同志负责领导，并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调进牺盟会担任各级领导工作，其中有杨献珍、周仲英、韩均、董天和、廖鲁言、李力果、冯基平、徐子荣等同志，以充分发挥这个群众组织的作用。他们放手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这样就大大促使山西抗日的形势迅速走向高潮。这在全国也是突出的。

营救工作也是当时的一大任务。那时在山西关押着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其中包括我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王若飞同志。开始，阎锡山不承认太原的监狱中有王若飞同志。经省工委和薄一波同志领导的十六人工作委员会的调查并和王若飞同志取得联系以后，向阎锡山提出证据，他才不得不释放王若飞同志。接着在第一监狱、陆军监狱关押的一大批政治犯经党组织的营救，也相继先后获释。另外，阎锡山还办了个训导院。在这个训导院里，除了关押着一批政治犯，还关押着在红军东渡时俘虏的一部分红军小战士和伤病员；企图从精神上征服这批红军战士。训导院的院长是赵戴文，他是阎锡山的老师，山西省主席。院主任是叛徒郭挺乙。实际负责人是教导主任时逸之和教导员郭实甫，这两人是共产党员。后来，在这里被关押的

红军战士和其他政治犯全部被营救出来，由我们党接收送往各地、县担任领导工作；或者到军政训练班学习，学习结业之后编入决死队。这批同志和战士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党中央根据山西出现的新局面，从全国各地派来了许多优秀党员干部，并动员大批大批的革命青年到山西，参加抗日行列。当时，我们党的许多工作是通过牺盟会进行的。牺盟会有一套组织系统，薄一波同志是总领导，总部设有组织（由薄一波同志兼管）、宣传（由裴丽生同志负责）、总务（由戎子和同志负责）等部门，办有《牺牲救国》周报。各地设有牺盟中心区，各县有牺盟特派员，会员是公开身份，遍布各地，影响全省。省工委的同志也戴一枚牺盟会徽章，以作掩护。而大街上的摊贩、车夫则以佩戴此徽章为荣。牺盟会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到底有多少会员也说不清，佩戴徽章的自认为是会员。我受省工委的指示，也参加牺盟会召开的各种会议，还给《牺牲救国》报写文章。牺盟会的负责人之一宋劭文同志分管宣传委员会，牺盟会的章程、计划等大都是他起草的。这个委员会中和我经常接触的有裴丽生、赵石宾和侯振亚等同志。

当时，我还另有一个任务，就是省工委指示我到民众教育馆工作，占领这个宣传阵地，还给我派了两位助手，一个是常芝青同志，交城人，中共党员，搞文字宣传工作；一个是搞美术的，名字记不清了，这个同志后来到了延安鲁艺学习。这个民众教育馆名义上是官办的，实际上成了我们党的宣传阵地，出壁报，印宣传画，散传单，闹得热火朝天，起了不小的作用。

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山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越来越好。在元宵节那天，由牺盟会发起，太原市举行提灯游行，宣传抗日。街上到处是耍龙灯，踩高跷，划旱船的游行队伍，每支队伍都有宣传抗日内容的节目，旗帜、灯笼上写的也是抗日的、统一战线的口号。当天晚上举行各种报告大会，主题都是宣传抗日的内容，十分红火热闹。太原的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

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以前，省工委通过牺盟会等组织办起了各种训练班，如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团、国民兵军士教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村政协助员训练班、牺盟特派员训练班等。这些训练组织都是以阎锡山的合法名义搞起来的，大部分是我们党派的人主持工作，受训的也大都都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这样，就从组织上为抗日战争作了准备。当时，党的领导是完全合乎山西的实际的，是非常英明的。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不久，刘少奇同志和北方局的其他领导人杨尚昆、彭真等同志来到太原，接着周恩来同志、彭德怀、肖克等同志也到达太原。我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到来，使太原的抗日群众运动又出现了高潮。此后，为了加强省工委的工作，北方局派林枫同志任省工委副书记，协助身体有病的张友清同志工作。十月间，将我们这个要随同阎锡山总部一起行动的党委改组为中共山西省委。省委设立了军事部，从一一五师调来黄骅同志为部长。黄骅同志是湘鄂赣根据地的老同志，人很精干，军事上很有经验。在他负责军事部



工作期间，作了出色的贡献。

太原失守前大约两个星期，林枫、张友清同志找我谈话，说徐子荣同志调冀鲁豫工作，由我担任秘书长。又说，根据形势的需要，决定省委一分为四。赵仲池同志调晋西北工作，赵振声同志调到晋东北工作，徐子荣同志调冀鲁豫工作，由我担任省委秘书长。我们的任务是随阎锡山的总部南下。阎锡山走到哪里我们走到哪里，以便随时掌握他们的动向。同时，为了和阎锡山总部的称呼相对称，其他地区党组织叫区党委或工委，只有我们叫省委，实际上是各自为战，省委只是个名义罢了。林枫和张友清同志还告诉我，阎锡山的总部要搬到临汾，看来太原守不住，省委也要搬到临汾去，要我打前站，给省委找房子。我接受了任务，立即动身，到临汾去了。

## (七)

临汾是一座古城，史称尧都平阳，历来是晋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这里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是一个好地方。我到达临汾以后，首先和临汾党组织取得联系，说明此行的任务，便开始工作。我在这里比较熟悉，王亦侠就是临汾县人，工作起来尚称方便，很快在城里比较僻静的何二家胡同给省委找了几间房子。这时，安子文同志和戎子和、李哲人、胡西安同志一起也来到临汾。安子文同志是给北方局打前站找房子的，住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十一月八日，太原沦陷，省委搬来临汾，住在何二家

胡同；八路军办事处也来了，住在东关。牺盟会的领导机关，一部分新军，如李力果同志领导的少年先锋队和随营四分校也相继到达临汾，住在城里。阎锡山也来了，他预感到临汾城也守不住，又怕敌机轰炸，所以不住在城里，而是在汾河以西、土门镇以北的太涧村设下他的总部。我党中央北方局来到临汾以后，认为阎锡山的总部住在西山，为和他保持联系，随时掌握他的动向，也不能住在城里，而是应当住在离他比较近的地方。于是，就把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都搬到汾河以西的刘村镇，对外只称八路军办事处，刘少奇、杨尚昆、李大章等同志都住在那里。省委是在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能及时得到上级的指示，工作比较顺利。为适应战争的需要，还在刘村八路军办事处办了学兵队、党训班，培养军事和政治工作干部。

我和林枫同志是在太原失陷前才认识的，到临汾城在一起工作，感到他忠诚厚道，平易近人，彼此很谈得来，有点一见如故的味道。和他谈得最多的是有关阎锡山的历史政治问题，以及关于山西社会和农村情况。他是那样耐心地听取我的陈述，并表示同意我的观点，这对于随后决定我党对阎锡山的一系列政策，起了一定的作用。

不久，我接受省委的委托，到运城去扩兵。当时，经过平型关、阳明堡等战役，我八路军虽然取得重大胜利，但部队兵员急需补充。周恩来副主席到达临汾以后，向省委提出“二十天扩兵三千人”的任务。时间紧，任务重，困难也比较大。省委考虑到我曾经在运城教过书，熟人比较多，就决定派我去完成此项工作。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以省委代表的名义立即动身赴运城。当时，运城属河东地

下党特委领导范围，特委书记是阎子祥同志。经了解，特委内部很不团结，阎子祥同志和嘉康杰同志矛盾较深。嘉康杰同志开始曾到临汾东关找彭雪枫同志，后来找杨尚昆同志，经杨尚昆同志介绍，又来找我解决问题。从他的谈话中我大致了解了他的情况。他长期和党失去联系，在中条山组织游击队未获成功，也不敢下山，消息十分闭塞，甚至对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不甚了了。一听说要和阎锡山搞统一战线，就大吃一惊，怎么也接受不了。我和他谈了很长时间，还让他看了文件，思想才逐渐搞通。我知道嘉康杰同志在这一带影响很大，群众基础很好，就请他帮助搞扩兵工作。后来，顺利完成扩兵任务，他起了很大作用。

在运城，通过地下党组织，进行了扩兵的宣传动员工作，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保证扩兵任务的完成。晋南是反阎派占优势的地区，同时红军东渡时宣传抗日，对群众秋毫无犯，在群众中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一听说八路军扩兵，广大青年纷纷响应，报名参军。在扩兵过程中，林枫同志还到侯马、运城检查工作，帮助解决问题。扩兵任务超额提前完成。新战士分别送到运城、侯马两地，集中整训后分别补充给一一五师和一二〇师。

我回临汾后，知道林枫同志已调到北方局，接替彭真同志任组织部长。张友清同志仍任省委书记，我兼任宣传部长，黄骅同志还是军事部长。由于战争的原因，不久，河东特委撤销了。

我回到临汾以后，北方局决定由山西省委组织斗争托派分子张慕陶的工作，张慕陶原名张金印，曾任我党顺直

省委书记，六届四中全会后被开除出党。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和西安事变中，站在托派的立场上起了很坏的作用。抗日战争开展以前，他改名窜到了山西，在阎锡山总部里称为马参议。太原失守后在临汾，阎锡山准备派他到晋东南当专员，为他建立武装，进一步利用他来反对我们。为了煞一煞阎锡山的这个传声筒的嚣张气焰，根据毛主席的“揭发和清除奸细是扩大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分割的”指示，北方局指示山西省委把这个奸细除掉。我们组织学生开小会、大会揭发张慕陶的罪行，要求公诉枪毙张慕陶。阎锡山以欺骗手法半夜里派宪兵拿上他的所谓手谕提审张慕陶，从看守的学生们那里，要走了张慕陶。阎锡山表面上答应群众的要求，要公开审判，甚至还要薄一波同志准备发言，揭发。可是，在当天晚上，就把张慕陶送往西安。当时，我们公开组织群众声讨张慕陶，是我党以合法斗争形式，对阎锡山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的运用，是必要的。

不久，日寇进攻临汾，一九三八年二月底临汾失守。我们就撤到晋西南山上打游击去了。

## (八)

临汾失守后，阎锡山的总部从临汾撤出，经襄汾、乡宁、吉县，逃到黄河边的小船窝，渡过黄河，到了陕西省宜川县桑柏村。当时，阎锡山由于牺盟会提出的“誓死不过黄河”的口号所迫，过了几天，又从宜川搬回到山西省吉县的古贤村。同年夏天，日军“扫荡”，阎锡山几乎被俘，



又搬到河西宜川县的秋林镇，直到晋西事变。当时，山西省委也曾随同阎锡山的总部到了吉县，阎锡山的总部搬到河西，省委当然不能过河，由吉县回到乡宁县牛王庙附近的上章冠村一带，和乡吉特委住在一起，坚持游击战争。我们省委有电台和中央与一一五师保持联系。一九三八年夏秋之交，杨尚昆同志、林枫同志带着北方局机关回到一一五师驻地孝义县禅房头村。北方局对外的称呼叫总政后梯队。当时，中央指示，根据山西抗日形势的发展，各个抗日根据地已经创建了党的领导机构，省委已名不符实，决定将山西省委改为晋西南区党委，但是为了与阎锡山方面联系，仍保持省委的名义，林枫同志任书记，王达成同志任组织部长，张友清同志任宣传部长。当时我和黄骅同志留在晋南乡吉一带搞建党建军工作，直到秋末冬初，我才随曾思玉同志带领的部队回到禅房头，参加区党委的工作。

晋西南这个地区大部分属吕梁山区，群众生活比晋南平川苦一些，交通不大便利，文化比较落后，但是有一个极好的工作条件，那就是红军东渡时，在群众中留下的深刻影响。此外，晋南历来是反阎派的中心，有反阎的传统，阎锡山的银行发行的票子就过不了韩信岭。加之太原、临汾失守以后，阎锡山、国民党的军队不战而退，溃兵成群结队窜入晋西南地区，到处抢劫群众的财物，奸污妇女，群众恨之入骨。当八路军、新军来到这里，消灭了这些害人虫以后，群众欢天喜地，说当年的红军回来了，军民关系非常融洽，因此，开展工作比较顺利。从临汾撤退到晋西十二月事变，近两年时间，区党委在发动群众的同

时主要抓了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

**关于党的建设。**区党委主要抓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农村建党；二是培训新党员。当时，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农村环境，工作对象主要是农民，任务是建立抗日根据地。因此，区党委特别强调应当在农村中建立党的组织，在农民中发展党员，并且要切实改变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干部要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疾苦，关心他们的生活，倾听他们的呼声，和他们交朋友，启发和培养他们的革命觉悟，吸收先进分子入党。但是，我们的干部，大多是知识分子，缺乏在农民中工作的实际经验，接触农民有困难，这是我们当时遇到的主要问题。区党委的同志们知道我在无锡、保定搞过农村调查，后来又当了两年村长，多少有点办法，就派我给干部讲接近农民的体会。我写了一篇文章《怎样接近群众》，发表在区党委主办的《五日时事》小报上。许多同志看了感到很新鲜，很解决问题，后来延安总政治部还在他们办的铅印刊物《军政杂志》上转载了此文。当时我用的笔名是石林山。

区党委也经常转发一些各地在农民中开展工作的经验，使得大多数同志适应了农村环境，工作很快见到成效，发展了不少党员。这些党员多数都参加了各县的游击队，后来扩充到新军里面，少数人经过动员留下搞农村党的基层工作，建立支部。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和一一五师作了大量群众工作也有很大的关系。一一五师进驻晋西南以后，遵照毛主席的“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的指示，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宣传群众，在建党和建军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晋西南党的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发展新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的同时，区党委及时举办了训练班(后改为党校)。林枫同志任校长，以后由朱昔同志负责。班主任是褚凤歧同志，罗荣桓同志的爱人林月琴同志，林枫同志的爱人郭明秋同志等。训练班(党校)开四门课程：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杨尚昆、陈光、肖向荣、林枫、陈士榘、张友清、王达成等同志和我都轮流给学员讲课。党员训练班每期十天、半月，最长的也只有三个月，结业以后回原地工作。全区党员基本上训练了一遍。通过训练，普遍反应收获很大。特别是对党在当时的方针政策了解得比较透彻，比如对我们党所提出的一些口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等，都有了深刻的理解，并在实际工作中去运用。区党委还把中央的指示、决议以及毛主席的文章，有的用原文，有的改变形式，编入《五日时事》丛书出版，人手一册。同时，区党委又针对基层党组织的情况，系统地编印了一批关于党的基本知识的小册子，例如《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怎样当好小组长？》等等，供广大党员学习。经过以上的努力，为晋西南地区党的工作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顺利贯彻执行。

**关于武装斗争。**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不久，省委就根据中央的指示，抓武装斗争工作，组建武装部队，并在这些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一九三七年八月，我党通过牺盟会将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和军政训练团的大部分改编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太原失守前后，又将总队改编为四

个纵队。紧接着在各县普遍建立了游击大队，并向全省一百〇五个县派出了牺盟特派员。又按专区建立了牺盟中心区，领导本区各县的牺盟会工作。晋西南洪赵中心区的负责人是楼化蓬、阎秀峰、丛一平等同志；乡吉中心区的负责人是岳维藩、刘舒侠、赵辉等同志；河东中心区的负责人是李涛、王竟成等同志。以后又通过牺盟会陆续组织起工卫旅、政卫旅、一〇九旅、二一二旅、二一三旅、抗日少年先锋队以及随营学校。还通过战地动员委员会和基层牺盟会组建起新军暂一师。这些武装部队和学校，名义上属阎锡山领导，但在实际上，领导权是由我们党掌握，革命力量占绝对优势。阎锡山对于组织这些抗日武装也感兴趣，牺盟会一号召，广大青年蜂拥而至，比以他的晋绥军的名义招兵容易得多；同时，花钱也少，用这些抗日部队来保他的地盘，比晋绥军好得多。我们是要抗日，要革命，阎锡山是要利用我们保住他的地盘，各有各的打算。为了和晋绥军相区别，我们就把新组建的部队统称之为新军，把晋绥军统称之为旧军。此后，为了加强新军，又从八路军抽调了一大批干部到新军中担任领导职务，大大提高了新军的素质。黄骅同志担任省委军事部长后，进一步加强了省委对军事工作的领导。当时，晋绥军在日寇进攻面前，狼狈奔逃，溃军到处乱扔枪支弹药。我们就把这些东西拣起来，武装新军和各县游击队。黄骅同志负责培训新战士，把红军中的一套政治工作制度也应用到新军中去，实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教育。

太原、临汾失守以后，决死一纵队和三纵队到了晋东



南，四纵队和工卫旅、暂一师驻在晋西北，二一二旅、二一三旅驻在晋南稷山、汾城一带。当时，在晋西南地区活动的，有张文昂、韩钧同志领导的决死二纵队和张韶芳同志领导的政治保卫队，大约各一个旅的兵力。后来，二纵队发展成九个团，差不多有三个旅了。还有原属李力果同志领导的少年先锋队改编为一个总队，在边山一带活动。除了新军以外，在这一地区活动的有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一五师调山东后，留下一个补充团，组成为晋西支队。支队长是陈士榘同志，副支队长是黄骅同志。省委到了乡宁以后，正式组织起省委卫队，对外名义为一一五师独立第一游击大队，黄骅同志任大队长。游击大队一开始是两个连的兵力，后来发展成一个团。此外，各县都组织了游击大队，大都在同蒲铁路沿线活动，神出鬼没地打击日军，并且控制维持会的活动，很快打开了局面。

我们在洪赵地区和新绛、汾城等地打击日寇，搞减租减息，很受群众拥护，许多青年报名参加游击队，有的县甚至成立了两三支游击队。有的人甚至连老婆、孩子也不顾了，非参加游击队不可。闻喜县还有一个女同志，也是非要跟部队走不可，怎么劝也不行，她在部队里什么都干，洗衣做饭，一直跟到汾阳、孝义一带，后来才硬劝回去了。游击队普遍建立起来以后，也带来一个问题：这么多的游击队怎么办？参加八路军吧，经费、开支问题都解决不了；打游击吧，自从日本人占领汾离公路以后，只到晋西南“扫荡”过一次，后来再也不来了。后来，我们就动员游击队员参加新军。这是区党委的一个重要战略决策。大量的游击队员，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党员，补充到新军里，

这就大大地提高了新军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后来，在十二月事变中新军能够顶住阎锡山和日军的联合“围剿”，打不烂，拖不垮，而且不断发展壮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在执行区党委这一决定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些游击队愿意编入八路军，不愿意编入新军，原因是新军虽然是共产党掌握的，可阎锡山还挂个领导的名，不那么美气。经过说服教育，逐渐在思想上取得了一致，解决了这个问题。实践证明，区党委的这一决定是正确的。

**关于统一战线。**在太原失守以前，我们对阎锡山上层的统战工作，主要是由薄一波同志领导的十六人委员会进行的。太原失守以后，薄一波同志率领青年抗敌决死一纵队和戎伍胜、董天知率领的三纵队先后进入晋东南地区。十六人工作委员会实际上不存在了。这时，对阎锡山上层的统战工作便由省委来抓。这一工作主要通过牛荫冠同志领导的牺盟总会继续进行，我们的方针仍然是中央制定的独立自主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既拥护阎司令长官抗日，又反对阎司令长官投降，我们的方针是明确的，方法是灵活的。但阎锡山这个老狐狸并不好对付，他本是留学日本的士官生，老亲日派，曾经靠日本人在华北称王称霸，占领过北平、天津一带。他还和汪精卫、冯玉祥合作发起过倒蒋运动，失败后逃到大连在日本帝国主义庇护下对山西进行遥控。他还请人给他讲《资本论》，以便为他所用。他诡计多端，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前后，日军用飞机将他送回到山西搞了不少貌似进步的名堂，嘴上会用不少的新名词，什么“土地村公有”、“物产证券”、“按

劳分配”、“二的哲学”，还开办西北实业公司，挂上“人民事业董事会”、“人民监政会”的牌子，花样翻新，用以骗人，其实万变不离其宗，目的仍是巩固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山西人民的官僚统治。阎锡山的政治实质是：反共第一，反蒋其次，抗日第三。阎锡山把我陕北苏区的存在看成是对他最大的威胁，在晋南、晋西北地区为反共目的，修了许多公路，普遍先后成立了反共保卫团、好人团、公道团，还亲自编写了反动歌词：“共产党杀人如割草，男妇老少全不留”等等。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当日本人的侵略威胁到他在山西的统治时，他也提出“守土抗战”和“抗敌统一战线”的口号，但却避免使用“抗日”这两个字。他也深知要抗战必须深入发动群众，光靠他的晋绥军是不行的。所以，他也模仿我党的一些做法，研究共产党发动群众的经验。可是又说：“不发动群众是个空子，发动起来是个乱子。”还说什么“农民是只老虎，可以吃掉敌人，也可以吃掉我们自己。”又想利用共产党，又怕共产党力量大了控制不住。阎锡山在他的内部公然宣称，我们将要在日军、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求生存。总之，这个老狐狸思想矛盾重重，行动诡计多端，是个不可轻视的家伙。我们党对阎锡山作过认真研究，认为他本性不会改变，但也有可利用的一面，在抗日反蒋这一点上和我们还是有共同点的，所以决定和他搞统一战线。我党对于阎锡山的这一战略决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为八路军的三支战略部队一二九师、一一五师、一二〇师进入山西，并且以山西为立足点，建立了华北三大块抗日根据地，为坚持抗日战争，争取最后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党统战工作的成功，大大提高了党和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军的威望。同时，我们进入晋西南地区以后，我们搞的减租减息也和以阎锡山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发生矛盾。再加上我们在新军中建立的一套政治工作制度，如设立政治委员、党组织建在连队等，也不合阎锡山的口味，他的反动面目也就逐渐暴露了出来。原来，阎锡山想利用新军替他抗日，保护他的财产和实力，现在看到新军、牺盟会发展很快，大权旁落之感威胁着他，因此，决心建立一个新的反动组织来维持他的统治。一九三八年二月，他在临汾西南的温泉村召开了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名为“第二战区抗敌工作检讨会议”（简称温泉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由参加会议的一百〇八名高级干部发起，将原“自强救国同志会”改组为“民族革命同志会”，并增加了一批旧军高级军官为委员，其任务是企图以同志会领导、控制牺盟会。在这次会上，还成立了“民族革命青年团”，专门对抗“民先”，并和我党争取青年。在这以前，阎锡山还在晋南办起所谓“民族革命大学”，和延安的“抗大”相抗衡，拦截从内地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省委和北方局研究了阎锡山的反动政策以后，制订了三项对策：因同志会是由阎锡山的反动高干控制的反革命政党性质的组织，除党组织批准可以加入同志会的党员以外，一般党员不准参加同志会，而是和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对于民族革命青年团，由于领导权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允许我们的同志参加，从内部加强对它的控制。对民族革命大学，尽量把其中进步的学生介绍到延安去，或分配到决死队、牺盟会去。在“民大”虽然有党支部，但不大量发展党员。事实证明党的



这三项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大大遏制了阎锡山的反动气焰。到了六月，阎锡山在古贤村召开军政干部会议，他在会上说什么“抗战以来，我们快输光了，八路军扩大了，牺盟会、决死队和八路军合作了，以后还有我们立足之地吗？”这时，阎锡山开始和进步势力公开搞磨擦。九月，阎锡山在古贤村再次召开所谓“抗敌行政检讨会议”，并在会上确定了整顿旧军，压制新军的方针。这两次会议，是阎锡山由消极抗战转向积极反共的公开暴露。紧接着阎锡山又仿效蒋介石搞庐山集训的办法，把军队中的团、营以上军官，政府中县、区长以上的干部和反动党团中的骨干，召集到秋林集训，公开进行反共的组织准备工作。我们的地下党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坚决的斗争。

一九三九年初，中央要求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去延安汇报工作。区党委研究后，派我去延安向中央汇报晋西南地区的工作，和我同去延安的还有灵石县委书记梁树棠等同志。晋西北区党委的刘俊秀同志、郑林同志等人也和我们同时到达延安，住在延安中组部的窑洞里。到延安后，向中央汇报了我们在晋西南怎样以革命的两手对付阎锡山的反革命两手的情况，这就是既拥护他抗日，又揭露他的反共阴谋。我们的汇报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后来，中组部陈云、李富春同志又叫我到中央党校和中组部训练班等单位介绍了前方对敌斗争的情况，以及对付阎锡山的经验。我去延安汇报时，带了一些《五日时事》小报，给中央的领导同志每人送去一套。这是区党委主办的四开油印小报，报头是毛主席题写的，由王修、曹速同志具体负责，编排印刷很讲究，在前方很受欢迎。后来，毛主席给我写

了回信，说报纸办得很好，希望我们向《新中华报》学习。在延安汇报完毕要返回晋西南时，正在马列学院学习的朱昔同志要求和我一同回晋西南。经领导批准，我们就一同起身。朱昔同志原名王耿人，吉县人，曾在冯玉祥办的汾阳军官学校学习，并在那里参加共产党。一九三六年是中共太原市委的成员，负责农、青、妇工作。太原失守后担任过山西黎城县长，后来到了延安马列学院。他和我同时回到晋西南后，区党委分配他负责党校工作。此人多才多艺，不仅办党校，还办起一个剧团，他招收了一批放羊娃，又找了一个懂戏的人教戏。区党委认为剧团办的挺象样，就在“七一”那天正式成立剧社，定名为“七月剧社”，先后由朱昔、叶石、裴世昌、高禹、郭木林等同志负责。这个七月剧社后来有了进一步发展，一直随部队南下到四川，但以后被解散转业了，很可惜。在这段时间里，晋西南区党委也抓了文化工作，长城剧社、前锋剧社等就是这时成立的。我们还在各地办起了小学校，林枫同志对这一工作十分重视。临汾失陷前，我们还邀请郭沫若同志领导的、政治部所属张光年同志率领的演剧三队，到晋西南演出；接待了丁玲同志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这对于推动晋西南地区文化工作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不少城镇也开办了新华书店，发售延安解放社出版的书籍和刊物，受到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欢迎。

回顾晋西南区党委这一段历史，工作是搞得比较好的。无论是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成绩都比较显著。除了区党委的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这个区党委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有利条

件。就地理位置讲，我们和延安的党中央只有一河之隔，中央的精神我们知道得比较早，如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会议刚结束，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还有一部电台和中央保持联系，直接聆听中央的指示。同时，北方局机关从临汾时起就一直和省委、区党委在一起，我们的许多决策，都是和北方局一起研究决定的，这就保证了我们的工作始终能够沿着党中央指引的方向胜利前进。

## (九)

我从延安回晋西南不久，一九三九年三、四月间，阎锡山在秋林召开“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即所谓“秋林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军长、师长、旅长等高级军官，各区专员和保安司令以上的行政干部，一部分县长、公道团长、牺盟特派员，新军各纵队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这次会议是阎锡山配合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而召开的公开反共动员会议。事先，区党委认真研究了阎锡山召开这次会议的意图，决定派张友清同志到秋林，作为省委代表配合协助薄一波同志，领导进步势力同阎锡山顽固势力作斗争。斗争非常激烈。阎锡山在会上公开提出取消新军政委制度，取消新军里的共产党组织。同时散布要“困死八路军，饿死八路军”的反动口号。由于薄一波同志为首的进步力量的坚决斗争，这次会议拖延了三个月之久，无具体结果而散。但是阎锡山的反共面目已经暴露无遗了。与此同时，阎锡山又成立了精神建设委员会、敌工团、突击队等组织，派到二战区专门对付共产党，搞暗杀活动。我们也针锋相对，

发现敌工团，就坚决干掉。到了十月，风声越来越紧。区党委开始作预防措施，派肖杨同志到秋林，协助张友清同志做那些呆不下去、受到怀疑的党员的疏散工作。这一工作主要是通过牺盟总会的牛荫冠同志、阎锡山二战区司令部的吕调元同志、政治部的刘岱峰同志、文化机关的赵石宾同志等进行的，整个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保存了我们党的大批力量。同时，由林枫同志亲自去延安向中央汇报、请示，研究对策。在延安，林枫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以山西省委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声明，经毛主席和中央的修改，在延安《新中华报》上发表，揭露山西反动势力降日反共的企图，并号召全国人民密切注视投降派的活动。十一月，阎锡山的投降反共活动准备就绪，一方面作了进攻新军的部署，一方面指使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派代表和日军代表在临汾刘村开会，要日军配合阎锡山旧军向新军进攻。当时在晋西南反阎锡山最突出的是决死二纵队的政治部主任韩钧，因此，阎锡山首先向二纵队开刀，密谋暗杀韩钧同志。同时密令他的旧军向太行山的决死一纵队、三纵队，晋西北的四纵队、工卫旅等新军作全面进攻的准备。韩钧同志由于事先得到消息，绕小道跑了回来。当时，我们正在开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七大”的代表。韩钧同志回来后，既没有向区党委汇报，也没有请示区党委，就自作主张去打旧军崔道修的新一旅，把崔道修打跑了。于是，晋西南的形势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由于韩钧同志的错误，打乱了部署，使区党委在即将到来的反共高潮面前陷入了被动。十二月初，阎锡山总部电令二纵队向同蒲线日军进攻，名之曰“冬季攻势”，其目的是要日军配合旧军夹击二纵队。韩



钧同志识破了阎锡山的这一卑劣阴谋，拒绝执行他的命令，并向阎锡山发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电报。于是阎锡山正式宣布韩钧叛变，通电全国，并发出讨伐“叛军”首领张文昂、韩钧的命令，发动了向新军的全面进攻，点燃了山西十二月事变的战火。这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阎锡山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主要事件，这个事件又称之为晋西事变。

十二月事变发生以后，区党委把正在召开的党代表大会提前结束，立即投入了回击阎锡山反共高潮的战斗。区党委向中央发了电报，汇报了事件发生的经过。中央指示：坚决回击阎锡山的进攻，但要争取阎军内部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避免发生更大规模的内战。具体作法是狠狠打击所谓“讨叛总指挥”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的部队，不公开刺激阎锡山。打仗时一律以二纵队的名义，但是在林枫同志的领导下，陈士榘、黄骅同志指挥的晋西支队以及所有新军全部都参加了战斗。与此同时，根据区党委的指示，正式成立抗日拥阎讨逆指挥部，由二纵队政委张文昂同志任总指挥，韩钧同志任前敌总指挥。后方留守处，包括区党委、专署机关、报社、剧团等由我负责。指挥部成立以后，在隰县高家条村召开了誓师大会，并每天向中央军委电报战况，接受中央军委的具体指示。我们的具体打法是：由林枫和黄骅同志率领晋西支队的两个团，正面堵击敌人，轮番出击，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把阎锡山的晋绥军一直阻击在隰县以南，不让它过来。同时，由陈士榘、韩钧、刘德明等同志带领新军（约七、八个团的兵力），包抄旧军的主力，歼灭其有生力量，从旧军那里缴获一些枪支弹药来补充

自己。但阎锡山也很狡猾。他并没有把主力放在洪赵一带，而是沿着黄河往下走，企图切断我们和陕甘宁边区的联系，对我新军和晋西支队实行包抄。结果，这一歼灭六十一军的战斗没有打成。战斗继续了十多天，中央军委命令我们转移到中阳县靠近黄河的三交一带，从陕北补充弹药。但阎锡山的旧军抢先一步，把黄河渡口抢占了。于是，中央军委又命令部队北上，穿过日军封锁线汾离公路，向晋西北转移。根据区党委的安排，晋西南的地方干部大部分没有过来，由王达成、龚子荣同志留在那里领导地方干部坚持斗争。

我们到达晋西北临县方山、静乐一带的时候，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同志从延安赶到了晋西北，把原在晋西北的一二〇师彭绍辉同志指挥的第八旅、决死四纵队、暂一师（全称为暂编第一师，为原战地动员委员会所属的游击支队组成，师长为续范亭）、工卫旅和晋西南过来的部队统一起来，组成晋西北抗日拥阎讨逆指挥部，续范亭同志任总指挥，统一行动，反击阎锡山旧军的进攻。原来的计划，只是打一下晋绥军，使其不敢再向新军进攻就可以了。没有想到晋绥军不吃打，一接火，就溃不成军，赵承绶的骑兵军也于混乱中逃过了汾离公路，晋西北成了我们的一统天下。至此，阎锡山消灭新军、困死八路军的阴谋彻底破产。但为了维护我们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党中央指示我们，新军部队不要越过汾离公路去追击晋绥军。这时，贺龙、关向应同志奉中央指示率领一二〇师又重新回到晋西北。以后，党中央派王若飞和肖劲光同志赴秋林，以二战区朱德副司令长官的代表身份调解新旧军冲突。当时和阎谈判达成的协议为：停止内战，并规定汾离公路以南是旧

军的吃粮区，以北为新军的吃粮区。这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的。我党我军的抗日反顽斗争，在晋西南地区完全转入地下，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晋西南一直是属于晋绥边区。所以我晋绥边区的地图，从同蒲铁路线以西和绥远一直到晋南永济县境的风陵渡为止。

## (十)

晋西事变以后，晋西北成了党中央与敌后各根据地联系的唯一孔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早在抗战初期贺龙、关向应同志率领一二〇师从日本帝国主义手中解放了七座县城，开辟和建立了晋绥根据地。

阎锡山挑起的十二月事变，不仅未能消灭新军，反而“赔了夫人又折兵”。我们把晋西北的全部旧军赶走，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抗日根据地。我们搞得很彻底，阎锡山的反动势力垮得也很利落。整个地区，除原来的邮局以外，所有的旧政权都垮台了，所有的旧人员，逃走了一批，关了一批，经教育后又释放了一批。我们统一了整个晋西北，磨擦、扯皮的事没有了。在根据地内部彻底摧毁了阎锡山的残余势力，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独立自主地进行根据地的建设，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各根据地还是不多的。在大规模的战争结束以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由贺龙、关向应同志在临县窑头村主持召开会议，把晋西南区党委和晋西北区党委合并，成立了晋西区党委，由林枫同志任书记，原晋西北区党委书记赵林同志任副书记，王达成同志任组织部长，刘俊同志任民运部长，龚逢春同志任社会部长，我任

宣传部长。这时，一二〇师已经奉命从冀中回到晋西北。原属一一五师的晋西支队开赴山东归还建制。决死二纵队、四纵队、工卫旅、暂一师开赴边山同蒲线一带，开展对敌斗争。同时成立了以续范亭同志为首的新军总指挥部，罗贵波同志为新军政委兼副总指挥，兼任八地委书记，张永青同志任地委副书记，梁树棠同志任组织部长。并将原文水县长顾永田同志升任为八专区的专员。政权建设我们抓的也很紧，二月份就成立了晋西北行政公署，并向阎锡山发了电报，以保持在二战区内的统战关系。行政公署由续范亭同志任主任，牛荫冠、武新宇同志为副主任。参加行署领导工作的当时还有刘墉如、段云、梁膺庸、汤平、黎化南、杜心源、张文昂、张隽轩，以及著名的民主人士刘少白、孙良臣。行政公署下设八个分区，并委任了专员以及各县县长、区长。同时，还重新调整了各地委、县委等党的领导班子。建立了晋西北军区司令部，贺龙同志任司令，关向应同志任政委，续范亭同志任副司令员，周士第同志任军区参谋长，陈漫远同志任副参谋长，甘泗淇同志任军区政治部主任，陈希云同志任军区后勤部长，贺彪同志任军区卫生部长。军区司令部开始住在兴县城附近的李家湾，后来迁到蔡家崖。区党委先住高家村，随后移住离蔡家崖不远的北坡村。行政公署原住在蔡家崖，后移住在赵家川村。至此，党政军领导机构的建设初步完成。

但是，困难也来了。当时除王震同志的三五九旅进驻到陕甘宁边区的绥德专区以外，这样多的军队，党、政干部集中在这里，群众供应不起，部队和地方的生活非常困难。有许多单位，每日三餐吃黑豆，盐和棉布也很紧张。



而且，当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国民党和阎锡山打了败仗，吃了大亏之后，并不甘心。国民党政府已经调第一军李文部队进驻西安，有向陕北、晋西北进攻的模样。我党不得不预作准备。因此，我们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经贺龙、关向应同志和晋西区党委作了认真的考虑之后，作出了开展“四大动员”的决定。“四大动员”的内容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粮的出粮，有人的出人。具体说来，就是筹款，做军鞋，筹粮，参军，这四项任务都是硬梆梆的任务，不完成，我们就无法渡过困难，应付局势。但是在当时的困难情况下，若不制订出明确的政策，又要脱离群众。扩军、做军鞋问题不大，筹款、筹粮就颇为困难。因为一般的群众生活水平很低，并无余粮和存款，相反的有些赤贫户还等待政府救济，所以，不能在他們身上打主意。钱和粮都在地主和富农手里。经过动员，开明一点的地主、富农拿出一些粮和款，交给政府，但是多数地主老财就不干，有的还故意装出一副寒酸的样子，叫苦连天。但是，谁穷谁富，本村群众了如指掌。为此，我们必须走群众路线，调查清楚以后，就发动群众挤他，揭发他们剥削群众的罪恶。说服动员和施加压力相结合，结果动员出不少的现金和粮食，解决了很大问题。再加上区党委号召节衣缩食，省吃俭用，结果既不伤元气，又渡过难关。在执行“四大动员”任务的工作中，也曾发生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后来很快得到了纠正。

在“四大动员”过程中，群众团体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工会的负责人是王永和同志，农会的负责人是吕韵同志，青年联合会的负责人先后是罗毅、周颐、张凡同志，

妇联的负责人是姜宝箴、张育英等同志，文联的负责人是亚马同志。一九四一年，为了加强领导，区党委把各群众团体合组为“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抗联”，总负责人是阎秀峰同志。在赴延安以前，我负责宣传工作，所以这里着重说说文化界的情况。

油印的《五日时事》报，到了晋西北以后，继续出版了一个时期，后来从赵承绶的骑兵军缴获了铅印机，设立了印刷厂，就改为铅印的《晋西大众报》，仍由王修同志负责。这是一张通俗报纸，是面向农民群众的，续范亭同志为这张报纸题写了报头。晋绥分局成立以后改名为《晋绥大众报》。这时赵石宾同志从延安回到晋西北，区党委便决定出版区党委的机关报，取名为《抗战日报》，由赵石宾同志主编。赵石宾去世以后，廖井丹、郝德青、常芝青、周文同志先后主持报纸工作。郁文同志从新华社总社来到晋西北以后，就留下来负责建立新华分社，即晋绥总分社，并主持工作，这是一九四二年的事了。这里介绍一下赵石宾同志的情况。赵石宾，山西榆次县人，抗战前的地下党员，他是牺盟总会的最早一批工作人员，总会宣传委员会的骨干。他既能写政论文章，又能写快板鼓词，是个多面手，文字干净利落、深刻犀利，是难得的宣传干部。他一直在牺盟总会工作，后来跟随牛荫冠、吕调元同志到了秋林，任黄河出版社的总编辑，文化界地下党的负责人。十二月事变以后，他从秋林偷跑到延安，他在延安参加了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工作会议之后，就到了晋西北。他从延安带来一份毛主席的著作《新民主主义政治和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由区党委油印科曹速同志刻印成册，

发给干部学习。此后，阮迪民、高丽生、邵挺军、王雷行等一批革命知识分子也先后来到晋西北，这就大大充实了宣传、文化工作的队伍。这一批同志分别被分配在《抗战日报》和《晋西大众报》工作。赵石宾同志主持《抗战日报》工作期间，非常认真、辛苦，对歪风邪气，深恶痛绝。因积劳成疾，一直发展到咯血，医治无效，不幸在河西贺家川医院去世，逝世时才三十岁，还没有结婚呢！

根据区党委的指示，我们狠抓了文化教育建设。大约一九四〇年五月间，我们在兴县召开了文化工作座谈会，号召分散在各个单位和部队的文化工作干部归队，创建晋西北地区的各种文化机构。在这次座谈会上贺老总、关向应、续范亭等同志都讲了话，肖三同志也参加了座谈会。到会的同志明确了开展抗日根据地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对以后工作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文联设在兴县城，再后住在西坪村。当时，亚马从工卫旅调来当文联主任，卢梦从决死四纵队调来担任副主任。文联成为抗联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文化艺术团体还有一二〇师的战斗剧社，这是一个有较高艺术水平的表演话剧的团体，负责人是欧阳山尊等同志。这个剧社的演出不仅在晋西北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就是在晋察冀边区，在延安也受到欢迎。四纵队、工卫旅、暂一师都有剧团或文艺宣传队，在宣传工作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除抗战日报社、晋西大众报社外，还成立了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些小丛书、剧本等。晋西北根据地，直通延安，得天独厚，所以，延安文化界有什么活动，消息很快就传到这里，我们得到很大好处。随后，在抗战七周年时，边区还举办了“七·

七·七”(指七·七抗战七周年)文艺奖金,对于文学、戏剧、美术、音乐创作中的优秀作品,进行评奖,起了鼓励创作的作用。在这以后的一个时期,晋西北根据地创作了一批比较好的作品,如《吕梁英雄传》、《王德锁减租》、《打得好》、《刘胡兰》等,颇受边区的部队和群众的欢迎。

我在晋西区党委工作的时间不长,只有半年多时间,九月就到延安去了。这半年,可以说是晋西北根据地建设的开始阶段,这也可以说是一场开场锣鼓。

## (十一)

写到这里,我想将我从一九二七年四月入党至一九四〇年九月这一期间的经历,再回顾和总结一下,会是很有意义的。

我入党并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从空想到有了科学的认识,经过了实践验证后所下定了的决心。第一次大革命后,我坚定地相信中国革命不会失败,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继续为反帝反封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当时我的马克思主义认识水平,经过了一个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的过程,我当时还顾不上读书,而且除了《共产党宣言》等少数马恩原著以外,尚未有多少翻译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可读。那时我开始接触到一点列宁的著述,还是从布哈林所写的《共产主义A、B、C》这本小册子中所引用的列宁的论述中得知的。我第一次了解到列宁讲一个慎重的马列主义政党,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应采取的态度时,使我十分叹服!



“七·一五”武汉反革命政变以后，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我依然坚信革命不会失败，依然相信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会成为第二次北伐的起点。后来我在上海接不上党的关系，不得不回到晋南临汾。那时我的想法是，晋南为反阎派势力范围，我的社会关系较多，王瀛、朱志翰等共产党人都在那里，较易接上党的关系。想不到阎锡山这时也“易旗”了，他采取了一贯的、比蒋介石更为狠毒的反革命伎俩，将山西籍的共产党人几乎一网打尽，除了杀掉的以外，大都关进了监牢和反省院。不久，对我和王亦侠也下了通缉令，从此我就过着避难的生活，当然谈不上读书的机会了。直到一九二九年春到了上海，就业于上海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时，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这时我才得以实现我渴望已久的一个愿望：研究在个体小农经济的情况下，采取农业生产合作方式，应用现代化农业技术。同时我也得到一个良好的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环境。

当时党中央在上海四马路办了个半公开的书局，叫“华兴书局”，翻译出版了大量的马列主义的书籍。我于这年暑期参加了无锡的农村经济调查，在整理调查材料时，就尽量购买《华兴书局》出的马列主义书刊，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陈翰笙同志也支持我这样做，我将这些书籍放在那里任人传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随后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党内提倡学习辩证法。这个时期我特别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辩证法进行了认真的阅读和研究，然而收效并不理想。对于辩证法的三原则，读来读去无非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举过的那些例子，我深深感到这是不可能达到广泛应用的要求的。我自己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对

于那时候的立三路线、王明路线以及罗章龙等人的分裂主义路线，都有我自己的看法；然而在当时“左”倾路线的纪律约束下，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了。我参加过无锡、清苑的农村调查，又经过长期的地下党的生活，还当了两年村长，对于社会问题和社会的客观规律，是有一定的认识和体会的，我深感这些“左”的路线，不管是国际路线也罢，放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是圆凿方枘，牛头不对马嘴的。但我无能为力，只好经常用“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这句话来聊以自慰。其实，这也是唯心主义的话，说明我的马列主义还是没有读通。

当我先后陆续读到毛主席的论著以后，这才使我对于哲学和社会科学及其有关的某些具体问题，开始有点豁然开朗起来了。特别是毛主席在抗大所讲的“唯物辩证法”，我自己并未亲自听讲，经抗大回来的同志向我陈述了毛主席所讲的内容，和他所列举的许多通俗而生动的事例，同时我也看到了他们带回来的油印的“讲授提纲”（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我认为经他这么一讲，就真正把马列主义的方法论变活了，如果你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的话，那你也就可以应用自如了。当然我的老师很多，如刘少奇同志和杨尚昆同志、罗荣桓同志、林枫同志、张友清同志、黄骅同志等，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以身作则和对于我的具体指导，都使我不断得到提高，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

由于直接的工作关系，林枫同志对我的帮助最大。他了解我的长处，也了解我的个性和缺点。少奇同志曾说过“林枫同志会办事”，在我和林枫同志的接触中深深有所体会。他在省委和北方局工作时期，充分地表现了他的突出

的组织才能。太原沦陷后，有来自各方的各式各样的人才，他都安顿得有条不紊，使之各得其所，充分发挥了所有的人的积极作用，这不是件简单的事！使我感到十分佩服。他善于用委婉的语气和方式，既批评了人，还使你并不反感。例如当我从运城扩兵回来在刘村汇报工作时，我没有多考虑，就指责了部队某些同志的错误做法，后来听说那个同志因此受了处分，我才感到有些小题大作了。就在这时，林枫同志对我说：“少奇同志说过，稼夫同志是个好同志，就是有点不会办事。”我开始还有点摸不着头脑，旋即领会到正是击中了我的要害。话虽不多，但对我的启发却是很大的。他经常对我说：“你偏激，你有善善恶恶之念”。他总是话不多，但发人深醒。我领会到他的意思：“善善恶恶”这句旧时代的格言，是小农经济环境中独善其身思想的产物。无产阶级政治家则不能采取这种态度。因为社会总是两头小、中间大的，中间层的人也有种种的缺点毛病，如果对这些“恶”，采取厌恶弃绝的态度，就不能争取到大多数；只靠少数先进分子，革命是无法胜利的。问题是要帮助那些有缺点的人提高和进步，同臻于善，这才能团结起广大的队伍，壮大革命力量。

一九三八年春夏之交，林枫同志随同杨尚昆同志来到一一五师的住地孝义，一一五师师部住在碾头村，政治部住在申家庄，北方局住在张家庄。林枫同志对于罗荣桓同志和陈光同志（那时陈为一一五师代师长）尊如师长，所有一切党的重大政策问题，均先向杨、罗、陈请示，他们相处得是那么协调一致，我至今还能记得起来。一一五师政治部有杨忠同志、杨勇同志、肖华同志、肖向荣同志、潘

振武同志等，他们遵照毛主席的“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教导，在孝义、汾阳、灵石、汾西以及洪赵一带，都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和建党工作，为我们在晋西事变中能够顺利应付阎顽军的突然袭击，准备了充分的群众条件和社会基础。一九三九年春，一一五师奉命进到山东，给晋西南留下了一个独立的补充团，后又扩建一个团，称为晋西支队，和区党委一起行动。支队长是陈士榘同志，副支队长是黄骅同志，一团团长为杨尚儒同志，二团团长为何以祥同志。在晋西事变的战斗中，真正具有战斗经验的主力，就是这两个团。决死二纵队等新军虽然数量多、政治质量也强，但是战斗经验则甚差。高家条誓师以后，林枫同志实际上成为我方自卫还击战中的总政委，他带了一部电台和中央军委取得密切联系，他和陈、黄等一直坚持在战斗的第一线，我和张文昂是留守后方的。我军突过汾离公路封锁线，到达晋西北以后，我就病倒在方山县城。至于当时如何和晋西北区党委取得联系，如何在军委总参谋长滕代远同志的领导下，制订围攻赵承绶骑兵军的作战计划，以及关于两个区党委的合并，晋西北行政公署的成立等等，我一概均未能参加。当我回到临县时，贺龙、关向应同志率领的一二〇师主力，已经返回到晋西北地区了，所有随后的一切组织领导工作全部是由林枫同志会同贺龙、关向应同志和晋西北的其他同志们共同进行的。就我所知，林枫同志和贺、关相处也是恳切无间的。林枫同志对工作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历来都是他自己主动承担责任，从不将错误的责任推给别人和下级，这是尽人皆知的。



也许是由于他在天津南开上学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文化知识基础的缘故，他是那么重视并热爱文化教育工作；自己是手不释卷，同时也积极鼓励同志们学习。当晋西区党委搬到兴县北坡村时，立即成立了党校，由他本人兼校长，将原八地委书记饶斌同志调来任党校的副书记。由于王达成同志尚在晋西南未归，于是就将原三地委书记宋英同志调来区党委任组织部副部长。饶斌同志是上医学生，宋英同志是北大地质系学生，于是就流传有林枫重用知识分子之说。与此同时，还在兴县城内设立了“晋西师范”，由杜若牧同志筹办；在临县设立了“一中”，由王静野同志筹办；在保德县设立了“二中”，由范若愚同志筹办。在关向应同志倡议下，在离石县筹办了“贺昌中学”。顾永田同志壮烈牺牲后，在八分区边山筹办了“永田中学”。为了广泛地轮训群众工作干部，由林枫同志倡议，还在区党委驻地附近设立了“实验学校”，实际是一种类似“抗大”的学校，以学习党的政策为主，同时也学习文化知识。实验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就是由抗联主任阎秀峰同志担任的；随后郑林同志和郝德青同志都先后担任过这个学校的校长。足见林枫同志对该校的重视，而该校也确实为这一地区培养了大量的干部。在可能条件下，各地也先后恢复了小学教育，而“冬学”则又是所有农村中都必须举办的普及性的通俗义务教育。

总之，林枫同志对我的熏陶和教益是十分巨大的。他自己所常说的，一个共产党员所应该具备的海量，就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为自己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作为决定自己的言行的根据。这个对共产党

员的党性锻炼的要求，我认为是毫无疑义的，理应做到的起码标准。林枫同志用他自己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了他能够言行一致、身体力行地完全达到这个标准。而我自己至今尚往往达不到这个标准，也只能努力勉励自己，“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在这一点上我就远不如龚逢春同志，所以当林枫同志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时，特地将龚调来做他的助手，在任劳任怨这一点上，是他们二人的共同之处。

最后，我拟引用我与林枫同志之间的一段故事，用以结束我的这一回顾和总结。这段故事的具体时间记不得了，估计大概是一九六〇年以后的事。那时我在文办工作，林枫同志已患了心绞痛，在家中休养，由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同志任文办的代主任。这一时期，我们遇到的违反党的正常生活的事例逐渐增多起来。中央文教小组的组长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同志，副组长是康生。文教小组和文办是直接有关的。这期间不正常的事例不知有多少，而且，朝令夕改，使人莫知所措。在那种情况下，连我这个容易激动的人也小心谨慎起来了，于是我就去林枫同志家中，将自己看不惯的人和事全部向他讲了出来，企望他能得便向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反映一下。他总是笑眯眯地倾听着我的诉说，虽然有时神情上似乎也同情我的话，却不肯明白表态。有一次，他听了以后，竟开玩笑地对我说：“我看你这个人呀，最好退休了算了”。这就表明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于是我就很不高兴地告辞而去。过了几天，他打电话叫我去，谈了一阵不相干的事，最后拿出一个信封来，交给我说：“这是我从《续资治通鉴》上抄下来的，你

帶了回去再看吧。”我回到家中，打开一看，他在一张信纸上抄了这么一段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小人情伪，君子岂不知？以大度容之，则庶事俱济。”据说这是吕蒙正向宋太宗讲的话，他的这一友谊的赠礼，对我说来是一种安慰，也是一个值得铭记的“箴言”。于是我就把它写在一把折扇上作为我的座右铭。想不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自己竟也被潜入到我们党内的反党反革命分子林彪、“四人帮”的军师和爪牙康生、陈伯达迫害致死了。然而这并不能否定林枫同志这一马列主义政治家的风度和党性修养的正确性，他将永远成为值得我们共产党员学习的楷模。

# 回忆无锡秋收暴动

徐 彬 如

五十六年前，我参加了无锡秋收暴动，还是没有明确职务的领导者之一。这次暴动虽然时间很短就失败了，但它毕竟是江苏农民运动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把这段历史回顾一下，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盲动主义的认识。

一九二七年，由于反革命力量的强大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造成了大革命的失败。很多领导干部、大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野蛮屠杀，全国处在黑暗之中。在这危急关头，党中央于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坚决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的任务。这以后，我们党在全国各地领导了工农武装暴动，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但有些暴动也含有盲动主义的错误，无锡暴动就是其中一例。

大革命时期，我原在广州中山大学任党总支书记。“四·一五”反革命大搜捕之后，我从广州转移到上海。先在中央军委后到中央农委工作。我到农委时已经是一九二七年下半年了。这时农委刚刚成立不久，由王若飞负责。机关设在上海北四川路桃源坊，徐特立和一对年轻夫妇住



在那里。为了训练农运干部，农委在外滩租了一间 office (写字间)办学习班，我被派到那里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记得教员讲过马克思的《暴动论》，内容虽然主要讲的是城市暴动，如怎样占领车站、破坏桥梁等等，但由于大家都是刚从敌人的屠刀下跑出来的，报仇心切，听起来倒很对胃口。

我在学习班不到一个月，有一天（日期记不准，据推算可能是十一月六日），王若飞通知我到无锡搞暴动。他简单地向我交待了任务，然后说：搞暴动是江苏省委的决定，各县都要搞。宜兴已经动起来了，无锡要赶快发动。只要无锡一动，常州、江阴、苏州都发动起来，京沪沿线的总暴动就开始了。他还说要我去是秋白同志的意见，叫我第二天就动身，到无锡的当天就把暴动搞起来。

第二天，农委秘书俞泽鸿派两个人来送我，其中有一个好象是在广州见过面的黄锦辉（记不很准）。他向我谈了一下无锡的情况，也很简单。据他介绍，无锡是江苏省农运基础最好的一个县，领导人一个叫严朴，一个叫杭果人，都是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回来的。俞泽鸿他们还给我派了几名助手：两位军事干部（黄埔军校的学生，是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后到上海的）和几个上海大学的学生。临走时，来送我的人还要我想法子搞二十万块现大洋回来，因为革命正需要经费。他们说，无锡的土豪很有钱，想法搞到保险柜的钥匙就可以搞到钱。就这样，我匆匆忙忙接受了任务，在火车站化了装，带着几名助手离开了上海。当时我们每人带了一点钱，我带的是一张一百元的香港纸币，缝在围裙里。

当天上午十一时，车到无锡。我们一下火车就觉得气氛不对，敌人戒备森严，到处架着机关枪。原来在一个星期以前，无锡的近邻——宜兴发生了暴动。一千多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占领了县政府，吓跑了县长和公安局长，成立了新的革命政府，并且公布了政纲，处决了土豪劣绅。宜兴暴动使附近县、市的反动派十分恐慌，因而无锡反动派的戒备加强了。

来车站接我们的是一位教员模样的女同志。她把我们领到一个地方，介绍给了一位姓张的英文教员就走了。那位英文教员后来一直和我们在一起。他把我们带到城内堵家弄一处秘密联络点。那个地方原是一座尼姑庵，当时是党领导城区响应农民暴动的一个“点”。我们去的时候，人们正在写标语。据说标语内容都是省委规定的，记得有：“暴动起来，打倒地主”、“没收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废除苛捐杂税”等等。

我当时并没有明确的职务，只因为是从上海来的，又是王若飞派来的，所以大家把我看作是王若飞的代表，热情地接待了我。在那里，我们开了一个会，他们向我汇报了工作。在场的有好几个人，有的在上海学习班上见过面。可惜时间久远，名字都记不得了。我问他们有多少枪，他们算来算去只有两支盒子枪。我看大家情绪很高，但一点警惕性也没有，盒子枪的红穗子就那么露着。尼姑庵外不远就是敌人，随时都有出事的可能。我觉得这个地方很不安全，劝他们赶快搬个地方。布置完后，留下一二个助手在那里工作，我就坐船到梅村去了。后来知道，我刚一离开，堵家弄这个“点”就被敌人破坏了。好几个同志被捕，

有的被砍了头，其中还有我带来的上海大学的学生。

梅村是预定的暴动集合地点之一。在梅村我见到了杭果人。他当时是江苏省委特派员、无锡农民革命军总司令、暴动的具体指挥者。他是一位知识分子，当地人，很年轻，不到三十岁的样子。至于严朴，我始终没有见着。

据杭果人向我介绍，无锡的工农运动在大革命时期原是搞得不错的。“四·一二”之后，国民党反动派紧接着在无锡制造了“四·一四”反革命事变，使工农运动受到摧残。但农会干部及时撤离市区，转移到乡村，损失不大。他认为，在无锡组织暴动是可以的，但准备工作做得不够；无锡是京沪线上的重镇，乡下虽然没有敌人驻军，可是城里敌人的军队几个小时就可来到，敌人决不允许在他眼皮底下搞暴动。因此，暴动的前途是不堪设想的。我问他有多少枪，他说农会只有二十多支枪。又说商团里面有我们的人，商团的枪可以为我所用，把一切可以调动起来的枪支加在一起，大约能有三百多支（实际上远没有那么多）。

王若飞原定要亲自来无锡领导这次暴动，但届时未到。为了等他，我和杭果人决定推迟暴动的时间。一直等到第三天，他还是没有来。杭果人决定不等了，通知各村立即发动暴动。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晚上，暴动开始了。那时，我们都在暴动指挥中心——安镇。杭果人身挎盒子枪，带着卫队，领头喊着口号，唱着歌（《国民革命歌》的曲，新编的词），冲向安镇街头。参加的群众大约有二百多人，个个颈系红布，手拿锄头铁棍，情绪很高昂。起义群众在安镇一个什么“公所”的门前举行了群众大会，宣布苏维埃政府

成立，宣读了第一张布告（布告上署有我的假名字）。接着就向地主豪绅的住宅冲去。其实，那时大点的地主早已躲进城里去，所以只捉了他们的家属。打开保险柜，也没见现大洋。当夜，暴动的群众把从地主家搜出来的地契、借据，连同地主的房屋、家具都点火烧了。一时间，火光冲天，欢声雷动，夜晚宁静的乡村，顿时沸腾起来。

和安镇同时发起暴动的还有怀上、怀下、北上、北下、石埭桥、查家桥等十多个村镇。但也有没有发动起来的，严家桥就没有发动起来。

为了阻止敌人军队下乡，暴动开始后，指挥部连夜派人割断电话线，推倒电线杆，还派出大批农民去掘铁路。由于铁路离暴动地点有四十多里，农民赶到那里已精疲力竭，加上不懂技术，实际上没有达到目的便散去了。

第二天，消息传到城里，敌人惊恐万状，立即出动军队镇压。保安队、水巡队纷纷下乡抓人，指挥部不得不改设在船上。那是一条普通农船，撑船的是位妇女，敌人盘查时都由她答话。两岸敌人查得很紧，我们根本无法和群众联系，成了“光杆指挥部”。一直走到常熟县境的大王庄（是个镇），才由那位英文教员上岸了解一些情况。大家没有吃的，也没有钱。我想起临来时带的一张港币，让他们拿去换了钱，买了吃的。我们边行船边开会。我因为不会讲无锡话，怕暴露，不敢开口。那两位军事干部不熟悉情况，也没有说话。只是那位英文教员给大家讲了讲地形情况。下一步怎么办呢？开始，杭果人主张集合起来再干。可是群众已经散了，与王若飞又联系不上（有人说他在扒铁路的地方），大家认为再干很困难，于是同意我的主张，



暂回上海。无锡暴动就这样结束了。

在回上海的路上，一片白色恐怖。无锡城门上和火车站上都挂着我们牺牲的同志的头颅。我回到桃源坊，见到了王若飞。接着，一些无锡的干部也陆续来到。大家心情很沉重。作为负责人之一的我，仓促接受任务，短短数日，失败而归，心情更加难过。回想这次暴动，我觉得存在很大的盲目性。首先，决定发起这场暴动，就缺乏对主客观条件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大革命失败报仇，其次，暴动的指挥者对如何抵抗强敌的反扑心中无数，当听到敌人军队下乡的消息时就慌了手脚，不战而退。此外，干部思想不一致，上面决定暴动，下面思想不通。严家桥之所以“按兵不动”，就是因为这一路的负责人思想上不赞成暴动。对于这样一场既无胜利把握，又无预先布置退却措施的暴动，怎么能不失败呢？

回上海后不几天，俞泽鸿召集我们汇报情况。记得在上海静安寺路静颐里开的会，瞿秋白、邓中夏（江苏省委书记）、王若飞、俞泽鸿、杭果人和我都参加了。会上发生了争执，瞿秋白批评我们不该逃跑，骂我们右倾。杭果人和我则认为发动这次暴动就是盲动。瞿秋白责问我：那里有没有群众！我说有。他又问：群众是不是拿着武器？我说是。他说有这两条就不是盲动。我不服，还要争下去。邓中夏怕我再争下去会被开除，就把我拉到一边，劝我不要再争，并要我明天到他那里去工作。他和我在广州相识，彼此比较熟悉。他关照我，我接受了他的意见，不再争辩。王若飞在会上作了检讨。这次会议不欢而散。

不久，传来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十一月扩大会议决议，

即《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不仅没有纠正，反而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形成我党的第一次“左”倾错误。

这就是无锡秋收暴动留给我的难忘的记忆。

# 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南方 局经济组的活动

方卓芬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统一战线委员会下面设有许多工作组，经济组是其中之一。经济组最早的组长是钱之光同志，后改由许涤新同志担任。一九四〇年上半年，周恩来同志回到重庆，他指示经济组的任务是宣传我党的财经政策、搜集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资料 and 开展工商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后来还担负着推动群众运动的任务。一九四三年六月，周恩来同志去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南方局由董必武同志负责。一九四四年五月，王若飞同志来渝后，经济组的人员增加了，工作也逐步扩展。《新华日报》的洪沛然同志担任副组长，组员除刘方华（解放后叫蔡业华）和方卓芬之外，增加了古念良和刘志诚同志。刘方华、古念良和刘志诚以《新华日报》记者的身份出面活动；方卓芬因经常和地下党员联系，没有公开露面。我们的工作对象是国民党的经济机关、工矿、工商界和新闻界，还有工人群众。

经济组联系的地下党员，开始时只有交通银行的杨修范、国民党行政院农产促进委员会的王希贤和电力公司的陈希。一九四二年以后增加了中国银行的沈镛（在“文革”

中被迫害致死)，邮政储金汇业总局的黄思静，和成银行的郑思章，工业合作社的严希纯(已故)、肖明、杨萍、林运飞、郭常清以及资源委员会甘肃油矿局的杨少任等人。一九四四年国民党军队在湘桂大溃败，由广西撤退到重庆的党员有海关的林大琪(已故)等四人。一九四六年初，在伪中央银行工作的王寅生(已故)由许涤新和潘梓年介绍入党。这时在国民党的经济机关和企业中活动的党员有十多位，他们在经济组的领导下，为党做了大量工作。

南方局统委经济组的基本成员，都住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以这个公开机关掩护党的秘密组织。我们在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亲自受到他的教诲。恩来同志严格要求每个党员，要我们遵守党的纪律，进行理论学习，重视时事分析，在革命实践中提高理论水平和政治认识。他经常给红岩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同志作时事报告。大约在一九四三年上半年，他为了提高党员的政治认识，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系统地讲党史，从建党讲到抗战，特别是把他所经历的广州“中山舰事件”、第三次上海工人起义、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作了细致、生动的分析。青年组的何启君同志记了两本笔记，他在去延安时，把这两本笔记交我保存。一九四六年我离开重庆调往上海的前夕，交给了钱瑛大姐。钱大姐在“四人帮”横行时含冤死去，这两本笔记至今没有找到下落，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周恩来同志在领导南方局时期，大约每半个月就要听取统委各个工作组的汇报。他在听取汇报时，经常提出问题，如材料是否可靠，应该怎样看法，都一丝不苟地询问，并对工作作具体指示，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他在



审查《新华日报》稿件时，不但对于不准确的理论观点给予改正，而且对标题、句子的错误也加以纠正。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许涤新同志在《新华日报》的《经济瞭望》专栏中，写了一篇题为《不变一定要乱》的文章。周恩来同志看后，改为《不变一定会乱》。他说“要”是主观的要求，“会”是客观的必然。周恩来同志对干部既有严格的要求，又有亲切的爱护。他的阶级友爱和革命精神，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经济组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 一、积极开展宣传工作

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宣传工作，是我党和国民党斗争的另一个战场。通过党报《新华日报》和党刊《群众》杂志，宣传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介绍陕甘宁边区和敌后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政策；揭露国民党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两面手法。经济组干部撰写的文章，着重于宣传我党财经政策，介绍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揭露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报道国民党统治区民族工商业的危机、农村经济的凋敝。反映了国统区与解放区不同的政治经济状况，给读者以鲜明的对照。经济组为党报党刊写稿比较多的时期，是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每人分工写一个方面的问题。许涤新同志负责撰写党报的有关经济问题的社论、专论。从一九四五年下半年开始，党报开辟《经济瞭望》专栏，每半月发表一篇经济述评，也是由他执笔。

经济组还为《群众》杂志编写经济专辑。一九四四年第

九卷第十期中,就有我们编写的经济特辑。从一九四五年开始,每一季度有一期经济特辑,专门报道在这一季度中,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变化情况。计有第十卷七、八两期合刊,刊载了《三十四年第一季度的大后方经济》、第十卷十六期刊出《第二季的大后方经济》、第十卷二十四期刊出《第三季度的大后方经济》、第十卷二十八期刊出《三十四年的大后方经济》。在这个专栏里,有金融、工业、农业、物价等方面的文章。

为了掌握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情况,在经济组内部不定期地召开经济讨论会,邀请报馆和红岩办公室的同志参加,有时还请外面的同志来作专题讲话。我们订有重庆出版的七、八种报纸,分类剪贴有关的经济问题,作为组内研究问题的素材。现在看来,当时我们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是很肤浅的,缺少理论分析,谈不上有什么专业研究,但我们联系实际,引用了大量现实材料。尽管有的文章经过检查机关的删节或扣留,但我们始终没有后退,代表了广大人民讲话,争取了大部分民族工商业者(特别是中小工商业者)和国民党经济机关以及民营工厂、商店的职员。

除了公开发行的党报、党刊外,当时还有秘密发行的宣传品,这就是原准备在报上公开发表而被国民党扣留或删节的文章,以及党的其他文件。如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国民党进攻的真相》,朱德同志写的《论解放区战场》以及《解放日报》选刊(大约一个月出版一期)。经济组的干部和其他组的同志一起,承担散发宣传品的任务。我们通过进步群众将这些宣传品散发到社

会上去，扩大党的影响，争取更多的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

我们在工作中坚决执行党的群众路线，获得了群众的支持与帮助。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一批党外积极分子，千方百计去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很使人感动。下面几件事是我亲自经历的。

一九四五年七月六日，《新华日报》刊出毛主席在党的“七大”上的报告《论联合政府》。这篇政治报告轰动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报纸刚发行即被抢购一空。但有一部分被特务没收了，邮寄外地的也被扣留。王若飞同志让《新华日报》馆加印二万份，分到各组，由各组党员负责发出，不但要送到重庆市内，而且要送到外地。经济组负责送的约六百份，要马上送到工商界和企业、工厂中去。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但在发送时要冒点风险。我们都在动脑筋想办法，怎么查找工商界上层人物的地址，怎么通过党的外围积极分子发出去。青年组朱语今同志提议查电话簿，我们认为这个办法很好，便行动起来，把经济界的银行、外贸、工厂的地址抄出来，按行业分工发送。

第二天天刚亮，趁着浓雾未消，行人稀少的时候，我和刘方华同志穿着比较入时的衣服一起出发了。记得老刘穿着笔挺整洁的白色西服，擦得发亮的皮鞋，戴着一副金边眼镜，俨然象个高级知识分子。我穿一件淡兰色的短袖旗袍，半高跟皮鞋，象个大学生的样子。我们各提着一个装满《论联合政府》的旅行袋，到化龙桥坐马车进城，到了城里就分头找朋友去。我首先到蚕丝公司、猪鬃公司发信，发觉有特务钉梢，马上转到昆明华侨书店驻渝办事处，然后到和成银行女宿舍，这两个地方都是我们联系的据点。

昆明华侨书店驻渝办事处，地址在民生路附近一间小店的楼上，房子简陋，楼梯不在店里，而是在店后，从一条小巷拐弯进去，地点很偏僻。书店负责人杜俊坚（现名杜灿之）和他爱人郭常洁，原来都是泰国华侨学生，一九四二年从昆明到重庆，经文化供应社重庆分销处郭常昌（现名郭乐之）的介绍和我们联系。他们热爱祖国，对党有感情，诚实可靠。这个简陋的楼房就成了我们的联络点、交通站。那批从南洋、广东经桂林来的同志和朋友，如黄声、张震、丘秉经等都在这里和许涤新同志晤谈过。“工合”的肖明、杨萍、林达飞、郭常清同志也曾在这里和我们碰面。杜俊坚、郭常洁和郭常昌三人就成了可靠的交通员，为我们送宣传品和文件。郭常洁为了收藏这批宣传品是熬费苦心的。她想出一个办法，在床铺下面抽出一块地板，把宣传品藏好，再把地板盖好，上面放上鞋子等物。到夜深人静时取出宣传品分成几捆，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和《扫荡报》伪装，邮寄到云南昆明和四川的白沙、璧山以及重庆附近的四川华侨第二中学（以下简称侨二中）。

侨二中在綦江杜市。国民党政府为了争取青年，防备华侨学生去延安，招来大批流落在重庆、桂林、昆明各地的侨生，安置在侨二中念书，同时也布置了一批特务监视他们。杜俊坚联系侨二中的一批同学，其中有泰国华侨黄秋发（党员，后在中原解放区牺牲）、潘莹、叶瑶华等人。他们在阅读党的宣传品时，必须用巧妙的办法逃避特务的监视。黄秋发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把宣传品藏在泡菜罐里，埋藏在附近小山的山洞里。每当傍晚或周末，他们就轮流在山坡上放哨和阅读，阅完之后藏回原处。据潘莹同志回忆，当时传



给他的宣传品，纸张已经发黄，边已破裂，摺痕很多，可能已经过不少同学之手。一九四四年夏，黄秋发等毕业后考入北碚复旦大学，他们又在复旦开辟了一个散发宣传品的点，侨二中就由叶瑶华负责传阅和散发宣传品的工作。

我们的另一个联络点是和成银行女宿舍。这里是我和交通银行唐梅林、江海银行孔祥如(原名孔东海)接头的地方。当时和成银行女职员顾惠芳(现在是上海驻京办事处的负责人之一)是唐梅林发展的进步群众。她房间里住了三个女青年，都是《新华日报》的读者，思想倾向我党。我自称是《新华日报》记者，和他们交上了朋友，经常送给他们一些被扣留的报纸和其他宣传品。当发送《论联合政府》时，我请顾惠芳帮忙，她欣然接受。后来我问她怎样发出的，她告诉我，那天晚上她们很早就熄灯，利用从窗外透进来的月光，三个人围着一张书桌就工作起来，有的写信封，有的装信封，一直工作到深夜。次日天刚微明，她已悄悄地把信投入各家银行的信箱里。

交通银行唐梅林，在散发《论联合政府》时也是很用心的。他专门寄给国民党机关的职员，甚至寄给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中统”和“军统”的负责人。有一部分是假冒《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的名义，按照各大学的同学录上的姓名、地址寄发的。

散发到外省去的宣传品，也是由群众从各个渠道寄出的。文化供应社重庆分销处的店员郭常昌利用国民党政府各部的大信封寄出，重庆工业联合公司的职员王起谋利用反动的“正中书局”寄印刷品的标贴纸作掩护发出，这样即可避免国民党邮检机关的检查，使党的宣传品安全到达昆

明、贵阳以及广西的乐平、桂平等地。

## 二、搜集、研究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资料

一九四二年，经济组根据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指示精神，对所联系的地下党员和党的外围积极分子提出要求，要他们在本单位做好业务工作，团结进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搜集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资料。

经济组搜集的经济资料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金融界，二是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三是国民党经济机关、企业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团体。我们所联系的党员和群众，都在这些机关中任职，所以资料来源比较丰富，反映的情况也比较确切。如杨修范同志提供了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大银行对黄金、美钞、银元以及一些重要物资的投机活动情况；“四联总处”历次会议的记录；货币发行数字；交通银行总处、信托部和重庆分行的资产负债表，以及对主要的民营工商企业的投资情况、股份、股数、股东代表人经营活动情况。中国银行的沈镛同志提供了“四行二局一库”（四行即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二局即邮政储金汇业总局、中央信托局，一库即中央合作金库）的调查报告和动态资料。

沈镛同志的爱人黄思静同志在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工作，她把这个局的组织机构、上层人员的政治态度摸清楚写成了书面材料，还提供了侨汇、存款、汇款、储蓄数字。沈镛对文学作品有兴趣，他和祝纪和（现在上海《新民晚报》

工作)共同集资办了一个“美学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出版过三十多本书，大半是进步作家的作品。沈镛由此也结交了一些朋友，扩大了统一战线工作。

杨少任同志在资源委员会下属的甘肃油矿局任职，提供了甘肃油矿局的资料，以及资委会所属其他工矿的资料。杨的爱人李惟存同志在国民党财政部盐务局当职员，她曾系统地提供了关于盐务局的情况，以及关于盐专卖、盐税等统计资料；也曾为我们翻译过英文资料，发送过党的宣传品。

王希贤同志是国民党的行政院农产促进委员会的职员。他经常把农产促进会所编写的《农讯》、《农情报告》送给我们。他利用这些刊物，报道过解放区的农业生产情况。一九四四年他以农林部川北农业调查组组长的名义在合川、武胜、岳池、蓬安、南充、仪陇、通江、南江、巴中、旺苍等县调查，把在农村搜集的情况向我们汇报。经济组召开有关农业问题讨论会时，曾请他参加，他作了川北调查的讲话。根据这次调查，他以王强为笔名撰写了《从川北灾荒看大后方的农村经济》一文，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八、二十九日的《新华日报》上刊出。他还联系过“中华农学会”，和王寅生共同主持召开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座谈会。这样，我们在农业研究部门中就有了一个据点。

严希纯是一个老同志，他在北伐战争时参加革命，皖南事变前，他在重庆的工业合作社任职，此外还兼任文化供应社重庆分销处经理职务。他的朋友相当多，联系面很广，有国民党经济部中央实验所、水利委员会的职员和技术人员，乡村建设学院的教师。我们和他联系后，他提

供了不少这些方面的情况。

海关的林大琪同志，提供了海关方面的资料，他还在海关发展群众组织。陈希同志在电力公司办过技术训练班，又组织过“青年技术协会”，通过这些组织进行宣传教育工作。

一些进步群众也搜集了不少经济资料。如沈经农同志，一九四四年他在迁川工厂联合会的中国工业研究所工作时，为我们搜集了抗战时期大后方民族工业的材料，其中包括国民党统治区民族工业的产销困难，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的矛盾，重庆煤矿业、纺织工业生产的问题以及民族资本家的思想动态等材料。川康兴业公司秘书孙蕴实同志提供了川康兴业公司的比较系统的资料。

民生公司也有我们的朋友。该公司高级职员何迺仁和工程师章华生以及一些青年职员，为我们提供了民生公司的组织机构、客运、货运及军运资料。

我们还通过在国民党财政部和税务局工作的两个广东同乡，得到了国民党财政部的年度、季度报告和税收统计等机密资料。

从各方搜集来的资料，均由许涤新同志综合写成书面报告，送周恩来同志或董必武同志审核后呈送延安党中央。最近看到周恩来同志在一九四二年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统战部的报告中说：“一年来，经过经济组的工作，已恢复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等十余处的旧关系，发展了重庆电力厂、邮汇局等十余处的新关系，……已编辑出版一种经济问题研究资料。这一年中收集了有关计划、金融、工合、厂矿、交通、粮食、农林、物价方面的材料一百余种，成绩的显著，为以前所不及。”



经济组的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是和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的正确领导以及我们认真做好群众工作分不开的。我们对所联系的党员和非党群众，注意从政治思想上培养、教育他们，使他们更加自觉地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胡小为的成长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她出身于苏州大地主家庭，抗战时期逃到重庆，为她父亲的朋友所收养，送她进教会女子中学上学。由于她在少年时期流落异乡，思想无所寄托，加上学校环境的影响，竟然笃信起上帝来。一九四四年和我们联系以后，思想上变化很快。在我们的培养下，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变成党的外围积极分子。胡小为的养父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家里往来的都是一些国民党高级军官及其家属，有时他们在打牌聊天时，谈起国民党军队的内部情况，她就利用这个条件，为我们搜集国民党的情报。一九四五年春，她在重庆白市驿中美联合材料库（简称 P. A. D）任英文打字兼做登记、统计资料的工作。这个机构受国民党航空委员会领导，根据“中美租借法案”规定，接受美国给蒋介石的飞机和有关零件。这个材料库共有十六个库房，胡小为把这个库的组织机构、人员配备，从美国运来的各种器材入库数量，以及国民党空军每月领到补充的出库数量等统计副本抄给我们。她不仅自己订阅了《新华日报》，还在该库中为《新华日报》发展订户，利用《新华日报》报童给我们送信。由于她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千金小姐”，她的活动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九四六年材料库搬到上海，她也调到上海。这时我们也到了上海，在中共代表团工作。她仍然为我们提供情报，直到一九四七年去解放区为止。因为她有这段经历，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被造

反派打为“特务”，揪到上海批斗，几乎把她折磨死。

### 三、开展工商界的统一战线工作

抗战后期，我们对工商界的工作主要是支持民族工商业反对经济统制的斗争，推动“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的成立，以及开展对华侨的宣传和统一战线工作。

#### （一）支持民族工商业 反对经济统制的斗争

自从一九四四年国民党军队在湘桂大溃退以后，人民群众对国民党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独裁专政极为愤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如燎原野火燃遍大地。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日益恶化，物价高涨，法币贬值，人民生活每况愈下。国民党政府通过统购统销政策巧取豪夺，特别是对中小工商业的掠夺更甚。民族工商业者被压得忍无可忍，于是起来进行反经济统制的斗争。我党积极支持他们的斗争。一九四五年一月重庆市商会和贸易业等四个公会，公开向国民党政府要求废除统购统销。一月十二日，《新华日报》就发表题为《废除统购统销》的社论，指出，“统购而不购，购而不付钱”，“统销而不销”，“以致出现人民买不到布，而花纱布局却出现霉布、烂布、烂棉”的情况。一九四五年七月九日，工商界出口业代表招待川康参政员，呼吁废除统购统销。同一天，重庆市商会、重庆市牛羊皮猪鬃肠衣输出业公会、重庆生丝输出业公会、重庆市山货药材输出业联合会联名发出《统购统销何以尚

未取消》的意见书。《新华日报》刊出了这个意见书。经济组的同志在党报、党刊上写了不少文章描述民族工商业的困难，支持他们的斗争。

这一时期，中小工商业者为了本身的生存，要求组织起来向国民党政府进行斗争。一九四五年秋，由罗叔章同志(当时她是重庆第一药品生产合作社的负责人)和徐崇林出面筹组“中小工业联合会”。它是在“军布联谊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军布联谊社”成立于一九四二年，是由海燕织布厂的负责人田钟灵组织的。田是经济组的积极分子，党给他的任务是团结、争取中小工商业者。为维护同业的经济利益，他在接受军布的任务中，团结同业反对国民党政府克扣工料，压低工缴费用，“短码缺圈”等恶劣行径。斗争取得了一些成就，在同业中建立了威信。为了扩大中小工业中的统一战线，南方局指示，在“军布联谊社”的基础上筹组“中小工业联合会”。“中小工业联合会”在筹备期间，进行了不少工作。如一九四六年旧政协开会期间，向大会送交“意见书”，提出了紧急救济中小工业的具体方案。一九四六年三月，“中小工业联合会”正式成立，包括土布、军布、制革、制药、造纸、炼油、煤矿等同业公会，共十七个单位，二百八十余家工厂。这个团体开始强调以经济利益为主，后来，随着民主运动的发展，逐步与其他进步团体一致行动，进行了反内战、反官僚资本的政治斗争。

## (二) 成立“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

一九四四年初，我党提出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

政府，“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主张。党的主张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在各民主党派中引起强烈反应，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各界各党派纷纷发表对时局的宣言，提出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给人民以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为了团结经济界的进步分子，经济组建议把经济机关、企业中进步的资本家和厂店中的职员以及经济理论工作者组织起来。这一建议得到南方局的批准。“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就是这样组织起来的。这项工作从一九四五年七、八月间开始，由许涤新、沙千里、罗叔章、胡子婴、杨修范和王寅生等几个人组成核心小组进行活动。参加具体工作的有林大琪、严希纯、陈希、耿一民、叶和衷、田钟灵、胡方等。这年十月二十四日，“经协”筹备会召开座谈会（有几位当时的参政员参加），提出经济民主的九点主张。这九点主张受到周恩来同志的重视，并于十一月五日在《商务日报》上发表。一九四五年冬，“经协”筹备会在林森路的西南实业协会餐厅，召开了一次欢迎中共代表团的小型集会。周恩来、邓颖超、陆定一等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周恩来同志在会上讲了话。这个会虽然开的时间不长，但对“经协”筹备会的负责人鼓舞很大。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经协”在西南实业大厦召开成立大会，应邀出席的有：中共领导人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同志；民主人士沈钧儒、马寅初、梁漱溟、胡厥文等。会议通过章程，推选阎宝航同志为理事长，沙千里、杨修范、林大琪、罗叔章、胡子婴、王寅生、耿一民为理事。参加“经协”工作的，还有企业界的酆云鹤、冯荣茂、文先俊等人。从事经济研究的勇龙桂、刘先惠、欧阳执无、寿进文



等也在“经协”中起了作用。在“经协”成立大会上，还通过了《对于当前经济问题的意见》。这个意见书是经过经济界好几位朋友多次研讨，由王寅生同志执笔，基本上根据《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的精神写成的。为了写这个意见书，王寅生同志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的小客室中，从下午八时写到次日天亮。这个意见书于十二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在《新华日报》和《大公报》上刊出。意见书的内容很充实，它打中了国民党政府在经济上的反动腐败的要害，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尽管它所提的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在当时没法做到，但在统一战线方面我们赢得了胜利。

“经协”，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后作了不少工作。如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提出“意见书”，参加各党派组织的“政协协进会”主办的民主晚会。这个民主晚会是为促进政协会议开得成功，贯彻执行会议的决议而举办的，一共开了八次大会，请各界知名人士演讲。我党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同志，以及郭沫若、邓初民、李德全等人都在晚会上讲了话。后来会议受到特务的干扰、破坏，形成了“沧白堂事件”。这些工作，团结了民族资本家中的进步和中间分子，推动了民主运动。

一九四六年初，许涤新和罗叔章同志考虑到“经协”负责人将要离开重庆，而“经协”的工作还要继续下去，经多次召集负责人讨论，决定在总会迁沪之前建立四川分会，由闫宝航、洪沛然同志负责，常务理事为彭友今、赵景生、陶敬之（一九四八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于重庆）、刘大震、王健行、田一萍、甘祠森、唐梅林等人。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八日，四川分会成立。马寅初先生在成立大会上演讲，

他指出中国工业要发展，必须坚决反对官僚资本。他的慷慨激昂的讲话，轰动一时。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九日，“经协”又提出《对当前几个经济问题的意见》，特别着重于外贸、外汇和外援的问题，有不少切中时弊的主张。《新华日报》于五月三十日刊出了这个意见书。“经协”在四川的工作一直继续到一九四七年。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经协”总会迁到上海。在南京筹组分会，由耿民、王希贤同志负责。这时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协议，向解放区大肆进攻，抢夺人民胜利果实的时候，上海已处于相当紧张的境况中。“经协”的大规模活动已受到影响，只能开展骨干分子的小组活动。留在上海的地下党员，如杨修范、勇龙桂等同志，仍然通过“经协”会员搜集国民党的经济情报，团结经济界的一批上中层人士。一九四八年反动派在上海疯狂镇压革命力量，“经协”只好停止活动。

全国解放后，“经协”在上海恢复了活动。当时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加工定货、收购产品等政策。党曾通过“经协”这个团体对中小工商业者、私营企业的高级职员进行宣传教育，使他们接受改造；并收集他们对加工订货、公私关系的反映，供有关部门的领导参考。“五反”运动以后，“经协”的会员多半参加了民主建国会，至一九五五年“经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 **(三)开展对华侨的工作**

经济组利用一些朋友和同志的商业活动，向海外华侨开展党的宣传工作和经济业务。安达公司就是一个重要的

据点。安达公司的前身是一个由泰、越华侨集资的侨汇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侨汇来源断绝，广东侨眷生活陷入困难境地。此时，在泰国一带从事抗日活动的我党党员庄世平、许子奇等，用办侨汇的形式来沟通我党与华侨的联系。他们在日军占领下的南洋一度中断与国内联系，后来根据黄声（黄为我们做了不少工作，“文革”中被诬害致死）绕道回国的经验，找到一条回国的路线。于是在海防、东兴以及柳州，布下经营侨汇的一些据点。在柳州建立了一个联营组织，专门做侨汇和进出口贸易。同时还在北海、广州湾和东兴设有分号，与我党的南委（即南方工作委员会）在柳州的联络站取得联系。

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上半年，庄世平、许子奇和邱秉经等同志，先后到达重庆，与经济组许涤新同志建立了工作关系。他们筹备成立安达股份有限公司，打算以河内为中心开展业务，经营苏联影片。在此之前，党组织已介绍杨少任同志秘密与苏联商务处洽商苏片向南洋发行的事务。一九四五年初，安达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成立。推选许子奇（解放后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已故）为董事长，庄世平、邱秉经等为董事，杨少任为安达公司驻渝办事处主任。一九四五年冬，安达公司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由杨少任同志负责。这时杨已辞去甘肃油矿局的职务，全力放在安达公司发行苏片的业务上。日本投降后，庄世平偕陈云霖（陈群）首先带两部苏片《会师柏林》、《空中交响》去河内，这两部影片在曼谷、河内首次放映，影响很大。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安达公司迁往香港，并以香港为中心，河内的机构作为分公司，向南洋扩展业务。

安达公司为党做了不少工作，我党通过它与港澳、东南亚经济界中的华侨建立了统战关系，团结了许多爱国侨胞，并为新中国的影片在南洋发行打下了基础。这个公司还为党做了重要人物的接送工作。

此外，经济组还担负推动群众运动的任务，组织和领导所联系的党员和外围骨干，用举办读书会、时事座谈会、技术研究会等方式去开展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积极参加各次反国民党蒋介石独裁专政、争民主的群众集会；参加工商团体的一些活动（如西南实业协会发起的星五聚餐会和迁川工厂联合会的座谈会）；动员青年到中原解放区去；动员青年职员到陶行知和李公朴举办的社会大学学习。在工人运动方面，重庆电力公司、二十一兵工厂、“劳动协会”都有我们联系的党员和外围骨干，他们积极参加企业的工人运动和秘密开展进步活动，在工人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这些工作推动了当时的民主运动；培养了革命力量。不少青年学生、职工，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培养起来的，使他们从一个革命的同情者转变为革命者。



# 记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

勇龙桂 刘志诚

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是中国共产党在蒋管区的经济中心——上海的一个隐秘哨所，是团结经济工商界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阵地，也是我党编辑出版经济通讯稿件的宣传据点。这个通讯社于一九四七年在上海正式成立，在完成了历史使命之后，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光荣地宣告解散。

早在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后，我们在蒋管区的工作重心从重庆向上海转移时，就开始酝酿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当时，许涤新同志提出在上海设立一个公开的经济通讯社，以便从事搜集国民党地区的经济情报和进行其他革命活动。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和王若飞的批准。于是，许涤新同志约集肖明同志和一位在郭沫若同志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过的朋友（姓名已记不起来，是董老介绍的）开始筹备。这年冬，勇龙桂同志回到重庆，也参加了这一工作。一九四六年六月，大家转到了上海，在许多同志和朋友的支持下，筹备工作进展很快。

现代经济通讯社为了在蒋管区取得公开合法的地位，便以民办企业的名义，向党员和党外人士募集股金，并成立了董事会，在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办好了合法手续。

当时，在解放区担任华东财委副主任的方毅同志，还通过徐雪寒同志以秘密方式认了股，这对通讯社是个极大的支持。

一九四六年冬，许涤新等同志撤退去香港时，组织上决定勇龙桂，古念良和刘志诚同志留下来，由勇龙桂同志负责，继续抓现代经济通讯社的工作，由陈乃昌和肖明同志协助。不久，古念良、刘志诚同志转往香港，组织上又安排黄洪年同志负责发行财务工作。为了保持党的直接领导，一九四七年春，当刘少文同志经香港到上海时，许涤新同志把现代经济通讯社的组织关系交给了他。但对于重大问题，仍要和在香港工委工作的许涤新同志商量处理。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为了迎接上海解放，现代经济通讯社在上海市委接管委员会的领导下，做了许多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

## 经济宣传战线上的斗争

现代经济通讯社的工作人员，除了通过各种关系搜集蒋管区的经济情报外，还灵活巧妙地利用经济评论或报道新闻的方法，揭露蒋管区经济破产的实况，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每当国民党作出重大的经济决策或市场情况有较大波动时，如发行金元券、冻结物价、抢购粮食、美钞金银黑市泛滥等，现代经济通讯社即通过公开发行的经济新闻稿，或边叙边议，旁敲侧击；或抓住要害，点出真相，预示蒋管区的经济必然崩溃，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国民党腐败、虚弱本质的认识。一九四八年秋，正当上海市粮食

供应日趋紧张，粮价不断上涨，人心惶惶之际，现代经济通讯社在报道粮食市场的新闻中，暗示上海只有一个月的存粮了。这条新闻被上海《大公报》和《文汇报》冠以“现经社讯”，在同一天刊出。有位老报人看了哈哈大笑，说：这条新闻好得很，因为它必然会进一步引起市民的恐慌，争先恐后去抢购粮食，从而使社会更加混乱，加快国民党反动派的垮台！

一九四八年九月，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带了“尚方宝剑”来到上海。他在宣布发行金元券的同时，还宣布“冻结物价，取缔投机”。蒋经国故作姿态，佯称要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曾邀请一些知名人士进行座谈，以欺骗社会舆论。在被邀请的人当中有我们的地下党员张锡昌同志。锡昌同志当时在上海棉纺工业同业公会工作，是现代经济通讯社的积极支持者。那时，解放军节节胜利，蒋管区日益缩小。蒋政权不仅军事上连连惨败，而且财政经济日益破产。蒋管区的通货膨胀日趋恶化，物价暴涨，民怨沸腾。蒋政权妄想滥发钞票的同时，把物价冻结住，这完全是痴心妄想，是根本不可能的。组织上经过研究，决定将计就计，同意张锡昌出席座谈会，并在会上作一次策略性发言。张锡昌的发言，表面上拥护国民党政府执行冻结物价的政策，实际上是“请君入瓮”，收到了加深蒋管区经济危机的效果。果然，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份，国民党政府冻结物价的政策即宣告失败。于是物价再度狂涨，蒋管区一片混乱。

当蒋经国大搞冻结物价的时候，笔者正在上海，目睹那几天南京路上人山人海，人们在几家百货公司和大商店

里抢购商品。没有多长时间，货物卖完，商店纷纷停业。民族工商业受到摧残，投机活动更加泛滥。这就更加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愤，反蒋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地冲击着摇摇欲坠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加速了它的崩溃和灭亡。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行将崩溃。现代经济通讯社除坚持发行日刊外，还编辑发行了《星期增刊》和出版经济丛书，汇编经济资料，准备迎接解放。《星期增刊》着重汇编财政、金融、外贸、物价、工业生产、外贸动向等经济统计资料，以及有关专题的分析评论。经济丛书则汇编系统的经济专题研究材料，先后编印的有：《上海粮食问题》、《美棉进口问题》、《上海面粉工业的情况》以及《进出口贸易问题》等。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这些刊物对有关部门接管上海的工作，有直接参考价值。就是在今天，对于了解旧上海的经济情况，仍然有一定作用。

现代经济通讯社，不断地、大量地向留在香港工作的许涤新等同志发送各种年报、丛书、刊物、报告。只要是对接管上海有参考价值的材料，通讯社的同志就积极搜集，及时发送。至于通过秘密途径搜集到的重要经济情报，就秘密地交给刘少文同志或其他上级领导同志。那时我们几乎每个月或两个月就能搞到国民党滥发法币和金元券的发行数字，从而确切地掌握了国民党地区恶性通货膨胀的发展趋势。不少秘密党员给了通讯社及时的、有力的协助。担任中国纺织工业总公司总工程师的陈维稷同志（解放后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担任青岛分公司经理的王新元同志等，曾多方设法支持通讯社，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当时，在上海专门报道经济消息的通讯社还有三、四家，相互竞争得十分激烈。有的通讯社是以国民党作后台的。其中有一家“军统”办的名叫“中国经济通讯社”，资金相当雄厚，纸张来源也有保证，职工数十人，通讯稿铅印出刊。但老是亏本，没人看。他们看到我们办的现代经济通讯社，职工只有十人，通讯稿是油印的，却销路不错，经济可以自给，感到奇怪。于是，背地里对我们进行调查，但又没有查出名堂。以后，就有些坏蛋散布了一些对我们恶意中伤的谣言。由于我们提高了警惕，对他们的斗争注意有理、有利、有节，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为了支援解放军进军华东，通讯社曾搞了几台短波无线电收发报机，通过副董事长陈维稷同志的关系，由地下交通送到了皖南军区某部队。一九四九年初，陈维稷同志因被坏人诬陷，不幸被捕。现代经济通讯社的同志立即做好了一切应急准备。由于没有任何证据，同时利用伪代总统李宗仁搞假和谈的时机，发动交通大学的名教授公开抨击，积极营救，不久维稷同志重新获得自由。通讯社的同志继续奋勇前进，为完成自己的任务又作出新的努力。

## 团结了爱国民主人士

现代经济通讯社，是党设在蒋管区的秘密据点，也是党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和经济界名流学者的统一战线阵地。通讯社的董事长是“小民革”的领导人之一、兴华茶叶公司总经理吴觉农先生（现任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通过他的关系，我们又团结了不少爱国民主人士和工商界朋友，并

且在许多场合得到了他们的帮助。社长是杨荫溥先生。当时，杨担任交通大学、光华大学教授，在经济界和教育界有相当声望。他虽然是一名伪国大代表、上海市伪参议员，又兼上海市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但对经济新闻事业却比较热心。因此，组织上经过研究，决定推他当通讯社社长。并运用他的声望和名义，从中统特务吴开先所控制的伪上海市社会局，领出了正式执照。历史证明，这个策略的运用是正确的。

现代经济通讯社的总编辑娄立斋，是新闻界和经济界的知名人士。他是进步的老报人，一向靠拢我党。当时，通讯社内不少青年同志从前没有搞过经济新闻报道工作，是第一次跑证券交易所，第一次采访市场消息和第一次编写经济通讯稿件，工作起来有困难。娄立斋等老同志总是不辞辛苦，手把手地教这些青年同志，帮助他们提高业务能力。

现代经济通讯社的董事长和许多董事，都在募集股金，介绍必要的社会关系，疏通一些环节等方面出过力。特别是募集股金，他们除自己认股以外，还介绍亲友入股。有许多朋友都认股出钱，支持通讯社。当时，团结在通讯社周围的股东有一百几十人，订户数更要大几倍，可以说，团结面是相当宽的。

上海解放后不久，现代经济通讯社举行常务董事会，认为通讯社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决定正式解散。剩余的资金，全部捐赠给我党领导的另一个民主团体——中国经济事业促进会。

现代经济通讯社的同志们，在一些老同志的带动下，

经过三年多的斗争，在政治上和经济业务上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解放后有些同志能驾轻就熟地参加接管工作，是和通讯社工作期间受到的培养分不开的。一九四九年六、七月间，在通讯社担任秘书的曾联松同志，热心地响应中央关于征集国旗图案的号召，设计出了五星红旗的国旗图案，不久被正式选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他光荣地受到了奖励。

# 罗荣桓年谱(初稿)

(一八〇二年——一九六三年)

《罗荣桓传》编写组

## 一九〇二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旧历壬寅年十月二十七日),罗荣桓出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鱼形镇南湾村(现衡东县杨林区鱼形公社)。

祖父罗汇吾,贫农,是一个不第秀才,一生以教书为业,只留下一斗谷的田。

父亲罗国理,二十岁时当过童蒙老师,后来借钱在南湾开了一个“永隆”杂货铺,兼卖中药,半农半商以商为主,家境渐渐好转,添置了一些田产,并担任了黑田罗氏的征首和乡里的团总。一九〇八年以后,因受人诬陷,打了几年官司,家境开始破落。

母亲贺氏,娘家世代都是长工,同情劳动人民,为人宽厚而又坚强,亲友称誉她“外柔内刚”,是“寒林一枝之秀”。她对子女既严格要求又非常爱护,对罗荣桓影响很深。

罗荣桓原名慎镇,字雅怀,号宗人。有兄弟姐妹八人,他排行第六。在读高小时,一位国文老师取诗经“桓桓于征”之意,为他改名荣桓。



### 一九〇八年——一九〇九年(六岁——七岁)

幼年的罗荣桓从呀呀学语，就学念李白等人的诗歌，到六岁时父亲就教他读《三字经》、《三五七言杂字》等书。

他不喜欢串人家走亲戚，但常常去贫穷的舅舅家，和两个勤劳的表兄弟很要好，和他们一起砍柴、割草，学习农事劳动，也和他們一起爬树、游泳。这既锻炼了他的身体，也陶冶了他的性格。

一九〇九年，由于天灾人祸，湖南饥民达十万之多，很多地方的贫民靠剥树皮，挖草根过活。南湾人民的生活同样十分困苦。罗荣桓家对面的一户农民就靠吃“仙粉泥”度日。这幅苦难图景，引起罗荣桓的极大同情。

### 一九一〇年——一九一三年(八岁——十一岁)

罗荣桓先后在羊丫山(又名包老坳)和肖家新屋私塾读书，读的有《四书》、《左传》、《纲鉴易知录》等。他有强烈的求知精神，学习非常刻苦。除了学校的功课以外，他还翻出家里的藏书，废寝忘食地阅读。有一年夏天一个炎热的中午，人们都休息了，他却爬到学堂门前水塘边一棵树上，聚精会神地读起书来，由于过度疲劳竟跌进水塘里。

### 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六年(十二岁——十四岁)

一九一四年，罗荣桓进本村罗氏岳英小学读书。校长罗炳文是一个思想比较开明的人，学校除设国文课外，还有算术、博物、历史、地理及音乐、体育、美术等课。罗荣桓对这些新的知识很有兴趣，他喜爱自然科学，父亲也

鼓励他多学一些“实用之学”。

罗荣桓读书很用功，经常点着煤油灯读到深夜，家里人说他是“一天到晚捧着一本书”。在学习中，他对历史上救国为民的仁人志士非常景仰。在学校他曾写过一篇《论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的作文，称赞禹公而忘私的精神。这篇作文被老师选为范文贴到墙上，供全校同学阅读。

他对民间流传的迷信思想表示怀疑和反对。每年接祖神、吃祠堂酒、分祚肉等活动他都拒绝参加。一次，他和一个同学在关帝生辰前一天，到附近的关帝庙，把关帝塑像肚子里装的盐茶米谷掏空，另外塞进一些牛屎狗粪，表示他们对迷信活动的蔑视。他的父亲是族长，有一次要打一个贫农的屁股，罗荣桓挺身而出，责问父亲：穷人犯了族规要打板子，为什么财主犯了族规就不打板子？结果没有打成。

一九一六年夏，罗荣桓毕业于罗氏岳英小学。

**一九一七年——一九一八年（十五岁——十六岁）**

南北军阀在湖南混战，兵荒马乱中，罗荣桓继续断断续续读私塾。

**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三年（十七岁——二十一岁）**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这年秋天，罗荣桓到长沙读书，他进的是革命青年柳直荀等人创办的协均中学（原名谊群补习学校）。当时社会上新旧思潮斗争激烈。年底长沙爆发了反对军阀张敬尧和抵抗日货的活动。罗荣桓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他从

群众爱国运动和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潮中吸取了营养和力量。

同年，不满十七岁的罗荣桓由父母包办完婚。他对这种婚姻十分不满，是被逼着进新房的。后来他在武汉，准备参加鄂南暴动的时候，写了一张离婚书，并写信给女方劝她另嫁。

罗荣桓对旧社会处在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妇女深为同情。他认为妇女和男人一样，应该有学习自立的权利。他外出读书以后，动员他的妹妹和一个侄女也外出上学，家里不同意，他就进行说服和斗争，最后还是帮助这两个人上了学。

一九二一年夏，衡山地区大旱，据湖南省志记载：“衡山已四十余日不雨，高低俱涸，春荒未了，夏旱又来，秋收绝望，人民喘息呼号”，而反动统治者又乘机发财，将大量米谷外运，更加重了农民的苦难。暑假，罗荣桓由长沙回家。寒水乡地主肖罗仙不顾天旱失收，率众到南湾刈禾退佃，罗国理为了保护族人利益，出面制止，双方争吵，引起械斗。罗荣桓的家也因此再一次吃了官司。这件事使罗荣桓又一次看到了社会的黑暗。

一九二一年暑假，罗荣桓回家邀集土字、梦字两地区的同学（当时衡山县按十七个字划分地区）在南湾成立“土、梦学友联合会”，以“联络感情，增长知识，移风易俗，促进社会”为宗旨。罗荣桓被选为会长。联合会的一项主要活动就是举办平民教育，他们利用岳英小学的校舍，因陋就简办了一所农民夜校，设国文、算术两门课，罗荣桓教算术。夜校还宣传了一些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想，深受农民群

众欢迎。

一九二三年三月，长沙各界六万多人召开了要求归还旅顺、大连，否认二十一条的示威游行，罗荣桓和同学们一道参加了这一活动。

四月，湖南成立了以郭亮为主席的“湖南外交后援会”，号召对日经济绝交。罗荣桓又走上街头，参加演讲和搜查日货的活动。

一九二三年六月一日，日本武装水兵在长沙湘江边向我进行爱国活动的群众开枪射击，打死二人，打伤数十人，制造了“六一惨案”。六月四日各界群众举行六一死难者追悼大会，整个长沙燃起了反日爱国的熊熊烈火。罗荣桓以极大的愤慨参加了这次反日爱国运动。湖南军阀赵恒惕随即宣布戒严，准备镇压群众。罗荣桓被列入“不法学生”黑名单内，迫使他不得不回乡暂避。从长沙动身时，本来有日本戴生昌公司的小火轮开往衡山，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实行对日经济绝交，他宁肯不坐船，走了几天旱路回家。

一九二三年暑假，罗荣桓到北京。他和几个同学住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烂漫胡同的湖南会馆里，在补习学校里补习功课。

### 一九二四年(二十二岁)

罗荣桓在北京准备考学期间，读了很多书，并参加了一些政治文化活动。

一月，利用中国社会党名义的政客江亢虎，在北京大学大讲其把费边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孔子学说拚凑在一起的所谓“社会主义”。罗荣桓和同学一道去听了一次，罗荣



桓回来说：“莫名其妙，恐怕是吹牛皮！”以后再也不去听了。果然，没有多久，江亢虎就暴露了真面目，钻进故宫去朝拜溥仪，和封建余孽搞到了一起。

夏天，印度诗人泰戈尔到北京，大讲东方文明——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听了泰戈尔的演讲，罗荣桓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印度已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仅仅凭借“东方文明”是不能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

罗荣桓在北京期间，湖南政客易家樾，曾在湖南会馆开同乡会鼓吹“联省自治”，为赵恒惕歌功颂德。罗荣桓和大家一起揭露易家樾的骗局，并高喊口号要易滚出会场。易见势不妙，慌忙溜走。

暑假，罗荣桓考上了山东私立青岛大学工科预科。七月中旬离开北京去青岛入学。

### 一九二五年(二十三岁)

青岛大学靠近海滨，风景优美，气候宜人。但罗荣桓并不能安静地坐在书斋里读书，帝国主义的军舰在海湾里游弋，侵略者的魔影笼罩着美丽的青岛，经常扰乱着他的思想。他进行过“实业救国”的尝试，又勇敢地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

为了抵制洋货，罗荣桓和几个同学发起组织了“三民实业社”，吸收投资，每股五元，筹集了二三百元资金，生产了纱布、药棉、墨水、肥皂等日用品。但这种小手工业根本不能与洋货竞争，不到一年就停办了，股本也没有收回来。

在学校里，他参加了学生会反对校方强迫学生搞圣诞节的活动。

四月，青島日本紗廠的工人起來鬥爭，要求成立工會，增加工資。日本資本家被迫接受了部分條件，但又暗中勾結軍閥張宗昌拘禁工會工作人員。五月二十五日工人再次罷工抗議。二十九日，膠澳督辦溫樹德秉承日本人的意旨，調集軍隊三千多人，鎮壓罷工工人，打死八人，打傷數十人，製造了青島慘案。在我黨的領導下成立了“青島慘案後援會”（上海五卅慘案以後，改名為“青滬慘案後援會”）。青島大學在學生會組織下，於五月三十一日開始罷課。羅榮桓是學生會的負責人之一，他帶領同學參加遊行示威，散發傳單，慰問死難者的家屬，募集救濟金支援青滬兩地工人。學校成立了義演話劇團，他到各處勸銷戲票。他還受青島學聯的委託，去上海開展宣傳活動。在青島大學學習期間，羅榮桓和進步同學彭明晶、張沈川等經常在一起進行革命活動。七月初，反動當局解散了“青滬慘案後援會”，瘋狂抓人殺人。在一片白色恐怖中，羅榮桓由鐵路工會幫助化裝到高密縣的農村住了一個時期才返回學校。

### 一九二六年（二十四歲）

羅榮桓在青島大學讀書時，英文和自然科學成績較好。這時在他脑海里經常盤桓着一連串的問題：怎樣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怎樣擺脫帝國主義的瓜分，怎樣拯救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民，總之，中國的出路在哪裡？他在和同學談論人生觀問題時表示：“我也想當工程師，當建築師，但是現在看起來，首先要和惡勢力搏鬥，否則什麼事也做不成。”“我要隨時隨地和惡勢力搏鬥。”在談到對政黨問題的看法時，有的同學認為，任何政黨都是爭權奪利，假公濟

私，因此还是不参加政党好。罗荣桓则认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众人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了。如果能把以往政党不好的一面改正过来，在对付恶势力方面还是必要的。”

夏天，罗荣桓在青岛大学预科结业。他决定去当时的革命基地——广州去继续探索救国的真理。结业考试一结束，罗荣桓就和同学张沈川一同乘船经上海、厦门去广州。在上海，他们会见了当时我党江苏省委书记侯绍裘。八月，罗荣桓到广州后报考中山大学工学院，因第二外语德文没有考好，未被录取。

在广州，罗荣桓广泛阅读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十月革命的书，以及研究我国土地问题、开展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小册子。广州的革命形势和这些新的思想使他耳目一新，眼界大开，他兴奋地说：“好啊，这下可好了！”

这年七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报上不断传来北伐胜利和各地工农运动蓬勃兴起的消息。罗荣桓的思想也产生了新的飞跃。他对同学说：“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只有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才能打倒。”他决心投身于伟大的革命运动之中。

秋天，罗荣桓安排他的弟弟罗湘考取了黄埔军官学校，以后就回到家乡南湾，积极参加了当地的农民运动。

当时农民运动已在湖南全省广泛兴起，有五十多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偏僻的南湾也在积极酝酿之中。罗荣桓回到家乡，先到县城和我党负责人及县农民协会联系，听取指示。然后召集积极分子在鱼形山上开秘密会议，号召

大家团结起来，建立农会，开展斗争；解放自己。接着他又挨家访问宣传，动员农民参加农协。十一月(旧历十月)衡山梦字九区农民协会成立，他成为农会的领导人之一，在大会上宣传革命形势和农会成立的意义与任务。会后全体会员高举“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标语和旗帜，进行了游行。

罗荣桓还组织了南湾女界联合会和儿童团。他起草了章程，挨户动员，这两个组织成立时，他都出席大会并讲了话。他领导群众斗争了杀害儿童团员的反动地主罗凤梧，使地主豪绅威风扫地。南湾的农民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 一九二七年(二十五岁)

工农运动的兴起，引起地主豪绅阶级的仇视和反抗。二月，湖南国民党右派、地主“保产党”头子刘岳峙组织“左社”，在报上发表所谓《农运计划提案》，诬蔑农民协会是“地痞流氓”组织，主张农民和地主要“联络感情”，企图破坏农民运动。各地土豪劣绅闻风而起。南湾地主罗凤梧、肖罗仙等一面造谣中伤，骂罗荣桓是“罗痞子”，一面搜罗流氓地痞另立假农会与农会对抗。罗荣桓同志毫不畏惧，写了一篇檄文揭露他们的罪恶，号召贫苦农民坚持斗争。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在这期间各地反动势力已加紧活动。由于南湾比较偏僻，消息难通，谣言纷起。当时正好有在武汉读书的同学给罗荣桓来信，谈了国民政府由广州迁武汉后的革命形势，要他去



武汉。农会也要求他进一步了解全国形势，探求革命的道路。四月十四日(旧历三月十三日)在农友的护送下，他摆脱了地主豪绅的监视，离开衡山经长沙到武汉。

罗荣桓到武汉以后，一面在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读书，一面从事学生运动。他积极参加了支持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和声讨夏斗寅叛变、声讨许克祥叛变等的集会游行、街头讲演、化装宣传的活动。这时他在青岛大学的好友彭明晶也在武汉。由彭明晶介绍他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武昌中大支部组织干事，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继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七月十五日武汉汪精卫国民政府公开叛变。大批革命群众惨遭屠杀，一些不坚定的分子动摇逃跑，革命处于危急关头。罗荣桓坚定地迎接了考验，由湖北省委农民部派到通城县从事农民运动。

八月一日，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在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的领导下，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序幕。

八月七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暴动。

“八七”会议以后，湖北省委制定了关于秋收暴动的计划。根据这一计划，罗荣桓在通城组织了农民自卫军，在那里会合了由崇阳南下的农民自卫军后，打下通城县城，缴了反动民团的枪支，随即组成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王武扬担任总指挥，罗荣桓任党代表。部队在通城之麦市

遭敌袭击，受到损失。

九月初，罗荣桓等率领崇阳、通城农民武装一百余人到达江西省修水县，驻在桃树港。随即与因为没有赶上八一起义而转来修水的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合编，编为该团特务连。罗荣桓担任连党代表。连长是谭希林。

九月作为中央特派员的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毛泽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参加湘赣秋收暴动的武装编为一个师(约五千人)，共四个团。武昌警卫团为第一团。

九月九日，湘赣秋收暴动开始。一团从修水经渣津、马坳向平江进发，十日占领平江龙门厂。十一日计划消灭长寿街之敌，进攻平江县城。由于收编的邱国轩第四团叛变，一团腹背受敌，遭到较大损失，部队向浏阳方向转移。特务连连长谭希林调往一营，由朱建胜接任连长。罗荣桓改任团部参谋，仍随特务连行动，与朱建胜共同负责指挥特务连。

九月十九日，各路起义部队到达浏阳文家市。前敌委员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决定改变原来打长沙的计划，转向两省边界的农村进军。

九月二十九日，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这时起义部队已不足千人，前委决定将一个师整编为一个团——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一营、三营和一个特务连，共七个连。罗荣桓担任特务连党代表(连长曾士峨、副连长张宗逊)。整编以后留下来的人虽少，却经过了战斗和艰苦生活的考验。三湾改编以后，确定支部建在连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定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

还提出了改善官兵关系的要求和措施。罗荣桓后来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

十月三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离开三湾继续向南转移。当天到达宁冈古城。毛泽东在这里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决定争取团结井冈山王佐、袁文才的农民武装。还决定在连队搞好建党工作。罗荣桓出席了这次会议。

十月七日，工农革命军到达茅坪，部队分两路开展游击活动。毛泽东率三营、二营一连和特务连，沿湘赣边界南下，经过宁冈、砬市、酃县的十都、水口等地。途中，罗荣桓积极开展工作，在士兵中培养发展了一批新党员。毛泽东经常到特务连去，并曾亲自主持新党员的入党仪式。罗荣桓后来回忆说：党的基层组织建到连上，小组深入到班、排，这看起来是小事，但意义是伟大的；与群众直接联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荆竹山宣布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二十七日部队到达茨坪，完成了向井冈山的进军。

十一月中旬，我军打下茶陵县城，建立了井冈山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下山时，罗荣桓所在的特务连改为第四连。十二月下旬，敌吴尚的第八军进攻茶陵，我军撤回砬市。在砬市，毛泽东提出工农革命军应执行三大任务：一、打仗消灭敌人；二、打土豪筹款子；三、做群众工作。罗荣桓对此非常重视，认真贯彻执行。后来，他说：“这三者的结合，就是当时毛泽东同志革命战略思想的中心。”

## 一九二八年(二十六岁)

我军撤出茶陵以后，罗荣桓调到三营工作，先后担任九连、八连和营的党代表。当时在我军内部，旧军队的影响还相当严重，打骂和违犯纪律的现象比较多，建设革命军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罗荣桓从一开始就是毛泽东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的拥护者和积极的执行者。他历来就反对由旧军队遗留下来的军阀残余作风，强调通过教育，启发士兵自觉遵守纪律。有的干部打了人，他就耐心地教育，要他们懂得，用打骂代替管理教育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士兵有了错误，应该讲清道理，使他们明白怎么错了。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口服不如心服，只有心服了，才能做到自觉地遵守纪律。他处处以身作则，有事和大家商量，生活上毫不特殊，深受干部、战士的爱戴。他所领导的三营，是当时红军的模范营。

一月五日，我军攻占遂川县城。在这次战斗中，九连党代表罗荣桓和连长陈正春率领全连一举冲垮驻守大坑的肖家璧靖卫团二三百人，为部队前进扫清了道路。

我军占领遂川后，部队分散进行群众工作。罗荣桓在草林一带，领导九连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准确地进行了打土豪的工作。一次就从一个土豪那里缴来一千块大洋，还把一部分东西分给群众，既解决了部队的给养困难，又调动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他还十分重视维护群众利益，纠正违犯群众纪律的行为。这时，毛泽东总结了群众工作的经验，提出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



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进一步密切了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二月中旬，我军攻克宁冈新城，罗荣桓等领导全连参加了强攻南门的战斗。由于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的干扰，三月，部队被迫开往湘南，致使边界被敌占领一个多月，造成“三月失败”。四月，部队转至桂东沙田，毛泽东再一次正式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新城战斗之后，罗荣桓调八连任党代表。为了搞好连队工作，他十分重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那时因为经济困难，饭经常不够吃。每次开饭，他总是带着几个党员去站岗放哨，等大家吃完了才去吃。战斗中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他还抓紧一切空隙，进行政治教育，组织党员做思想工作，把全连同志紧密地团结在党支部周围。

四月底，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湖南农军在宁冈砦市会师。五月四日，两支部队合编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随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原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编为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团长张子清、党代表何挺颖），罗荣桓任三营党代表，伍中豪任营长。

五月二十日，在茅坪召开湘赣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做报告，回答了一部分人思想上存在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振奋了全军的斗志。从五月中旬起，我军先后在五斗江歼敌近一个团，在草市坳歼敌一个团。六月下旬又在龙源口歼敌一个团，打跨敌两个团，缴枪千余支，这是创建井冈山根据地以来的一次大胜利，群众传颂

说：“不费红军三分力，打垮江西两只羊（指敌前敌总指挥杨池生和前线指挥杨如轩）”，从此，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六月，湖南省委一些领导人搞盲动主义，要红四军向湘南发展。七月四日毛泽东主持召开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联席会议，决定仍旧坚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八月，湖南省委代表乘毛泽东不在，附和二十九团的乡土观念，致使该团和二十八团冒进湘南，造成“八月失败”。毛泽东带罗荣桓等领导的三十一团三营去湘南接回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已逃散）。当三营夜间通过桂东地区时，遭到敌人袭击，部队被冲散。第二天清晨集合只少一个担架兵。等部队回到井冈山，这个担架兵早已回来了，说明它是一支打不垮的坚强队伍。

七月二十二日，彭德怀等领导平江起义，组成红五军，十二月中旬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

从七月开始，湘赣两省敌人加紧了对井冈山根据地的“会剿”。

### 一九二九年（二十七岁）

一月四日，毛泽东在宁冈白露村主持召开前委、特委、军委和地方党组织联席会议。为了打破敌人的“会剿”，解决经济困难，会议决定留红五军和红四军的三十二团坚持井冈山斗争，红四军向赣南进军。一月十四日，红四军主力包括军部、二十八团、三十一团、特务营、独立营共三千六百余人从茨坪出发。途中发布了红四军司令部布告，阐明红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二月七日，红四军经千里转战进入瑞金县境。二月十日在大柏地伏击尾追之敌，歼敌八百余人，取得向赣南进军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接着我军进占宁都城，次日即到吉安县之东固，与当地之红军第二、第四独立团会师。

三月十一日，红四军进入福建。三月十四日首战长岭寨，三十一团担任主攻，歼敌三千余人，毙敌旅长郭凤鸣，攻占长汀县城。

三月二十日，前委在长汀开会，决定在赣南闽西边境地区分兵游击，发动群众。二十八团编为一纵队，特务营、独立营编为二纵队，三十一团编为三纵队。三纵队纵队长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罗荣桓任三纵队九支队（即原三十一团三营）党代表。八月，以闽西地方武装编为四纵队。

四、五月间，红四军在赣南瑞金、于都、宁都、兴国、广昌一带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赣南革命根据地。五月下旬，红四军再次入闽，建立以龙岩、上杭、永定、连城、长汀五县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

六月三日，我军攻打龙岩县城，守敌陈国辉仓惶逃跑，我军攻克龙岩县城。我军撤离后，陈国辉又重占该城。六月中旬，我军经激烈巷战再克龙岩，歼敌三千多人。

七月，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在龙岩城里一个中学召开。会上对于党的领导、政治工作等问题展开了争论。罗荣桓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选举新的前委，陈毅任书记。毛泽东离开了四军的领导岗位，到上杭蛟洋养病，同时指导闽西特委的工作。会后，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七月，二、三纵队奉命出击闽中。

九月中旬，红四军攻克上杭，歼敌卢新铭部二千余人。

九月下旬，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召开，当时罗荣桓主张请毛泽东回四军工作。会议没有取得结果。

十月中旬，前委接中央指示，乘广东军阀混战粤北空虚的机会向东江地区出击（四军接到指示时军阀混战已经结束）。红四军即开往东江，十月二十五日攻入梅县，因敌援兵来到，次日退出。十月三十日再次攻打梅县，这时城里已有敌一个师防守。罗荣桓率九支队打进北门，腰部负伤，谭政等把他抬下火线。当时部队缺医少药，走到寻邬才弄到碘酒纱布，到汀州（长汀）后才住进傅连璋的医院治疗。这次进军东江，红军受到较大的损失，各纵队都进行了缩编。

十一月下旬，陈毅由上海回来，带来中央的指示信。这封信是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写的。信中对四军的建设作了全面的指示，并要求四军的同志团结起来坚持斗争，决定毛泽东即回四军工作，仍任前委书记。二十六日毛泽东回到前委，二十八日前委在长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部队进行整训，准备召开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

十二月初，红四军一、二、三纵队开到连城新泉，进行整训。在毛泽东召集的多次座谈会上，罗荣桓提供了部队情况和政治工作经验。二十八日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镇召开，三十日闭幕，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是我党我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罗荣桓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为前委委员。前委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罗荣桓等“皆系作下层工作，以观念正确，斗争积极，经前委



介绍而当选”。

### 一九三〇年(二十八岁)

古田会议以后，罗荣桓调任二纵队政治委员（这时党代表都已改为政治委员），二纵队司令为曾士峨。他来到二纵队，首先组织了对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要求部队要充分发动群众，展开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检查本单位的工作，开展批评自我批评，以求得彻底纠正各种错误思想。他还建立了经常性的党的教育制度，按时上党课，加强党的建设和部队的思想建设。

一月，红四军离开古田地区，五日朱德率一、三、四纵队先行，七日毛泽东率二纵队跟进，开往赣南、闽西一带。采取“集中力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与“傍着发展”相结合的方针，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进入全面巩固和不断发展的新时期。到六月份，中央根据地基本形成。

二月六日至九日，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五军（彭德怀部）、六军（黄公略部）两军的军委联席会议在吉安陂头召开，决定成立四、五、六军共同前委，毛泽东脱离四军军委，专任前委工作。由潘星元（即彭清泉）任四军军委书记、四军政治委员。由于潘在红五军，始终未到职，由熊寿祺代理军委书记。四月初，熊赴沪出席全国苏区第一次代表会议后，四军政委、书记均空缺。

六月十一日，在上海的党中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

六月下旬，根据中央的决定，红军在长汀进行了扩编，

以红四军为骨干，与闽西地方武装发展起来的红十二军、赣南地方武装发展起来的红三军合编为红一军团。朱德任军团长、毛泽东任政治委员。长汀整编以后，红四军军长为林彪，政治委员由罗荣桓代理，但对外四军政委仍署名彭清泉。

罗荣桓到四军工作后十分重视部队的青年工作。当时部队刚开始设专职青年工作干部。他找军部青年委员肖华谈话，要求首先把各师、各团的团组织建立起来，调一部分青年党员作团的骨干，逐步健全团的组织生活。要组织团员和青年学习军事技术和党的政策，发动团员联系群众，起先锋模范作用。还要注意适应青年人的特点，开展多样化的文娱体育活动，把部队搞得朝气蓬勃，生动活泼。根据他的指示，四军的青年工作很快开展起来了。

六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红军第一军团向南昌进发，与红二、三各军团会师武汉，夺取湘鄂赣数省首先胜利。”一军团经兴国、吉水、永丰、新淦，进占樟树，七月三十日，一军团前锋到达南昌附近。

八月一日，我少数部队向南昌市北之牛行车站鸣枪示威，纪念南昌起义。然后部队转向万载、高安一带。此时毛泽东、朱德得知三军团曾一度攻克长沙，决定西进湖南，与三军团会师。

八月二十日，一军团袭击文家市，歼敌戴斗垣旅。八月二十三日，一、三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合，组成一方面军。正式任命罗荣桓为四军政委、四军军委书记。

八月三十日，红军包围长沙。九月十日，总指挥部发布再攻长沙的命令，四军为攻城部队，十二军为攻城预备队，

统归攻城司令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指挥。当晚八时发动总攻。由于敌人重兵防守未能攻下。九月十三日部队从长沙转移到株洲。后又继续东撤到江西宜春一带。

这时中央已开始纠正立三的盲动主义错误，但一方面军没有接到通知，部分同志仍主张打南昌。为了维护团结，毛泽东率部东进，并说服大家不打大城市，先打下吉安。十月四日，红军攻克吉安城。

十一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得知蒋介石准备发动第一次“围剿”的情况，前委在峡江县罗坊召开会议，毛泽东说服了一些同志，决定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计划，诱敌深入，向根据地中心大踏步后撤。罗荣桓在会上拥护毛泽东的主张。十二月红一方面军渡过赣江，到达江西宁都一带。

十一月中旬，敌军十万人从吉安、吉水、永丰、宜黄一线向根据地中心地区大举进攻。我军诱敌深入，向根据地作“求心退却”，十二月一日抵小布、黄陂、安福圩荫蔽集结。十二月二十九日，敌十八师企图合击红军于小布、黄陂，我军以三、十二军为左路，以四军及三军团为右路包围敌人。按照统一部署，罗荣桓与林彪指挥四军向龙冈西北斜插过去，切断敌师部和后备旅的联系，与红三军的阵线联结起来，使敌人陷入重围。三十日我军全歼敌十八师，活捉师长张辉瓒，接着追击逃敌，又歼敌五十师一半，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结束。

十一、十二月，一方面军各部队普遍开展肃清“AB团”的活动，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许多无辜同志被抓被杀。罗荣桓注意实事求是，掌握政策，在他的职权范围内释放了许多被捕的同志。红十二师根据他的指示，一次就放了

三十多人。当时部队中就流传着“罗政委刀下留情”的故事。但罗荣桓也因此被某些人批评为“肃反不力”。

### 一九三一年(二十九岁)

一月，中央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占了统治地位。

二月，蒋介石派何应钦以二十万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办法对中央根据地进行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敌以宁都为目标向我进攻，我军主力由边沿区移至广昌、石城、瑞金、古龙岗地域做反“围剿”的准备。各军都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并同驻地群众一起开了誓师大会。这时已经成立了以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四月中旬在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分析了形势，认为有把握粉碎敌人的“围剿”，各军军长、政委，个个信心十足，慷慨激昂，一致主张坚决的打，抵制了一些人提出的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建立新根据地的错误主张。

五月十六日至五月三十日，红军一、三军团由江西富田打起，一直打到福建建宁，横扫七百里，连打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支，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在这次战役中，红四军参加了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四次重要战斗，罗荣桓都亲到前线指挥。

六月下旬，红军各部遵照前委决定，分别到指定地区开展工作。红四军留第十二师监视南丰之敌，主力以归化、清流、连城为工作区域，以其东的沙县、永安为筹款区域。罗荣桓领导四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做了大量的工作，发动了群众，扩大了根据地，筹集了经费和给养，并利用



间隙进行了军事训练。

七月一日，蒋介石发出第三次“围剿”命令。三十万敌军长驱直入向中央根据地进攻。我军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避其主力，打其虚弱，主力经安远、宁化、长汀、瑞金绕道千里回到兴国地区集中。

八月六日至十一日，我军在运动中寻找战机，于莲塘、良村、黄陂三战三胜，缴枪万余，随即转到君埠地区休整。敌发现我主力，集中来攻，我主力巧妙地跳出包围圈再到兴国集中，等敌发觉，我已休息半月，敌则饥疲沮丧开始退却。九月七日我军向退却之敌追击。红三军在老营盘歼敌一个旅，红四军和三军团在高兴圩因敌兵力占优势，打成对峙，双方伤亡都很大，十一师师长曾士峨牺牲。随后红三军又在方石岭歼敌五十二师等部，九月十五日敌军溃逃，我四军、三军和三军团分路出击，至此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在这次反“围剿”中，四军曾缴获敌人大批枪支，部队转移时，只留了少数人收集管理。敌人又来了，只好把枪支掩埋丢弃。苏区中央局的代表严厉地批评了这件事。罗荣桓作了深刻的检讨，主动承担了责任。随后，罗荣桓被免除四军军委书记职务。

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激起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开始发生变化，给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时机。

三次反“围剿”以后，红军的任务一方面是整理、补充、训练部队，筹措给养以加强和扩大红军；一方面发动群众，恢复与建立党、团及政权组织，巩固与发展革命根据地。完成这些任务，首先要打掉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根据

统一部署，红四军位于瑞金北石城南部地区，尔后推进到石城北部地区开展工作。经过全军的共同努力，到年底前后，拔除土围子几百处，使中央根据地扩展到二十五个县的地域，还动员了大批群众参加红军和地方武装。

十二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被蒋介石派到江西进攻红军。该军万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等领导下，于江西宁都举行起义，加入红军，编为第五军团。

### 一九三二年(三十岁)

一月，中央发布《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其后又发布一系列指示，提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要求在江西攻取南昌、赣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根据这一要求，一方面军围攻三面环水严密设防的“铜赣州”，苦战月余，攻城不下，伤亡很大。二、三月间毛泽东赶赴赣州前线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由赣州撤兵。

三月中旬，组成一军团新的指挥机构，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三月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一军团和五军团组成红军东路军，打到外线去开辟新的地区，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以一军团指挥机关兼代东路军指挥机关。

四月初，红军东路军离开赣南向福建进军。四月十日在龙岩考塘歼灭军阀张贞的一个主力团，收复被敌人占领的闽西重镇龙岩城。四月十三日红军直逼张贞的老窠——漳州。红一军团主力从保林上游抢渡九龙江支流，插向风霜岭和十二岭，四月二十日占领漳州。这一战役俘敌一千

六百余人，缴枪二千三百余支，还有两架飞机。这次胜利对于恢复闽西根据地起了重大作用。打开漳州以后，罗荣桓积极组织部队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建设。

六月，漳州战役之后，东路军向广东进军，在南雄的水口一带打了一些仗。由于受“左”倾盲动主义的干扰，强调正规化，打大仗，部队伤亡较大。六月上旬红军又回师赣南。

罗荣桓很重视以多种形式开展生动活泼的政治思想工作。红一军团宣传队在他的领导下，工作非常活跃。在军内外广泛宣传党的政策，揭露国民党的罪恶，启发群众觉悟；在部队组织开展唱歌、演戏、讲故事等等有益的文娱活动，官兵同乐，罗荣桓等领导同志都曾登台演戏。

十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对于毛泽东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并要求向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进行了错误的批评。会后调毛泽东做政府工作，接着又撤销了他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随后罗荣桓等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也都受到排挤。

### 一九三三年(三十一岁)

一九三三年初，党的临时中央由上海转入中央苏区。

一月，红一军团在黎川三都整编，撤销三军、四军军部。军团直辖七、九、十、十一师。

二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使用兵力约五十万人。二月十七日敌军五十二、五十九两师进至宜黄以南黄陂圩、登仙桥附近。红军一、三、五军团在周

恩来。朱德指挥下，采取大兵团伏击的战法，全歼这两个师。三月二十一日我军又集中兵力歼灭进犯之敌十一师大部和九师一部，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三月十日，四次反“围剿”过程中，一军团政治部以主任罗荣桓、副主任李卓然的名义发出《官家僚<sup>①</sup>以后政治工作指示》，全面总结了反“围剿”中的政治工作。要求在宣传鼓动工作中执行不间断的原则，实行工作的准确性，发动党团员进行宣传鼓动，树立粉碎敌人“围剿”的信心。

四次反“围剿”以后，罗荣桓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排挤。有一段时间，他身体不好，经常打摆子，不能下部队。有的人就批评他“不抓工作，官僚主义”。五、六月间，罗荣桓被调离一军团到江西军区任政治部主任，不久，又被调到总政治部任巡视员、动员部长。

罗荣桓在总政治部工作期间，对人民武装建设做出了很大成绩。当时我们的武装力量除红军以外，还有少先队（民兵）、模范少先队（基干民兵）和赤卫军（地方武装）。罗荣桓十分重视抓好模范少先队这一重要环节。这样做既有利于配合赤卫军就地坚持武装斗争，又可以通过支援配合红军作战的锻炼，为扩大他们参加红军准备条件。

六月六日，苏区中央局发出《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七月二十九日，当时任中华苏维埃主席的毛泽东发表《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指出，为着争取全部粉碎敌人新的“围剿”，首先应该保障红军数量的继续增加。为了完成扩大红军的任务，罗荣桓兼任了总政治部扩红突击队总队长，

---

① 地名，在江西省南丰县西北。



他带领扩红工作人员深入到乐安、宜黄一带农村，挨家挨户做动员宣传工作。他强调在工作中要讲清武装保卫苏维埃，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果实的道理，提高政治觉悟，反对强迫命令；还要注意协同地方做好优待军属的工作。这样就很快形成了父母送儿、妻子送郎当红军的群众运动。

八月二日，罗荣桓在《红星报》上发表《瑞京兴国第一批野营的检查》，指出，组织赤卫军少先队进行野营训练，军事政治教育都有极大收获，对于军营生活的学习更有显著成绩，发动了赤少队员的热情与积极性。为了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他提出各级党组织要加强领导，避免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把动员搞好野营和战争动员密切联系起来。

九月，蒋介石开始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实行堡垒政策。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一开始就采取了冒险主义的方针，搞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几次派部队进攻敌人巩固的阵地没有取胜，使我军辗转于敌人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十一月，福建事变发生，十九路军宣布抗日反蒋，蒋介石不得不抽调部分兵力去打十九路军，对我采取守势。“左”倾机会主义者不乘机转入外线作战，援助福建部队，打破敌人“围剿”，反而采取了保守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方针，无所作为，丧失了大好时机。

### 一九三四年(三十二岁)

一月五日，中央作出《关于扩大红军突击月总结的决定》，给予罗荣桓领导的总政治部扩红突击队和另外几个先

进单位以“扩大红军的模范”奖旗。并决定把罗荣桓等的名字登在各报纸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光荣“红版”上，广泛宣传他们的经验，以教育全党同志。一月十日，《红色中华》发表了表扬罗荣桓、罗迈、毛泽覃等的“红版”。

一月二十一日，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罗荣桓由于扩红工作的优异成绩，在大会上受到表扬，并获得一枚银牌。大会选举罗荣桓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三月二十五日，罗荣桓在《红星报》上发表《赤少队突击运动的初步检查》，指出，要完成扩大人民武装的突击运动，最根本的是做好艰苦深入的宣传鼓动工作，克服那种强迫命令、抄写名册与会议举手通过的做法。

六月，敌人分六路向根据地进攻。“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依然是采取单纯防御的方针，用“六路分兵”、“分兵把口”、“短促突击”的办法对付敌人的进攻。不但未能阻止敌人进攻，反而使我军受到很大的伤亡和消耗。

九月二十一日，红八军团在江西兴国县崇贤镇组成，辖二十一、二十三两个师，约七千人，其中二十三师是根本未打过仗的新部队。罗荣桓任八军团政治部主任（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甦）。

十月，由于“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坚持单纯防御的错误军事方针，经过一年之久，没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最后仓促决定放弃中央根据地，中央红军和地方干部八万余人离开江西苏区，开始长征。

十二月，红军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到达贵州黎平。八军团在行军作战中减员很大，全军团只剩一千多人。十八

日军委指示撤销八军团建制，部队并入五军团，罗荣桓被任命为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未到职)。以后，罗荣桓曾短时间到三军团代理政治部主任，随即调到总政治部任巡视员。

### 一九三五年(三十三岁)

一月，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在军事上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领导。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我军四渡赤水，佯攻贵阳，直逼昆明，甩开了追击的敌人，改变了被动局面。五月渡过金沙江，通过彝民区，强渡大渡河。六月翻越夹金山，六月十六日到达四川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师。在这一段长征途中，罗荣桓和上干团一起行动，天天行军，不管环境多么艰苦，他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和乐观的精神。

六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为了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迎接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红军必须战胜一切困难继续北上。而张国焘却反对这一决定，主张向川康边境退却。

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为了加强部队工作，调罗荣桓回一军团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朱瑞)。在继续长征的途中，他负责筹粮和群众工作，具体布置检查，强调要遵守群众纪律和民族政策。

七月，红军到达毛儿盖，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了北上抗日的方针，反对南下逃跑及各种右倾机

会主义的动摇。

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布《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

八月，根据毛儿盖会议精神，红军分兵两路北上。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和军委纵队等为右路军。一军团为前卫，聂荣臻等率军团直属队为前梯队，罗荣桓等率其他部队为后梯队。

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红军穿过茫茫草地，到达巴西、阿坝地区。张国焘公开进行分裂活动，甚至企图危害党中央。叶剑英及时把这一情况报告中央，中央决定脱离危险地区，迅速北上。并将一方面军一、三军团、中央纵队、干部团合组为陕甘支队。张国焘则强迫一部分红军南下，向西康方向退却，并非法另立伪中央。在此期间，罗荣桓随保卫中央的四师十团行动，九月十日左右到俄界后返回一军团政治部。

十月，党中央率领一方面军主力战胜千难万险，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三军团与一军团合编。

十二月，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十二月六日，一军团移至延长县南临其镇休整。

### 一九三六年（三十四岁）

一月，我党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重申党的抗日主张。随后，军委决定红军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地区，准备实现对日作战。

二月十日，一军团政治部以主任朱瑞、副主任罗荣桓



的名义发出《关于目前政治工作的指示》，要求部队加强政治动员与训练教育工作，明确东征的意义，完成军委规定的巩固与扩大陕甘苏区，发动及组织一切抗日力量，补充与扩大红军的战略任务。

二月下旬，一军团按照军委指示东渡黄河。罗荣桓率政治部部分人员先头渡河，布置部队开进中的政治工作。

三月初，一军团在中阳县以南之关上村战斗中，消灭了进攻红军的阎锡山部队一个旅。罗荣桓随即在汾河流域一带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筹款、扩大红军。

红军的东征抗日行动遭到蒋介石和阎锡山的敌视与阻拦。他们派遣大军挡住红军的道路，并命令东北军和西北军进攻陕北革命根据地。为了保持抗日实力和表示合作抗日的诚意，党中央于五月五日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东征回师的通电，并将我军部队撤回河西。

五月十四日，一方面军在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除了总结东征以外，会议还强调要顾全大局，反对本位主义；提高党性，反对自由主义。

六月，罗荣桓调红军大学学习，并任一科（主要收师以上干部）政治委员。他一面参加学习，一面抓思想工作。他教育大家要认清革命发展的新形势，说明为了完成新的任务，只凭老的经验是不够的，还需要认真学习革命理论，掌握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理解和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和同志们一起，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取得了很好的学习成绩。

六月，由于全党的反对，张国焘取消了他的伪中央。七月，二、四方面军由甘孜北上。十月，一、二、四方面

军在甘肃省的会宁地区胜利会师。

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迫接受抗日主张。

### 一九三七年(三十五岁)

一月，罗荣桓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同时，他还到红军大学第二期（后改为抗大第一期）讲授中国近代革命史和参加政治工作教材的编写。

五月，罗荣桓与林月琴在延安结婚。

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北平芦沟桥。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抵抗日寇侵略。

七月十日，中央军委主席团任命罗荣桓为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八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扩大会议，确定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并通过了实行我党全面抗战路线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同日，军委发布命令，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九月十一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原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陕南红军第七十四师合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后逃走）、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十月二十二日中央决定恢复我军的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聂荣臻为一一五师政治委员，罗荣桓为政治部主任）。一一五师下辖三四三旅、三四四旅及独立团，全师共一万五千余人。一一五师于陕西省三原县云阳镇实行改编。

八月二十九日，中央决定八路军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一一五师军政委员会由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周昆、肖华组成。

红军改编后，罗荣桓深入部队，进行统一战线的思想工作。同时教育大家，继续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军委的命令，为实现党的路线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

九月，一一五师从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开赴晋东北抗日前线。根据毛泽东关于“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的指示精神，罗荣桓率师政治部、骑兵营、教导大队和六八六团第六连，经龙泉关，抵达晋冀交界处阜平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九月二十五日，一一五师在山西繁峙县平型关伏击日军坂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歼敌一千余人，取得了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胜利，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振奋了全国人心。

平型关战役以后，一一五师主力南下。

十月，一一五师骑兵营解放曲阳县城。罗荣桓派师政治部统战部长潘振武到曲阳做群众工作并担任县长，建立了我党在这一地区的第一个县政权。接着我军又乘胜东进，收复了唐县，并一度攻进平汉线上的定县城。在战斗间隙，根据罗荣桓的指示，部队以班为单位分散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到十月下旬，以阜平为中心周围各县人民武装已发展到四千多人。

十一月，晋察冀军区在阜平成立，中央决定聂荣臻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率一一五师政治部等南下

与三四三旅会合，一一五师独立团、骑兵营、随营学校留在晋察冀军区。三四四旅由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先在晋北地区进行了多次胜利战斗，以后配合一二九师开辟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又进入冀鲁豫及苏皖地区。

十二月二十七日，日军侵占济南，山东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

十二月，我党山东省委（黎玉任书记）领导山东人民先后在各地区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组成了许多以八路军命名或其他名义的人民抗日武装。

### 一九三八年（三十六岁）

年初，罗荣桓率师政治部到达晋西南赵城同一一五师司令部与三四三旅会合。

三月一日，一一五师师长林彪被阎锡山部队误伤返回延安。一一五师的全面领导工作即由罗荣桓负责，以后他任一一五师政治委员。三四三旅旅长陈光为代理师长。

三月至九月，罗荣桓和陈光指挥三四三旅在晋西蒲县至大宁、汾阳至离石的公路上，多次打击进攻晋西南、威胁陕甘宁边区的日军，取得了重大胜利，巩固了晋西根据地，保卫了陕甘宁边区。

四月，罗荣桓与陈光率师部及三四三旅到达晋西汾阳、孝义一带，组织部队分散发动群众，开辟吕梁山根据地。

五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原山东省委扩大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郭洪涛任书记。

七月七日，一一五师师部在孝义县的碾头，举行纪念



抗日一周年大会。罗荣桓在会上讲解了毛泽东五月发表的《论持久战》，号召大家认真学习，不断争取新的胜利。

八月，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兼三四三旅政治委员肖华奉命率三四三旅机关部分人员和少数部队东进冀鲁边区，罗荣桓给他布置了任务。九月该部进入冀鲁边区山东乐陵一带与当地我党领导的人民起义武装汇合，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开辟和扩大了冀鲁边平原根据地。

九月二十九日，扩大的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决定在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有斗争有团结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党的主要任务是在战区和敌后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扩大抗日根据地。罗荣桓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汇报了抗战以来一一五师的工作情况和经验。

十一月二十五日，为发展山东并准备向豫皖苏地区发展，中央军委、毛泽东致电十八集团军总部，决定一一五师师部率三四三旅两个团（六八五、六八六）去山东新老黄河之间地区。

一一五师六八五团于十二月进入微山湖以西地区与当地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起义武装（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汇合，组成苏鲁豫支队（下辖一、二、三、四、七大队），开辟与扩大了湖西平原根据地，并向苏皖地区发展。

十二月二十日，罗荣桓与陈光率一一五师领导机关和六八六团从晋西向山东进军。途经晋东南屯留、长子一带十八集团军总部（以下简称集总）驻地。朱德总司令等领

领导人会见了罗荣桓，朱德总司令向一一五师的干部作了形势任务报告。然后一一五师以“东进支队”名义继续向山东进发。

十二月二十七日，根据中央的决定，我党领导的山东各地区抗日起义武装组成八路军山东纵队，共有两万四千余人。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

### 一九三九年(三十七岁)

三月二日，罗荣桓率东进支队从濮城、鄄城一带进入鲁西鄆城地区。

三月四、五日，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在杨勇等指挥下全歼驻鄆城西北樊坝的伪军一个团，俘敌团长以下五百七十余人，并打退了增援的日军。这是一一五师入鲁后的第一个胜仗。扩大了我军影响，开辟了鄄城、鄆城、汶上一带的运河西部地区。

三月，一一五师令六八六团三营、团直一部与师直两个连，留运河以西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部队。主力继续东进过运河，于泰（山）西地区，与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会师。

三月，一一五师召开高干会议，罗荣桓传达了中央六中全会决议关于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等问题。十二日，他在师直和六八六团排以上干部会上作报告，提出东进支队当前总的任务是创造泰山西端的抗日根据地，依山（泰山）伴湖（东平湖）向外发展。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帮助发展一切抗日的地方武装；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加强党在农村及下层的基础；广泛地开展群众工作。

三月底，罗荣桓由泰西在大汶口过津浦路到达分局（沂水县王庄）传达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议。这时传来了顽固派秦启荣指使部队在淄川以东太和镇残杀我过路干部战士多人，制造“太和惨案”的消息。罗荣桓指出，这一事件进一步证明党的六中全会制定的方针非常及时、非常英明，对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决不能迁就让步。他提出在政治上必须彻底揭露敌人的罪行，在军事上应当立即集中兵力，打击顽固派。四月二十日，我军向太和镇顽军发起反击。随后山东各区也都开展了反击顽固派的斗争。

四月，于学忠率东北军五十七、五十一军进入鲁南，建立了苏鲁战区司令部，于学忠为司令长官。

四月二十六日，罗荣桓回到泰西地区后，在肥城县古城为党政军各方面的干部作报告，传达了党的六中全会精神，分析了全国及山东的形势，指出我军应很好地巩固与东北军及同盟者之团结。把现有防地巩固起来，对付敌人之进攻。

五月五日，罗荣桓在一一五师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指出创造泰西根据地的两个根本问题：一、武装问题，要有计划地发展和扩大，提高质量，坚强党的领导。二、政权问题，争取泰西地区行政上的初步统一，改善民生，开放民主，动员更多的人力财力帮助军队。

五月，一一五师留运河以西的部队扩编为一个团和游击第七支队，后于七月七日合编两部为一一五师独立旅，杨勇任旅长，下辖两个团。山纵六支队两个连和收编的一部分旧军队，扩编为第八支队。

五月，敌军五千余人分九路“扫荡”泰西。十一月将一一

五师师部及部分部队包围于肥城以南陆房地区。我军在陈光指挥下(罗荣桓未在师部)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歼敌联队长以下一千三百余人,并于当晚突出包围。由于我军也受了一些损失,丢了一些东西,部队思想波动并有埋怨情绪。罗荣桓回来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他向大家讲,部队作战是英勇的,丢点东西等于是敌人替我们搞了一次轻装,更有利于机动地打击敌人。他的讲话鼓舞了斗志,增强了团结。

五月十九日,中央书记处指示:山东应准备长期磨擦,不要幻想让步可以解决问题。对顽固分子之无理举动,以态度强硬为原则。

五月,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除留四大队坚持湖西斗争外,支队部率主力南下苏皖豫边开辟和扩大根据地,与肖县我地方武装会师。其第一大队继续东进至宿县、灵璧、泗县地区。

五月,一一五师直属队一部及七团,分批由泰西进入新蒙费泗边一带。九月间进入抱犊崮山区。

六月,徐向前、朱瑞到达鲁中地区。徐向前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根据中央和集总决定:一纵队统一指挥山东及苏北我军。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已改为山东分局,朱瑞任书记。

六月,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和后方留守处人员归建。

六月,中央军委总政指示主力兵团应派干部帮助整理巩固新部队。山东纵队由一一五师设法帮助。一一五师在鲁西、泰西及以后进入的鲁南等地区,都抽调了一批干部,参加地方党政工作,帮助山东纵队的建设。



七月三十一日，山东分局向中央、北方局建议：山东成立军政委员会，以朱瑞、徐向前、郭洪涛、罗荣桓、陈光、黎玉为委员，朱瑞兼书记。八月九日，北方局批准这一建议，并指示军政委员会为统一地区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机关。

八月二日，罗荣桓和陈光指挥师直两个连及独立旅一个营在梁山地区歼灭日寇田中少佐以下三百余人。俘日军十三人，缴炮三门。此次胜利的战斗，进一步树立了我军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胜利信心，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随后罗荣桓率师直部分人员在东平湖中的小岛上隐蔽指挥反“扫荡”战斗。

九月集总指示一一五师：肥城山区甚小，我主力应转移泗(水)费(县)、临(沂)地区。据此，一一五师师部、随营学校、六八六团及特务团，于九月至十月分别东越津浦路，进入鲁南。一一五师政治部曾召开费县工作总结会议，讨论创造鲁南根据地问题。

十月，一一五师一部进入郟城、马头地区，攻克李家围子等伪军据点，十一月解放了重镇马头。并一度攻克郟城。此役开辟了陇海铁路北侧的郟马平原根据地。

十月四日，山东分局指示：在泰西地区的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和活动于鲁南地区的苏鲁支队（原为鲁南人民抗日起义武装组建的“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归一一五师建制。

十月二十七日，罗荣桓在临沂上大炉师直属队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任务的报告，全面地分析了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形势，指出当前总的方针是贯彻中

央提出的三大口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巩固与扩大现有阵地，充实自己的力量，坚持模范的游击战争。

十一月，罗荣桓与郭洪涛等星夜赶往湖西地区，处理“肃托”错误事件（以后，郭洪涛赴延安）。八月间，驻湖西地区的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政委王凤鸣和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等人大搞逼供信，以“托匪”罪名逮捕了大批干部，杀害了不少同志。罗荣桓闻讯赶来，及时制止了乱杀乱捕的现象，释放了被捕的干部，稳定了局势，巩固了部队。

十二月，罗荣桓回到鲁南，二十六日，在一一五师干部会上做报告，提出创造以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根据地。在这次报告中还阐述了湖西“肃托”的教训。

### 一九四〇年（三十八岁）

一月六日，罗荣桓在大炉干部联席会议上作关于建设抱犊崮山区根据地的动员报告。他指出，鲁南山地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及建立后方，创造八路军的山区根据地；能配合广大平原游击战争，成为苏鲁游击战争的依托。他还指出，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对具体的对象，取具体的方针和办法，不能失掉自己的立场。

一月二十三日，罗荣桓致电一一五师各部队，指出，由于敌人采取诱降政策，投降已成为目前主要危险，我们应集中一切力量，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活动，争取时局好转。为此要提高党内的认识并组织群众开展反投降运动。

一月二十八日，中央书记处给北方局、山东分局、一一五师等发出“集中一切力量为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而斗争”的电报。指出：“要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在今年一年内，山东分局与一一五师至少应发展武装部队（包括游击队）到十五万人枪（一一五师应分配干部与兵力到山东全境去）。”

二月五日，罗荣桓与第十八集团军山东部队诸将领为申讨汪精卫向全国发出通电。

二月七日，根据罗荣桓的意见，一一五师对抱犊崮山区的统战工作问题作了指示：各部队要利用地主阶级内部武装割据之矛盾进行分化工作。不要纠缠于上层统战关系上，而阻碍群众工作的开展与深入。对东北军要密切上层联络，加强对中下级军官及士兵的争取工作，打击其政训处之反动活动。毛泽东对一一五师采取的方针表示同意，并指示：我们的政策分两方面，对反共派、顽固派取坚决反抗，彻底消灭的政策；对一切尚有希望之人，取极力争取的政策。根据这一正确的方针，我军在抱犊崮山区，团结了万春圃及孔昭同等地方抗日武装，打击了申宪五的反动部队。消灭了勾结敌人的杜若唐、孙鹤龄的汉奸武装，争取与于学忠的东北军保持了友好关系。

二月十四日，一一五师在歼灭汉奸孙鹤龄以后，解放鲁南山区中心要地、费滕公路上的白彦。以后又反复与敌争夺，杀伤了大量敌人。

四月五日，罗荣桓针对东北军一些高级军官在地方反动势力诱惑及国民党政训处的包围下转向反动的情况，提出要从具体事件中揭露顽固派破坏抗战，制造磨擦的罪行，

教育争取中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同时动员群众拥护民主政权，从群众方面影响东北军。

四月十四日，敌伪军八千余人“扫荡”鲁南抱犊崮山区。罗荣桓在干部会上指出，尽管敌人增加兵力，周密计划，但他内部还有许多空隙和缺陷。我军应把主力运动到敌人后方去活动，发展广泛的普遍的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的交通联络，以最高度的胜利信心来坚持斗争。在罗荣桓的指挥下，我军经大小战斗三十二次，历时二十天，歼敌千余人。到五月上旬，敌人的“扫荡”被我们彻底粉碎。

四月二十一日，罗荣桓在师政治工作会议上作总结报告，对一一五师入鲁以来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对目前任务提出：一、克服时局逆转，坚持抗战，发展进步力量，坚持统一战线；二、准备长期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创造巩固根据地，这是一切工作的指导原则；三、深入阶级、民族的教育，从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准备自己；四、争取大量发展巩固自己，完成再扩大一倍的任务。

六月，徐向前离山东去延安。

六月五日，一一五师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并成立一一五师文艺习作会，聘请罗荣桓为名誉理事。

六月二十三日，中央军委总政任命肖华为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不再兼任。

七月，活动于晋西的一一五师晋西支队到达鲁西，九月抵鲁南。晋西支队司令员陈士榘任一一五师参谋长。

七月二十六日，山东省国大代表复选大会，山东省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大会，山东省参议会成立大会，山东省工、农、青、妇、文化界代表大会，山东各界救国联合总会成



立大会的联合大会在沂蒙区青驼寺开幕。

八月一日，“联合大会”经民主选举产生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这是山东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机关。黎玉任首席代表。

八月八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纵队、一一五师驻地应靠拢，一一五师主要领导同志应参加山东分局，为委员，以实现山东军事的统一领导。

八月，华北我军进行百团大战。一一五师和山东我军开展了一次破袭战。

九月二十二日，东北军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与日寇鸢津师团订立反共投降密约。该军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武装解决了军部，缪澂流逃脱。常恩多发出抗日锄奸通电。

九、十月，一一五师开辟了鲁南天保山区根据地，该区为滋临公路以南的重要山区。

九月——十月，一一五师在鲁南天保山区桃峪（费县西北）召开支队及旅级干部会议。罗荣桓总结了对敌对顽斗争，开辟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经验，并提出了“插、争、挤、打、统、反”等六个字的方针。会议又提出“建设铁的模范党军”的号召。模范党军的条件是：一、认真明确地了解党的政策；二、普遍深入地建立和群众血肉相联的关系；三、坚持高度的政治团结，无比的阶级友爱；四、发扬灵活、机动、果敢、坚决的优良传统；五、坚持严肃、紧张、精细的工作作风。坚定、忠诚、不屈不挠的革命立场。朱瑞参加了这次会议。

九月下旬，山东纵队所属部队进行整编。整编后山东纵队下辖五个旅（其中第四旅为一九四一年编成），四个支队，

约五万人。分布于鲁中、滨海、清河、胶东等区。

十月十四日，罗荣桓向中央军委报告一一五师入鲁以来的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开辟了根据地，坚持了斗争，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已发展到近七万人。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使我在发展上取得顺利的条件。报告中还指出存在的弱点是：“一直到现在没有巩固的一点”，各种工作中还存在一些缺点。今后要为建设模范党军而斗争，使革命形势不断发展。

十月十七日，中央军委电称：“一一五师有极大的成绩，你们的总路线是正确的。”

十月，一一五师各部队共编成六个教导旅，这些部队分布于苏鲁豫皖、鲁南、滨海、鲁西、湖西、冀鲁边等地（教一旅和教五旅于一九三九年、一九四〇年先后南下华中）。以后又将活动在冀鲁豫地区的部队编为教七旅。

十月二十五日，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决定在沂河以西、蒙山以南地区成立鲁南军区。

十月二十八日，罗荣桓向各旅政委、政治部主任发出指示，要求建设模范党军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特别是要发挥党支部坚固的堡垒作用。指示中提出了建设模范党支部的条件：一、保证战斗任务和整军任务的完成；二、要作遵守群众纪律、爱护根据地的模范；三、要作遵守军风纪及努力学习的模范；四、消灭一切非战斗减员；五、坚持经常工作制度。

十一月十四日，罗荣桓在山东艺术工作者联欢大会上作了题为《克服投降危机》的演讲，指出，目前形势的主要危险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直接投降。我们的任务就是反投

降反内战，准备力量粉碎反共的进攻与敌人扫荡的配合，坚持独立自主的民族解放战争。他还派师政治部的部长分别到就近的几个旅，传达“克服投降危机”的指示和布置工作。

十一月十九日，罗荣桓等一一五师首长致电各部队，指出为了更好地坚持斗争，必须认真审慎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要积极主动，不轻举妄动，加强争取中间分子与援助进步者的组织，孤立与分化顽固势力，求得集中全力反对亲日投降派挑拨分裂与制造内战。同时要加速我军的建设，充实和扩大我军力量。

山东分局在一九四〇年九月间，帮助在根据地内的国民党进步人士组织的“国民抗敌协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简称抗协），还帮助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国民抗敌自卫军。罗荣桓认为使“抗协”成为政党性的组织，并建立独立的武装是不妥当的。十一月，他指示部队，对于“抗协”务使其领导权完全掌握在进步分子手里，对于“抗协”的武装要帮助掌握；发现有不可靠或有野心的分子时，另行处理；在无法改造的情况下，则由八路军接收整顿。

### 一九四一年(三十九岁)

一月五日，罗荣桓和肖华在一九四一年政治工作计划中提出：在新的一年里坚持游击战争的环境将会有剧烈的变化，敌人的“扫荡”与投降派的进攻将更加紧张，战斗会更加艰苦、更加频繁。因此，政治工作总的方针是全面地巩固和发展部队，创造铁的党军，坚持自己的阵地，充分准备自己的力量，保证战争的胜利，以达到争取时局好转

的目的。

一月六日，发生皖南事变，一一五师师部发出支援新四军的动员令。二月一日，罗荣桓等一一五师全体将领致电党中央，就皖南事变问题表示坚决拥护中央主张，克服投降内战危机。十六日，又致电于学忠，说明皖南事变经过，争取团结抗战胜利。

一月，军委指示，山东纵队应靠近一一五师师部及分局，以便于统一指挥和能更多得到一一五师的帮助。

二月，一一五师指挥机关，由费县北部聂家庄一带，移至临沂以北青驼寺附近，与山纵靠拢。

二月二十日，中央发出《关于山东湖西区锄奸错误的决定》。

同日，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一一五师及山东纵队分别成立军政委员会，山东成立总的军政委员会，以统一山东军政领导。

三月，一一五师为了开辟扩大滨海地区，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南移至滨海区临沭县寨子村一带。

三月十日，军委批准以陈光、罗荣桓、肖华、陈士榘、梁必业组成一一五师军政委员会。

三月二十一日，为了打击敌人推行的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一一五师指挥教二旅和山东纵队二旅一部在苏北赣榆城东南进行了青口战役。经四天战斗，攻克青口外围八个敌伪据点，并一度攻入青口镇，歼敌伪千余人，扩大了山东滨海区及与华中苏北区的联系。在这次战役中，出现了“十八勇士”的壮烈事迹。

四月二十四日，罗荣桓在一一五师司令部部务会上作



报告，对于第一期整军工作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第二期整军的中心工作。并对全盘工作的组织与领导提出了要求。他指出：在工作中应根据总的方针与具体的条件计划工作，确实而不夸大。各部门工作要互相配合，局部要服从全盘，全盘也要照顾局部的特殊性。党的政治工作要与全部行政组织工作结合起来。每一个行政干部，不是以简单的行政手段去进行自己的工作，而应更关心党的政治工作的贯彻，忠实于党的总方针。

四月二十八日，罗荣桓出席山东全省文教财经大会并致词。

五月十六日，山东省粮食委员会组成，朱瑞任主任委员、罗荣桓等任副主任委员。会议作出加强粮食工作，做好夏季公粮征收工作的决定。

五月下旬开始，罗荣桓在抗大一分校讲授《联共党史》。

七月一日，山东分局、一一五师联合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庆祝大会。罗荣桓出席并作报告。

七月，敌人推行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一一五师指示部队，有计划地拔除我基本区之敌伪据点，普遍开展对敌政治攻势。

八月一日，一一五师在滨海区临沭县之蛟龙汪举行“八一军政大检阅”，并开了运动会，推动了部队整军热潮，加强了部队的军政建设。罗荣桓在会上作了报告。

八月二十二日，一一五师在蛟龙汪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总结抗战四年来的政治工作，罗荣桓在会上作了报告。

八月，中央书记处指示：我军在山东力量近八万人，

而作战指挥至今尚未统一。决定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师部及山东纵队指挥部靠近，以分局会议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山东分局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组成，朱瑞为书记。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配合作战。组织新的山东军政委员会，罗荣桓、黎玉、陈光、肖华、陈士榘、罗舜初、江华七人为委员，罗荣桓为书记。

根据中央指示，山东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作出关于一一五师与山东纵队建立统一指挥的决定。决定将两个指挥机关靠拢。十月二日，一一五师师直由滨海区移至沂蒙区之青驼寺一带与山东纵队领导机关靠拢。

九月，罗荣桓派一一五师“战士剧社”和篮球队到新四军慰问。他们在新四军各部队活动了五个多月，受到热情的欢迎。

十月七日，山东分局、军政委员会发出紧急动员反“扫荡”指示。

十一月，敌人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日寇驻华总司令畑俊六，带领日伪军五万余人，向山东根据地中心沂蒙山区进攻。一一五师师部和山东分局、战工会等机关在特务营的掩护下向北移动。十一月四日行至沂水以南之留田村时，遭到敌人四面合击。罗荣桓断定敌人集中兵力向我中心区合围，后方必定空虚。他果断地率领部队向敌人的大本营临沂方向突围，然后折向西去。我军安全地突出了包围圈。敌人扑空后，在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一一五师师直机关人员经鲁南山区转移到滨海区。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罗荣桓与朱瑞、陈光率师直一部又回到沂蒙山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打击和消灭敌人，保卫群

众的利益。十一月二十九日，山东分局机关及师直一部在费县以北的大青山受敌合击，损失较大，战工会秘书长陈明及国际友人希伯等牺牲。

十二月二十四日，罗荣桓率骑兵排由沂蒙到滨海区临沭县的朱仓与一一五师师直机关汇合，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报告沂蒙反“扫荡”经验和精兵简政等问题。

十二月二十六日，敌三千余人由临沂向滨海区“扫荡”。罗荣桓指挥师直机关和教导队与敌周旋。敌人扑空后，缩回临沂。至此，我山东军民经过五十多天的艰苦斗争，终于粉碎了敌人对山东最大的一次“扫荡”。

从一九四一年起，罗荣桓就患了严重的肾脏病，经常便血。他考虑到斗争的需要，一直带病坚持工作。

### 一九四二年(四十岁)

一月二十日，军委指示：(一)山纵所属部队统划为地方军。山纵改为山东军区。胶东、鲁中、鲁南均成立军区。鲁南编一个主力旅归一一五师建制。(二)一一五师统一指挥全山东部队(包括军区)。

一、二月，师直机关在朱仓进行精兵简政，精简机关非战斗人员，充实连队，以适应敌后斗争形势的要求。

二月，中央开始开展整顿三风运动。

三月十五日，一一五师在莒县以南石板村召开连队政治工作会议(山纵部队派代表参加)。罗荣桓在会上作报告，对连队政治工作的职责、作风和方法等问题作了系统的指示。他指出，连队政治工作人员的任务，主要是以政治工作的手段，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政治工作必须通过艰苦

耐心地说服教育与发扬较多的民主，启发战士的自觉；连队政治教育要实事求是，应有充实的现实内容，切忌抽象的东西。这次会议还组织到会政工干部进行了军事技术训练，提高他们的军事技术水平和指挥作战的本领。

三月三十日，日本侵略军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进一步实施其军事打击、政治欺骗、经济破坏、文化麻醉、特务统治等相结合的所谓“总力战”。

四月二十日，罗荣桓等一一五师首长指示各部队把精兵简政作为巩固抗日根据地刻不容缓之急务。并指出，精兵并不是简单地紧缩编制，主要的是在于提高部队的战斗质量。

四月，刘少奇由苏北来到山东。在这之前，罗荣桓曾把自己对山东工作的意见报告中央，并建议中央派人来帮助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刘少奇在山东分局所在地滨海区临沭县的诸繁村召开了分局与山东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并分别同山东领导人谈话交换意见。重点研究了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和正确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的问题。

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山东分局作出了《抗战四年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决议，肯定了山东斗争的成绩，批评了缺点错误。指出，山东党的领导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明确坚定的独立自主领导山东抗战的战略方针，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因而在一些政策策略问题上出现右的错误。总结还批判了在“湖西事件”之后，山东锄奸工作中继续发生的“肃托”扩大化错误。四年总结还提出了今后斗争的总方针：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动员起来，团结全党全民，咬紧牙关，继续坚持长期抗战，紧紧掌握时机，



正确运用政策，随时准备迎接国内外之伟大事变，争取最后胜利。七月间，刘少奇离山东赴延安。

五月十二日，一一五师指示各部队，动员全军配合地方，普遍组织农会，领导好减租减息，以引起群众参加武装保卫夏收的战斗热忱，扩大民兵动员。这是我军不可战胜的基本源泉。

五月，一一五师召开连队军事工作会议，统一了山东我军连队各种工作制度、规则、战术思想和操场动作。

六月十八日，根据罗荣桓的提议，山东军区决定将国民党山东抗敌协会所组织的“山东抗敌自卫军”由山东军区指挥，统一领导，不再以友军看待。以后这些部队分别编入各地方武装。

六月二十日，一一五师政治部发出《关于整风的指示》，指出，整风首先应从各级指挥机关干部检查做起。要防止工农与知识分子、老干部与新干部互相之间产生隔阂和误解。各级主要干部要订出阅读整风文件的计划。

七月七日，罗荣桓为《血战敌后的一一五师》一书作序。号召以我军的英勇战绩教育部队和群众。

八月一日，罗荣桓在分局党刊《斗争生活》第十六期上发表《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指出，要坚持边沿游击区，使其成为我们外围的扩张线、活动的跳板，以打破敌人紧缩政策，建设起通向敌占区或越过严密封锁线之潜渡桥梁。

八月，罗荣桓在一一五师政治部出版的《战士月刊》上发表《准备打破敌人紧缩包围封锁我们根据地》，指出，我们要组织一切力量，发挥对敌斗争的创造性，增强外围游

击区的工作，向着敌人占领区内部去活动，把敌的紧缩包围圈拉开一些口子，破坏敌人的纵深与面的控制，而且使我可以有条件地打击敌之虚弱部分。这是我们当前对敌斗争的方针。

八月三日，东北军一一一师二千余人在师长常恩多、东北军政务处长郭维城的率领下，脱离东北军，进入我区。罗荣桓建议山东分局紧急行动起来，妥善处理并从各方面支持这次事变，又派了一些干部去做这支部队的工作。起义后，这支部队仍用一一一师的番号。由于常恩多师长已病故，由万毅任师长，郭维城任副师长。到一九四四年该师编为我军滨海支队。

八月十四——十八日，东北军一一一师起义后，反动分子孙焕彩部（仍称一一一师）抢占了该师原驻地莒县东南部的甲子山区。我军支援一一一师进行了第一次甲子山讨叛战役，收复甲子山区。

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

九月，日寇推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我军发动新的“扫荡”。罗荣桓向中央报告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治安运动”与“新国民运动”的意见，指出敌人必然失败，我们要揭露敌人的欺骗宣传和阴谋，加强游击活动，粉碎敌人“扫荡”。中央向各根据地转发了罗荣桓的这个报告。

十月八日——十四日，第二次甲子山讨叛战役。孙焕彩部向甲子山区进攻，我军予以反击。十四日传闻日寇将“扫荡”滨海地区，讨叛战役暂停，甲子山区被叛军占领。

十月十七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将一一五师实行精兵简

政的经验通报各战略区，要求参照办理。在紧张的对敌斗争中，一一五师直属队精兵简政取得很大成绩，共精简人员百分之三十七。其中一部分老干部送学校受训，大部分加强军区地方武装，对老弱残疾的同志协同地方政府作了妥善安置。

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上旬，敌伪一万五千余人，“扫荡”鲁中沂蒙地区，在沂水的南墙峪、对崮峪、大崮、马鞍山等地，对我山东军区机关及鲁中部队进行了六次“拉网合围”。十一月二日山东军区机关及战工会在对崮峪遭敌袭击，战工会秘书长李竹如等牺牲。

十一月十二日，敌万余人“扫荡”胶东。

十一月，罗荣桓在《战士月刊》发表《克服在执行游击战争中认识上的一些偏差》，指出，在敌人后方，我们还是游击战，不能过早地转为正规战。强调正规以至拒绝执行分散地方化的任务是错误的。文中还要求各部队，切实扶持地方民兵工作，充分发挥民兵自然的分散性、地方性，打击敌人的奔袭“清剿”活动，粉碎其“拉网战术”。

罗荣桓根据多次反扫荡的战斗经验和“敌进我进”的原则，提出“翻边战术”，即将主力配置在边沿地区，敌人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人那里去。掌握有利时机，开展边沿区的斗争，打击敌人的“扫荡”、“蚕食”活动。十一月上旬，敌人为了割断我山东根据地和华中根据地的联系，极力蚕食我滨海区赣榆、东海县一带的马陵山地区（称为海陵区）。我教二旅根据罗荣桓的指示，乘日寇“扫荡”沂蒙山区的机会，在该区六天内攻克敌伪据点十六处，粉碎了敌人对海陵区的蚕食。

十二月五日，教五旅奉命由华中区转来滨海区，参加第三次甲子山战役。

十二月十七日，罗荣桓主持会议研究第三次甲子山讨叛战役的部署，并亲至前线参加指挥。这次战斗共歼叛军孙焕彩部二千余人，收复甲子山区。

十二月十五日，罗荣桓在一一五师后勤生产节约大会上作总结报告，指出：在未来的一九四三年，要渡过更困难的一段艰苦路程，更多地节省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山东全军争取生产节约一千万元。同时要严格进行反贪污的斗争。

《战士月刊》发表罗荣桓写的《一九四二年的政治工作总结与一九四三年的政治工作任务》，要求坚定部队对分散游击战的信心与决心，进一步加强连队政治工作，巩固党支部堡垒作用，展开对敌政治攻势。

### 一九四三年（四十一岁）

一月二十日，滨海我军攻克郯城。

一月，在莒县小坊前召开全师政治工作会议，罗荣桓总结了一九四二年的工作，布置了一九四三年的任务。

二月二十三日，罗荣桓在荣誉军人代表大会上做报告，号召荣誉军人继续保持坚强的特性，有一分力量发挥一分作用，积极参加工作，遵守政府法令，尊重群众风俗习惯，做一个模范公民。并建议政府给每个在乡的荣誉军人发放免利贷款，开展合股生产。

三月十二日，中央军委决定，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为一一五师政治委员、代师长（陈光回



延安)；黎玉为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山东军区(包括津浦路以东〔含南阳湖、独山湖、昭阳湖、微山湖以东地区〕，陇海路以北地区)，下辖鲁中、滨海、鲁南、冀鲁边、清河、胶东等六个军区。以下共划分为二十个军分区。

三月十三日，罗荣桓在山东军政工作会议上，作《分散性游击战争与对敌政治攻势问题》的报告，指出，分散性的游击战争就是更加依靠群众，对付敌之全面压缩。分散性游击战争本身就是以政治攻势为主去组织各种不同的斗争。

三月，根据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精神，山东地区实行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军队与地方干部互相兼职，使各级党委成为各地区党政军民工作的最高统一领导机关；同时还实行主力地方化，成立了新的山东军区。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各旅、支队的番号一律撤销，山东军区各战略区共保留十二个主力团，其它军队分编为地方武装。一一五师除教二旅、教五旅外，其它各旅分别在其它抗日根据地整编，不再归一一五师建制。在进行这一工作中，罗荣桓从山东的实际和斗争需要出发，坚持了精简机关，充实部队，保留骨干的原则。因此经过精兵简政，不仅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了，而且为以后的大发展做了组织上的准备。这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

三月，山东各部队普遍掀起了开荒生产的热潮。罗荣桓也和战士们一起参加开荒、开盐田，给大家很大鼓舞。

四月三日，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整风的同时进行一次审查干部的运动。罗荣桓从实际出发，认为在敌后开展整风审干运动，主要是搞好学习

和思想教育，保证内部的团结稳定。

四月二十二日，敌伪二万余人“扫荡”清河区。

四月，罗荣桓因操劳过度，肾病严重发作。他应陈毅之邀，到新四军驻地，请国际友人、奥地利医生泌尿系专家罗生特治病。罗生特是由上海来新四军的。由于缺少必要的医疗设备，罗荣桓的肾脏病未能完全查明原因。以后他就返回山东坚持工作，有时不能骑马，就坐在担架上指挥作战。

四月二十四日，山东军区向部队发出保卫夏收与反蚕食战役的命令。提出保卫夏收应成为党政军民的中心任务之一。要求各地区在夏收前十日内，将主力与地方武装部署向敌区活动。民兵在不脱离生产原则下使劳力与武力结合起来，打击敌人抢麦行动。在战术上要以灵活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采取荫蔽的行动，切勿把目标暴露给敌人。

五月，抗大一分校改为山东军区教导团以训练干部。

五月，山东分局在朱瑞主持下，召开了扩大会议，作出了山东抗战五年来的工作总结。

六月四日，清河区为保卫麦收，展开反“扫荡”。

六月，蒋介石同意东北军于学忠部离鲁，又命令李仙洲部由皖北阜阳开进山东，实行反共。六月二十一日，罗荣桓致电军委和集总，提出：干部西开，我军可给予便利，并相机解决干部原驻地沂山附近某些地区的土著顽固派，求得恢复沂山部分阵地。如李部北上反共则拟以蒙山地区与之求战，力求歼灭其一部。七月四日，罗荣桓等又致电军委和集总，提出“对于部西开不加箝制，并在一定条件下给予便利，对李部东进北上，尽量迟滞其时间，并

在自卫原则下，乘其伸入我根据地立脚未稳之际，予以歼灭一部之打击”。七月十五日，中央复电同意这一方针，并指示：“对友好者坚决团结之，对顽固而暂时尚未向我进攻者则设法中立之，对向我进攻者则坚决反击之。”之后，罗荣桓曾亲自起草电报给各军区，指出：东北军是中间势力，与我有西安事变前后之友好历史，我对于学忠部应取团结态度，决不能轻启衅端，即使顽固分子从中挑拨，我们也应加以忍让为要。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我军挫败了蒋介石派遣中央系部队入鲁反共的企图。于学忠未等李仙洲接防，即按时西越津浦路离开山东，于部驻地遂为我军接收。李部于冀鲁豫和鲁南地区受阻后撤回皖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也随之撤离山东。从此山东已无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大大改善了山东三角斗争的形势。

六月三十日，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邢仁甫指派其亲信暗杀了副司令员黄骅等人。邢随即叛变投敌。

七月八日，罗荣桓、黎玉就黄骅被刺事件发布训令，要求全体指战员充分认识敌特对我破坏的严重性，提高政治警觉，克服麻痹现象，加强部队的亲密团结，不予敌特奸细以任何离间挑拨活动机会。加强保卫工作，不让一个来历不清或政治面目不清的人留在机关内。对已收编的土匪部队应进行政治上艰苦的改造工作。

七月二十三日，罗荣桓和黎玉联名在《大众日报》发表《我们能坚持，我们也能胜利》，分析了山东敌我形势，指出尽管敌人的疯狂进攻增加了我们的困难，但这是“黎明前的黑暗”，“胜利前的困难”；我们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和群众在一起，一定胜利。

七月二十四日，罗荣桓等发布训令，要求各地加强小部队建设，更好地开展分散性、群众性游击战争。训令指出，在敌人稠密点线封锁沟墙的分割之下，敌后形势更加犬牙交错，敌人“扫荡”也愈益频繁残酷。要坚持斗争取得胜利就必须及时改变组织形式与灵活地应用斗争方式。

七月二十六日，山东军区直属队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声讨日军“第五纵队”与内战挑拨分子的罪行及讨论如何制止内战问题。罗荣桓在会上讲话指出：要坚决保卫山东抗日根据地，援助陕甘宁边区，打击内战挑拨分子，肃清“第五纵队”，坚持团结，抗战到底。

八月一日，山东万余军民召开盛大的八一检阅大会。罗荣桓出席讲话，他从历史上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意义和共产党、八路军起的伟大作用。号召全体指战员继续发扬八路军光荣的斗争传统，进一步提高政治与技术，更勇敢地担当起抗战和制止内战的光荣任务。

八月三日，罗荣桓在《大众日报》发表《纪念我军建军十六周年要认识“八一”的历史教训》，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必须是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上，而且必须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独立的领导与武装斗争的胜利基础上。只有这样才会有联合战线的坚持，才不致受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裂倒退反革命的危害和破坏。这正是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前身红军所继承的历史教训。

八月，中央调朱瑞去延安，罗荣桓继任山东分局书记。

八月，罗荣桓在山东锄奸工作会议上做报告，要求锄奸干部要展开整风学习，反对主观主义作风，彻底肃清神



秘化观点。

九月，罗荣桓号召山东全军努力生产节约，发扬高度的友爱精神支援晋东南抗日军民，以便合力渡过难关，坚持到抗战最后胜利。他带头定出个人节约计划，在一九四四年内预计节约棉衣一件、夏衣两套、衬衣一套、棉鞋一双、手巾两条，并且不领取保健费和茶叶、纸烟、火柴等。

九月十日，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改为战时行政委员会。

九月十六日，鲁中地区召开干部会议，罗荣桓在会上动员部队克服太平观点，紧急备战，准备粉碎敌人新的“扫荡”。十月九日，罗荣桓、黎玉、肖华联名发布《山东军区反“扫荡”紧急动员令》。十月十五日，山东军区向各战略区发出反“扫荡”部署指示，全山东进入了紧急备战状态。

十一月，敌人开始向鲁中“扫荡”，我主力部队转向敌人侧后，使敌人扑空。为配合鲁中军区反“扫荡”，鲁南军区于十一月十五日消灭了当地危害群众、破坏抗战的惯匪刘桂堂部，击毙了刘桂堂，为山东人民除掉一个大祸害。在这次反“扫荡”中，坚守蒙阴县南北岱崮的鲁中军区二分区十一团八连，以极少的代价，取得毙伤敌三百余人的胜利。十二月，罗荣桓等发布嘉奖令，授予八连“岱崮连”的光荣称号。

十一月十八日，“扫荡”鲁中之敌万余，急转清河区，兵力增至二万六千人。经过二十天的艰苦斗争，我清河区军民粉碎了敌之冬季轮回大“扫荡”。

十一月二十日，为配合清河区反“扫荡”，滨海区我军

攻克赣榆城，全歼伪军李亚藩部二千余人。滨海军区政委符竹庭在这次战役中不幸牺牲。

## 一九四四年（四十二岁）

一月，山东军区颁发《关于一九四四年军事教育工作的几项规定》，要求加强各级人员对分散性游击战争的思想教育。山东分局发出《关于加强人民武装政治工作的指示》，纠正各地党支部忽视掌握民兵的倾向。

二月，山东各地深入发动群众，减租减息以后，掀起了参军参战热潮。一九四四年拥军月（旧历正月）中，有万余青年参军。山东我军还开展了广泛的拥政爱民运动。

一月十一日，山东军区决定，清河军区与冀鲁边军区合并为渤海军区。合并后的渤海军区下辖六个军分区。

一月二十二日，山东军区和山东省行政委员会发布训令：为减轻人民负担，克服敌后物质困难，各地、各部队要进一步普遍开展生产节约运动。

二、三月，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召开部队政治工作会议，总结工作，进行整风。罗荣桓抱病参加，并向到会同志作了斗争形势与任务的报告，要求各部队认真贯彻军委总政的指示，切实加强政治工作建设。

三月，在罗荣桓的领导下，我军利用日寇在太平洋作战失利，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开始收缩兵力，实行“重点主义”配备，兵力大批外调的形势，开始了山东战场的攻势作战。三月底，在春季攻势中，我军一举歼灭伪军吴化文部七千余人，拔除了日寇插在我鲁中抗日根据地中间的尖刀，控制了鲁山地区，打通了沂、鲁、泰、蒙各山区的联

系，改善了鲁中抗日根据地的形势。

四月十四日，罗荣桓发布命令嘉奖讨吴部队，并号召再接再厉，扩大成果，以保卫人民、保卫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

四月十九日，罗荣桓发布训令，要求山东各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应即着手培育大批战斗英雄，发挥勇猛顽强迅速灵活的战术与不怕死的白刃搏斗精神。

五月十一日，山东军区卫生工作人员开会纪念国际护士节。罗荣桓出席讲话。他说，卫生战线上取得的成绩，医生护士各占一半，没有护理工作就不会有这些成绩。今后要进一步面向伤病员，面向战士，把卫生工作做好。十九日、二十日他又到了几个医院慰问伤病员并对改进医院工作做了指示。

五月，我军展开夏季攻势，鲁南军区歼灭伪军荣子恒部的一个师，全部解放了费县南部崮口山区，改变了鲁南区被敌人分割的形势。鲁中军区攻下了沂水城，解放了沂水县全境，巩固了鲁山山区。滨海我军打击了伪军李永平部，开辟了诸(城)、胶(县)、高(密)地区与诸、日(照)公路以东地区，改变了滨北形势，巩固与发展了我滨海与胶东两区的联系。渤海军区攻取了联系清河与冀鲁边的枢纽利津城，扩大了渤海根据地的基本地区。

六月十五日，罗荣桓在《斗争生活》上发表《紧紧掌握对敌斗争，巩固成绩，反对自满》，指出对敌斗争与对顽斗争虽不可分，但是一定要很好地区别，后者应服从前者。否则我们就要陷于两面夹攻之中。我军自一九四二年下半年以后，掌握了民族矛盾，强调了对敌斗争，展开了政治

攻势，因而取得了自主权。但决不能自满，要继续争取胜利。

六月，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整训部队的指示，要求各区在一年内加紧整训现有部队，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准备将来大发展的条件。

七月一日，罗荣桓在山东军区直属机关干部会上作纪念建党二十三周年的报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报告科学地评价、热情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思想，在民族化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是历史条件所产生的。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来自群众中，再到群众中去”，掌握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与中国革命走上胜利的途径和继续前进不可分离的。学习毛泽东思想要与整风结合，把它作为斗争的武器。

七月七日，罗荣桓在《大众日报》上发表《纪念“七七”》一文。

七月二十日至十月，山东军区召开军事工作会议，总结对敌斗争的经验，确定今后的军事方针，统一作战指导思想。罗荣桓作了总结讲话。关于作战方针，他指出由于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还没有根本改变，因此仍要坚持以分散游击战为基本方针。但在目前条件下，由于我之回旋地区扩大，求得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机会增多了，所以我们的运动战，应是发挥我之特长的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还提出了整训部队的问题，要求全面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加强连队建设，密切军政和官兵关系，大量培养和正确使用干部。这次会议对于山东我军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八月二日，山东军区第一次战斗英雄大会开幕。罗荣桓在会上讲话，阐明我们提倡的新英雄主义是集体的革命英雄主义，是为群众服务的，始终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他号召部队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戒骄戒躁，继续努力，加紧整训，提高政治思想和战术技术水平。

八月十二日，罗荣桓、黎玉答复毛泽东七月二十八日向各战略区电问的十个问题（一、整风时事教育；二、执行十大政策的经验；三、拥政爱民、拥军优抗；四、整训部队；五、民兵工作；六、沦陷区与接敌区工作；七、城市工作；八、人民负担；九、部队生产；十、群众工作）。后来毛泽东复电：“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

八月十九日，敌伪军万余人由临沂、莒县、日照、赣榆等地出动，分十三路“扫荡”我滨海区，企图合击我山东军区指挥机关。我军区指挥机关和滨海区主力部队适时转入外线。在反“扫荡”作战中，我军紧紧抓住敌之弱点，内外线密切配合，积极打击敌人，于三十日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八月，为粉碎敌伪万余人对滨海地区的“扫荡”，山东军区发出《对秋季反“扫荡”的指示》。指示称：“扫荡”与反“扫荡”仍会继续，但不可能再出现一九四二年以前那种情况，我军应更积极地作战，保护根据地，准备反攻条件。

八月十九日，胶东军区发起大规模秋季战役。至二十四日，我连克平度大泽山周围之敌伪据点，恢复了我胶东区战略支点大泽山区；八月三十日解放文登县城；九月三日荣城伪军六百余人反正，我解放该城；九月八日至二十

三日，我军向烟（台）青（岛）路出击，拔除与迫使敌伪放弃据点数十处，控制了烟青公路近一百公里。此役共歼敌伪五千余人，使我胶东四个分区完全连成一片。

八月二十四日，渤海区主力部队发动了以解放霑（化）利（津）滨（县）边区为主的全区性秋季攻势，控制了徒骇河，解放了乐陵和霑化县除县城外的全境，打通和扩大了各分区的联系，变分散坚持的小块游击区为大块根据地。

九月三日，鲁南我军发起秋季攻势，先后于泗（水）北、滕（县）东、郯（马）北地区连续作战，粉碎了敌人封锁沂河的阴谋，扩大了各分区的联系。

同日，我鲁中军区主力在沂水城北之葛庄、陶沟地区伏击“扫荡”滨海回窜之日伪军，歼灭日军草野清大队三百余人、伪军一千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

九月十八日，罗荣桓等山东军区首长发布加速反攻准备的紧急动员令，要求立即在全军和居民中进行深入的战备思想动员，把准备反扫荡与准备反攻结合起来。开展政治攻势，做好战斗、生产与保卫物资等工作。

秋天，罗荣桓根据山东分局《四年工作总结》的精神，作了《山东对敌对顽斗争总结》的报告，提出了今后对敌对顽作战的指导思想和任务。

十月十二日，山东军区发出《今冬明春军事斗争方针的指示》，十一月二日又作了补充指示。要求趁山东一部分敌人南调之际，尽量消灭伸入我根据地内之敌伪据点，但一般不打较大城市。对叛军应首先消灭其最大股最反动部分，扫除反攻障碍。

十一月，山东分局和军区政治部发出冬季政治攻势指示，要求开展大股伪军的工作。在这以前，曾经争取渤海地区一股伪军王道部队起义，编为山东军区独立一旅。

十一月十四日，我滨海、鲁中部队发起莒城战役，争取了伪军莫正民部三千余人反正。十九日，罗荣桓致电嘉奖慰问，并命令将该部队编为山东军区独立第二旅。至二十九日，莒县全部解放。至此，滨海、鲁中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二十一日，鲁中我军肃清了临沂、费县两城外围据点。鲁南我军向临（沂）滋（阳）公路展开攻势，控制了泗水、费县段，使鲁中、鲁南根据地也连成了一片。

一九四四年冬，中央派人到山东传达延安整风经验，主张采用“抢救运动”的一套做法。罗荣桓认为在敌后紧张的分散的战斗环境下，这样搞要出问题。他决定先在卫生部和文化部门试点。在试点过程中出现了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个别人谩骂领导，有的人又认为这些人是坏人，要把他们抓起来。罗荣桓为了教育群众，统一认识，在山东分局办公厅民主检查会上作了《关于民主检查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除了对领导工作做了全面检查总结以外，还着重讲了什么是党内需要的民主、什么是我们需要的自由思想，批判了那种从个人出发对人不对事的错误态度和小资产阶级思想。

罗荣桓还在山东卫生会议上作了《卫生干部要加紧整风》的报告，指出，医务工作若把技术与政治、行政分离，就会发展自由主义，就会产生单纯技术观点。我们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并不是反对技术工作，不是反对个人技术的提高，而是为了自觉地服务于革命事业来使用技术，使个人

技术能够得到更大的发展。

十二月二十一日，罗荣桓作了审干工作的指示。他认为审干必须在整风的基础上进行，才能掌握好中央的九条方针；如果没有经过好好的整风，打下必要的基础，审干必然变为少数领导者的事情，或形成一种突击的倾向，很容易走入轻易发动坦白，变相的严重逼供信的歧途。为此，要求各级领导认真领会中央的指示，虚心检查，正确引导，并区别对待军队、地方，新区、老区，中心区、边沿区等不同情况。

根据试点的经验，罗荣桓请示中央同意，在敌后环境下，不宜搞“抢救”及“民主运动”这样的政治运动，从而避免了混乱。

山东分局党校分期分批地抽调高级领导干部到校进行整风。各区党委党校都举办了整风班，抽调了中下级干部到校整风。

在罗荣桓的正确领导下，山东地区的整风审干工作贯彻了正确的路线政策，取得了很大成绩，广大干部普遍受到教育，增强了团结，提高了党性。

### 一九四五年(四十三岁)

一月三日，罗荣桓在山东分局、军区直属队干部会上，作《一九四四年的过去和一九四五年的到来》的报告，总结了一九四四年的胜利，要求在一九四五年继续扩大解放区，组织发展生产，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开展大练兵，全面贯彻党中央对解放区的各项号召。

一月，罗荣桓等军区领导人发布通令嘉奖模范武工队



及队员，号召创造更多的、更全面的模范武工队。在对敌斗争中，罗荣桓一直十分重视敌后武工队的活动，强调要发挥这些小分队的战斗作用。各地区长期以来普遍建立的武工队（包括著名的铁道游击队）分散在铁路沿线与边沿地区，成为打击敌人的“怀中利剑，袖中匕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一月十七日，山东军区发出《关于一九四五年山东我军作战主要方向的指示》，确定以开辟胶济路东段两侧广大地区为主要方向，使我胶东、渤海、鲁中、滨海各区扩大联系。为了贯彻这一意图，在罗荣桓指挥和领导下，山东我军发起春季攻势。二月，鲁南军区全歼伪和平救国军第十军，击毙伪军长荣子恒，解放泗水城，更进一步逼近津浦路，给敌人的“重点主义”以严重打击。胶东军区歼灭顽军赵保原部一万二千余人。清除了胶东军民准备反攻的重大障碍。三月，鲁中军区解放蒙阴县城，歼灭日军一个中队、伪军十二个中队，使我沂蒙区与鲁南区联系更加扩大。

一月二十日，山东军区直属队召开汇报会，检查与推动拥政爱民工作。罗荣桓参加并作了指示。他强调要搞好思想教育，使同志们自觉地把生产和减少开支作为最实际的拥政爱民活动。

二月十五日，山东分局和军区发出《关于武工队组织领导的决定》，要求建设经过训练，善于执行军事、政治等各方面任务的武工队，以深入敌后，袭击敌伪，组织人民，配合解放区正面战线之作战。决定提出武工队建设的三点要求：一、要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每一个队员都能进

行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工作。二、准确地执行党的各种政策，运用策略。三、军事上要灵活机警，大胆勇敢，神出鬼没，飘忽不定，成为一种袖中利剑，使汉奸寒心，敌特丧胆。三月六日，中央将这个决定批转各地照办。

二月二十一日至三月四日，山东军区召开各独立旅（起义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罗荣桓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各旅不论成立时间先后，均有进步，部队中开始了新生命的生长。已经一改过去与群众对立的关系而开始与群众相联系。今后还应努力加强思想教育，使部队人员不仅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而且知道中国今后将向何处去。他还强调政治工作是我们革命军队的生命线，要搞好军政工作的关系。各旅之间也要互相团结，互相学习，互相鼓励进步。

四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罗荣桓因工作关系没有出席。这次大会选举罗荣桓为中央委员会委员，黎玉和万毅为候补委员。

在罗荣桓同志主持下，山东军区制定五、六、七三个月作战计划，重点是发展胶济路东段两侧地区和临沂、费县方向。正当我军准备发起攻势之际，敌人突然增兵山东。“雅尔塔”协定后，传说美军要在山东登陆，敌人便在山东东南沿海加紧侦察活动，建立防御体系，同时陆续增兵。敌人新增加的兵力，加上原驻山东及徐州、沧县一带的兵力共约十万人。

五月一日，敌以三万人的兵力，以鲁中、滨海地区为重点，进行全区性的大“扫荡”。我军当即转入反“扫荡”。我主力和基干团，依靠广阔的根据地，保持相当的集中，实施广泛的机动；寻找有利战机，给进犯之敌以有力反

击；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特别是民兵的地雷战；把反“扫荡”的外线作战与扩大解放区的任务密切结合起来。经过二十余天的奋战，终于粉碎了敌人的“扫荡”。罗荣桓准确地分析了敌人这次“扫荡”的性质是防御性的，国内外的形势已发生了更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急剧变化。因而，在对原定三个月的作战计划稍加调整后，即果断地下达了作战命令，各军区便相继发起了攻势。渤海军区讨伐顽军张景月部，歼敌二千七百余。鲁南讨伐顽军张里元部，歼敌二千余人。鲁中讨伐伪军厉文礼部，歼敌六千余人。滨海军区讨伐伪军张步云部，歼敌四千余人。胶东军区讨伐投降派王豫民，控制了胶河两岸，扩大了胶东与渤海地区的联系。此外其他各区还进行了一些讨伐伪顽军的重要战役。经过我军的夏季攻势，山东的伪军和顽军或被歼灭，或受到严重打击。解放区的面积扩大了二万余平方公里，使山东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五大战略区分别在胶济路南北联成一片，为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月八日，罗荣桓发表了《学习〈论联合政府〉是实现党的任务的首要任务》一文，指出，山东人民抗战是有很大成绩的，但不是尽善尽美的，我们还有薄弱环节需要补救，必须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实现党的三大作风，才能更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六月三日，山东分局发出《关于山东目前战争形势与我们紧急动员的指示》，指出，山东的战略地位空前提高，敌我斗争新的紧张形势即将到来，这种斗争必然发展到靠我为主的反攻局面。

六月二十日，罗荣桓、黎玉、肖华联名发布改进后勤

工作的训令。提出要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脱离群众及盲目山头主义倾向，转变领导作风。要求供给工作必须树立为战士、为部队服务的思想。

七月一日，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直属队举行纪念“七一”大会。罗荣桓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主要说明党的“七大”路线，分析了山东的形势，提出了今后的任务。

七月七日，山东分局和军区举行干部大会，庆祝建党二十四周年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功，并纪念抗战八周年。罗荣桓在会上作政治报告。他说，“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这是目前世界新形势的规律。他要求全体同志要认真学习“七大”文件，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原则，加倍努力，克服反攻前夜的一段艰难困苦，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七月七日，罗荣桓在《大众日报》上发表《处在总反攻前夜的山东解放区》，指出，山东解放区已包括有一千七百万人口，二十万八路军的正规军、游击队，五十万民兵与几百万人民自卫武装。这是经过七年的苦斗创造出来的。当前整个的形势是新局面的到来，处于总反攻的前夜。我们将以更加兴奋的心情、坚定的意志去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八月一日，罗荣桓发表《学习朱总司令〈论解放区战场〉贯彻我们的练兵》，强调要改善官兵关系，运用群众路线，深入宣传爱兵拥干的思想，使民主与集中结合起来。明确练兵是为了战斗，纠正形式主义、脱离应用之偏向。

八月七日，山东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召开选举大会，推选出席全国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罗荣桓以全票当选



(以后因形势的变化，全国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没有召开)。

八月十日，中央宣布山东战时行政委员会改为山东省政府。

八月十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八月十一日延安总部发布命令，要求各武装部队向敌占区进军，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同一天，罗荣桓主持召开了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高级干部联席会议，讨论和部署了大反攻的进军任务。号召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紧急动员起来，以高度自我牺牲精神与冷静迅速的态度，坚决执行总部的命令，为争取民族抗战的最后胜利，解放山东全部土地和人民而斗争。

八月十三日罗荣桓、黎玉、肖华联名发布动员令，命令山东各部队紧急动员起来，完成对敌人最后一击，迫其迅速投降。凡阻止我军挺进之一切反共军、投降派必须消灭，争取民族解放战争之最后彻底胜利。同时发出对日军的通牒，指出接受三个条件投降可保障生命安全，如仍有敌对行为即予坚决消灭。另通告伪军和伪组织，立即率部反正可本宽大政策处理，如另有企图，即予缴械逮捕论罪。

八月十四日，山东军区首长发布对敌伪俘虏政策的命令，重申我军优待俘虏的各项原则。并要求所有俘虏必须服从我军命令，停止一切反动行为，对违犯者将依法处理。

同日，中央指示各地解放军向大城市及交通要道进军。

八月中旬，山东全省部队进行整编。共编为八个师、十二个警卫旅、四个独立旅，共二十七万人。从八月中旬开始分五路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大举进军。

八月二十二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我军目前行动方针的指示》，指出：由于敌伪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市及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巩固解放区，准备应付新局面。遵照军委指示，山东军区在罗荣桓等领导下，立即调整部署，向临沂等中小城市进军。

九月十一日，我滨海、鲁中部队歼灭驻临沂之王洪九部伪军二千余人，解放该城。山东我军先后解放了四十六座县城、六处城市港口、三十五处火车站，歼伪军六万余人。

九月十九日，中央发出《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部署给各中央局的指示》，要求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调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十月，军委来电：“东北方面主要靠山东出兵，罗荣桓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去东北。”中央还决定陈毅到山东工作。

九月至十月，罗荣桓组织山东部队六万余人，地方干部四千余人，分三批经海、陆两路去东北。留在山东的还有四十多个团，包括四师、八师等主力部队。

十月上旬，陈毅到达山东临沂。罗荣桓向他介绍了各方面的形势和部队情况；一起讨论了山东分局改为华东局

及新四军军部和山东军区领导机关合并后的干部配备，研究了堵击徐州蒋军北上的作战方案。

十月二十四日，罗荣桓率轻便指挥机关从黄县龙口乘船渡海去东北，在辽宁金县以东貔子窝登陆（部分机关人员在庄河县登陆）。然后到辽阳，十一月到达沈阳。十二月就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十月三十一日，东北我军曾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罗荣桓任第二政治委员。不久改为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彭真）。

十一月十六日，国民党杜聿明部占领山海关。二十五日占领锦州。

十二月十三日，罗荣桓致电已进入东北的林彪、李运昌、吕正操等前线指挥部负责人，提出：东北已无我独占局面。我军应争取控制沿中长路两侧广大地区，使各大城市处于孤立之中，这样将会造成国民党还是处于劣势地位的可能。并应争取在一个月內展开创造根据地的工作，放手发动群众，整训充实野战军，建设地方军，统一作战指挥与后方之组织。

十二月二十二日，彭真、罗荣桓等致电各部队，要求加强团结，相互支持。先到达东北的部队应照顾全局，竭力帮助后到部队；主力部队应以最谦虚的态度去团结扶助新编成的部队。

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央向东北局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出东北工作重点是做好群众工作，在战略上要“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 一九四六年(四十四岁)

一月十日，国民党政府与我党签订了“停战协定”，但又片面宣布“国共停战，东北除外”。于是国民党一面表示与我党谈判东北停战，一面在美国支援下，将大批主力部队向东北开进，对我进攻。

三月上旬，罗荣桓因肾病严重，去大连治疗。他在病中致电东北局，提出：东北战争要作较长时间准备，不要把和平估计过急，应全面发展自己，全力支持这一长期战争。加强我军主力，保持元气，同时巩固地方武装，发展游击队，以造成主力进行运动战的更有利条件。还要加强各地后勤工作、兵工建设、医院建设，克服和平大后方大机关作风，力求战斗化与加强下层领导。

四月，罗荣桓初在大连疗养，以后去朝鲜平壤苏军医院检查，确诊为肾癌。由于条件限制，不能进行彻底的治疗。他虽然知道自己的病情较重，但仍决定很快返回东北局参加工作。

四月二十三日，他致电东北局和中央，对准备粉碎国民党进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国民党现在在大战场，采取分进向我进攻，便于我各个击破，并已开始遭到严重打击。或许今后敌人会引起警惕，不敢冒进。但我军采取一纵一攻，从运动中寻求其弱点，集中我优势之力量予以各个击破的办法将仍适用。

四月初，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四平，我军进行了艰苦的四平保卫战。四月中下旬到五月初我军在保卫四平的同时，先后解放了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座城市，歼敌二万



六千余人。五月十八日，我军在抗击并消灭了大量敌人之后，主动放弃四平，二十三日又由长春撤至松花江一线。敌军于五月三十日进到松花江南岸后停止前进。

五月，罗荣桓随同东北局由长春到哈尔滨。

六月七日，我党和国民党签订了东北停战协定，东北暂时呈现一种缓和局面。

六月十一日，林彪、彭真、罗荣桓等致电各兵团并报中央，指出：经验证明，敌愈分散愈易被我歼灭。因此，我指战员勿因敌占我一些城市而感到恐慌，须知我军在现时的作战条件下，放弃某些城市，可以诱致敌人分散，换取歼敌机会。

六月十二日，林、彭、罗致电东北各区各部队并报中央指出：东北的斗争，一方面力争和平，但应以百分之九十九的准备作艰苦的、持久的战争打算，切不可存侥幸的和平心理，我们斗争的根本方针，应当依靠乡村的广大农民群众，坚决实现清算减租分地的斗争；今后主力兵团的作战方针，是避免打大的阵地战和大的运动战，而应打中、小规模的运动战；对城市的方针，应当在可能的条件下，尽最大限度的努力以保持城市，但在客观条件显然不可能保持时，则应适时断然预先放弃，免得造成既损伤了力量，又仍然失掉了城市，以致对有利的作战机会不能及时使用；必须在指战员中进行充分教育，提高斗争信心，树立斗争决心。

六月十六日，中央决定组成新的东北局，林彪为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陈云等为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刘亚楼任参谋长，

谭政任政治部主任。

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从此对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

七月初，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扩大会议，罗荣桓出席并作了发言，他强调应坚决认真地贯彻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统一思想，克服对东北斗争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纠正对依靠自己的力量，没有明确认识等偏向。会议通过的《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七·七”决议）指出：无论在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创建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并把重点放在包括中小城市和次要铁路线在内的广大农村。创造根据地的中心内容是发动群众进行翻身斗争，实现耕者有其田，建立基层政权和党的组织，大力组织民兵自卫队，坚决肃清土匪，使东北自卫战争成为广大人民支援和参加的战争。决议还指出，东北是处在长期艰苦斗争的环境中。但东北的前途是光明的。号召全体同志准备作长期艰苦的斗争，彻底克服和平、享乐思想，加强群众观点，走出城市，从事艰苦的群众工作。这一文件的初稿是陈云起草的，于七月三日的东北局常委会上进行过讨论修改，林彪、彭真、罗荣桓、陈云和高岗参加了会议。

罗荣桓在东北局扩大会议期间，找了许多干部谈话，做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他强调东北部队来自五湖四海，一定要搞好团结，反对本位主义，山头主义。他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谈国内外形势和东北的工作，帮助大家树立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思想。

七月下旬，罗荣桓在参加东北局扩大会议之后，因病情

严重，即出国赴莫斯科治疗。以后他在那里做了一侧肾脏切除手术，因伤口大出血又做了第二次手术。他以坚强的毅力，忍受巨大的痛苦，配合治疗，苏联医生称赞他是“真正的英雄！”治疗以后留在苏联休养。

七月二十日，中央向全党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九月十六日，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全国各解放区军民在战略防御作战中奋起迎击敌人。东北我军采取了“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北密切配合，集中兵力放手坚决打击敌人”的作战方针，准备给敌人的战略进攻以有力的回击。

八月下旬，国民党军撕毁东北停战协定，开始进攻热河。九月，占我热河解放区大部后，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于十月上旬开始，先后向我辽东、辽南进攻。南满我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采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十一月二日在辽东新开岭地区全歼敌半美机械化装备的二十五师八千余人。

### 一九四七年(四十五岁)

从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春，南满我军在临江地区四次击退进犯之敌；北满我军为配合南满部队作战，三下松花江南打击敌人，共歼敌三万五千余人。与此同时，东北我军主力部队发展到近二十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达四十二万余人。这些胜利巩固了北满，坚持了南满，粉碎了敌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扭转了敌攻我

守的形势。

三月，国民党在受到我军的有力打击之后，被迫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对陕北和山东两地区的“重点进攻”。

三月十八日，我军主动撤离延安。

延安被敌人占领的消息传到莫斯科之后，苏联有一些人不相信我们，一高级军官在报刊上撰文，以悲观的语调评论延安的“不幸撤退”，认为延安丢掉了，中国革命就完了。有些在苏联学习的我国青年也不理解。罗荣桓满怀信心地给他们做工作。他说：放弃延安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中国大得很，今天我们放弃一个延安，将来我们会有更多的延安，有几十个、几百个延安，全国都是延安。他的话使同志们受到很大鼓舞。

五月十三日，东北我军发起夏季攻势。至七月一日共歼敌八万余人，攻克城市四十二座，使南、北满及冀察热辽解放区连成一片，彻底改变了东北战局，从此，东北我军转入战略进攻。

六月三十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揭开全国范围战略进攻的序幕。

六月，罗荣桓回到哈尔滨。他不顾苏联医生要他长期疗养的建议，坚决要求出院回国。在出院通知书中除了肾功能的病情之外，还增加了心脏病、高血压两项病变，要求他出院以后每天工作不能超过三个小时。当时东北我军在夏季攻势中已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正准备组织更大规模的秋季攻势，这是东北战场一个重要时刻。罗荣桓一回到国内就完全忘掉了自己的疾病，立即以全部精力投



入紧张的工作之中。

七月，根据罗荣桓的意见，东北局提出在继续发展地方武装的同时，有组织有计划地建设二线兵团，使主力部队有充裕的后备兵力。罗荣桓直接领导了组建二线兵团，扩充兵员，筹备作战物资等工作。他强调要采取深入动员，发动群众，逐级负责，保质保量地完成扩军计划。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动员了大批翻身农民参军，先后组成一百六十四个独立团，共三十七万余人。这一重大措施对于发展和提高我军力量，推动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东北开始土地改革。有些地方发生了比较严重的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在东北局会议上，罗荣桓提出，过去在苏区土地革命运动中就曾发生过“左”的偏向，不利于团结大多数农民群众。东北刚解放不久，特别要把住中农这一关，要保护中农的利益。对于一些农民进城挖浮财，破坏工商业的做法他也表示反对。他的这些正确意见，对于保证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起了重要的作用。

八月八日，罗荣桓等东北民主联军首长向部队发出加紧训练，准备发动秋季攻势的指示。

辽东军区部队在夏季攻势之前，开展了诉苦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罗荣桓认为这是部队教育工作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创造。八月二十六日，《东北日报》根据罗荣桓的指示，刊登了辽东军区诉苦教育的经验，并且根据罗荣桓的授意发表社论——《部队教育的方向》，社论指出，当前部队教育的基本内容应当是阶级教育，使部队了解社

会阶级关系和战争的性质以及个人在战争中应有的态度和作用。开展诉苦运动是用群众自己的经验教育自己，找出个人受苦的根源和出路，使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紧紧结合起来。这是巩固部队，提高觉悟，改造思想，增强战斗力最基本、最生动、最有力的教育。这不是单纯的教育方法问题，而是部队教育的路线问题和部队教育的方向。

八月二十八日，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发出关于贯彻土地改革教育的指示，要求全军同志积极支持土地改革运动。

九月一日，中央发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要求我军以主力打到国民党区域，由内线转入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九月十四日，东北我军发起秋季攻势，到十一月初，五十三天内歼敌六万九千余人，克城十七座，解放了中长、北宁沿线广大地区，粉碎了敌人维护交通，确保海口，“倚托重点，向外扩张”的战略方针。

十二月十五日，东北我军在四平至大石桥的中长路沿线和山海关至沈阳的北宁路沿线发起冬季攻势。

### 一九四八年(四十六岁)

一月一日，东北民主联军奉命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罗荣桓仍任副政治委员。

一月七日，中央发出《关于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

二月二日至三月七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召开政治工作会议。罗荣桓在会上作了报告。他首先指出革命形势

已进到一个转折点，人民革命战争将要走向全国范围的胜利。东北我军当前的任务就是截断敌人退路，继续分割、孤立、围攻敌人，准备吸引敌人新的增援，打击敌人新的增援，争取全部歼灭敌人进入东北的兵力。他还着重讲了建军的问题，提出东北不仅要为争取东北的胜利而建军，而且要为支援全国首先是支援华北作战而建设大规模的军队。为了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增强部队战斗力，他还总结了部队开展诉苦教育的经验，提出以阶级教育为基本内容，在集中领导下普遍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以群众自己的经验来教育群众，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政工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部队的实际情况，确定开展新式整军运动，以整思想、整作风为主，而不以查成分为主，不提“贫雇农路线”的口号。其具体内容：干部为五整（思想、作风、关系、纪律、编制）一查（成分）；战士搞好土地改革教育和民主运动。通过对存在问题的揭发和批判，提高阶级觉悟和革命斗志，增强群众观念和纪律观念，巩固内部，提高战斗力。从三月十八日开始，新式整军运动在部队全面展开，到四月底结束。经过发扬民主和深入的教育，极大地提高了部队政治觉悟，增强了部队团结，保证了战斗任务的完成。

三月中旬，从去年年底开始的冬季攻势，经过一百天的战斗，歼敌十五万六千余人，解放四平、辽阳、营口、吉林等城市二十一座。使国民党占领区缩小到只占东北全境的百分之一，只剩下长春、沈阳和北宁线上几座孤立的都市。

三月十日至四月一日，东北军区召开后勤工作会议，

着重讨论和解决了统一标准、统一制度、统一开支等问题。罗荣桓在会上作了总结报告。他要求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有后勤组织就要建立党的组织，有仓库兵站就要指定专人兼任政治工作。政治工作要贯彻到各个系统里面去，保证政策、法令、决议、命令的贯彻执行。

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十五日，东北野战军召开了参谋会议，罗荣桓在会上作了关于今后建军及正规化问题的报告，李富春同志作了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会议结束时由罗荣桓致闭幕词。

三月底，东北人民解放军开始整编，到八月间，共编成十二个野战纵队，每个纵队三个师，另有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兵纵队，还有十二个独立师，共七十余万人。连同三十三万地方武装，东北我军总兵力达一百零五万人。

四月二十日至五月二十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召开师以上高级干部会议。罗荣桓作了关于今后建军及正规化问题的报告。

五月十八日，根据新的作战任务的需要和冬季攻势中部队存在的问题，罗荣桓向部队发出指示电，要求做到：一、一切从政策观点出发，严格遵守城市纪律，保护新解放城市的工商业不受破坏。要懂得如果我们收复的城市不能恢复生产，则支援东北战争和全国战争是不可能的。二、要统一规定命令的执行，保持部队的高度集中。三、加强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有问题要首先检讨自己，反对骄傲自满。



五月二十五日，根据罗荣桓的意见，东北人民解放军颁发了入城纪律守则八条。六月四日，中央军委将这一守则转发全军，指出这个守则“比较扼要，对内对外注意事项都包括在内，各地可参考采用。”

从五月开始，东北我军开展了群众性的大练兵运动，普遍发扬军事民主，调动了广大官兵的积极性，提高了部队进行大的攻坚战和运动战的战术技术水平，为取得更大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为加强军队建设，罗荣桓十分重视办好学校培养干部。根据他的建议，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决定加强学校工作的建设，统一各学校的训练计划，树立统一的正规化的作风。到一九四八年年仅东北军政大学毕业和在校学员就有一万二千余人。此外还以延安炮兵学校为基础，发展为炮兵纵队（司令员朱瑞）；以航空学校为基础，开始建立了我军的航空兵，同时还扩大和建立了各种军事学校及训练班，培训了大批技术人材。罗荣桓对兵工建设也十分重视，他指示充分利用东北地区的有利条件，搞好兵工生产，争取有装备百万大军的武器。到一九四八年六、七月间，东北已建立了大小军工厂五十五座，人员二万余名。不仅供给了东北前线，而且支援了华北我军。

六月十五日，罗荣桓到长春前线主持召开了吉林会议。明确了我军围困长春的方针是：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与经济封锁，使其军心动摇而后再攻的办法。

七月一日，东北局直属单位党的干部集会庆祝建党二十七周年。罗荣桓到会讲话，他概述了党的历史，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它的基本精神就是

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从实际情况出发。当前已进入争取全国胜利的新时期，为了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就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历史。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政策，特别要强调集中统一，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现象。

七月，东北军区后勤司令部召开全军区后勤部长、卫生部长会议。罗荣桓到会讲话，他指出今后战争规模更大了，随之而来的后勤任务也更加繁重。必须统一集中和调剂使用人力物力，反对本位主义。供给机关的同志要坚持制度，领导上应该给这些同志撑腰，以达到坚持制度，树立法治精神的目的。

七月七日，罗荣桓为《军医杂志》题词：“为革命服务，提高个人技术水准，以同志态度对待伤病员，要有治病救人的精神。”

八月一日，中国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开幕，罗荣桓代表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在会上致词。他希望中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在解放区要加紧生产支援前线，保证军民物资的供给。在国民党统治区，则应积极准备力量，配合解放军的攻势，解放一切城市。

八月，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在东北部队中开展了增强组织纪律性的教育。同时部队建立与加强了党委的建设。八月九日罗荣桓在组织工作会议上做报告，强调贯彻集中统一是目前组织工作的首要任务。对各种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应积极地进行斗争。要严肃党的生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基层组织。这样才能把党的方针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

十六天”

八月，罗荣桓在哈尔滨主持召开荣誉军人代表会议。他要求这次会议不仅有先进人物的代表参加，还要吸收一部分闹事的荣誉军人参加。会上，他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指出战争的胜利既靠前方同志流血牺牲，又靠后方群众和政府的支援。荣誉军人同志们为革命做出了贡献，但不能居功骄傲。今后，一方面后方机关要注意改善对荣军的照顾，另一方面荣军同志本身应保持和群众的联系，严格地遵守纪律，并且积极参加后方的工作，继续为人民立功。这次会议既交流了经验，又教育了群众，取得很好的效果。个别伤病员闹事的问题很快地得到了解决。

八月十四日，中央军委批准：为了适应主力南下后，军事上、政治上领导的需要，东北军区和野战军分开。罗荣桓任野战军政治委员兼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时，在东北战场上我军已占压倒优势，兵力已达百万，国民党只有五十五万，所以他们采取重点防御，确保沈阳、锦州、长春，相机打通北宁线的方针。据此，中央军委决定把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放在东北战场。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指示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南下北宁线作战。罗荣桓坚决拥护这一正确的作战方针。

九月七日，中央军委又发出《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指示“置长沈两敌于不顾”，“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以造成关门打狗的形势。

九月八日至十三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以“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为中心议题。会议决议：要用最大的努力克服无组织无纪律状

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

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日，罗荣桓和林彪领导东北野战军进行了辽沈战役。九月二十九日我军攻克兴城，十月一日攻克义县，造成攻占锦州的有利形势。正在这样一个紧要时刻，十月二日林彪听说敌人要在葫芦岛增援五个师，他没和罗荣桓商量就发电报给毛泽东，要把已逼近锦州的部队调回打长春。电报发出后才告诉罗荣桓。罗荣桓气愤地说：打锦州是党中央、毛主席早已决定的正确方针，怎么能随便不执行呢？部队不能后撤，要等中央的指示。在罗荣桓的坚持下，又向中央发电表示要继续攻打锦州。十月三日，毛泽东两次来电指示“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十月四日，毛泽东再次来电对攻锦决心表示欣慰，要求攻击锦州的时间越快越好，并且指出“如果你们真的回头打长春，你们将要犯一个大错误。”

十月一日，在攻克义县的战斗中，炮兵司令员朱瑞不幸牺牲。罗荣桓十分悲痛。他和野战军其他首长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朱瑞对炮兵建设起了重大作用，他的牺牲是一个重大沉重的损失。并且建议为了纪念朱瑞，将东北炮兵学校命名为“朱瑞炮兵学校。”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建议。

十月初，在攻击锦州之前，罗荣桓召集各纵队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开会，进行战役动员。他传达了中央军委攻锦的方针和部署，说明这一战役的战略意义和发展前途，鼓励大家要树立充分的决心和信心，并教育全军指战员明确战略意图，密切协同，奋勇作战。他还强调各部队一定要注意纪律和政策，一切缴获归公，不准侵犯群众利益。



他指着会场外的一片苹果林说：锦州地区出苹果，回去要教育部队，保证不吃人民的一个苹果。不论是长在树上的还是收获回家的都不准动，掉在地上的也不准拾。各部队认真执行了这一指示，在群众中造成极好的影响，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罗荣桓等亲临前线，观察了锦州敌情地形，对部队作了具体部署。

十月十三日，他亲自赶到担任从东面攻击锦州的八纵队指挥部，督促该纵队领导同志组织进攻。

十月十四日我军对锦州守敌发起总攻，十月十五日攻克锦州，全歼守敌范汉杰部十二万多人。

十月十六日，长春守敌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在我政治攻势下率部起义，我军进入长春市区。十月十九日郑洞国率部十万余人投降。

十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辽西我军乘胜在黑山、大虎山地区歼灭敌廖耀湘兵团十万余人。

十一月二、三日，我军攻占沈阳、营口，歼敌十万余人。历时五十二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四十七万余人，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十一月三日，中央来电致贺，指出东北战场的胜利，“粉碎了中美反动派奴役东北人民并利用东北以挑拨国际战争的迷梦。奠定了在数年内解放全中国，然后将中国逐步建设为工业国家的巩固基础。”

十一月，中央军委决定，把原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改为第一、二、三、四野战军。罗荣桓任第四野战军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一九四九年三月正式改称第四野战军）。

十一月三日，罗荣桓等野战军首长，指示各部队移至指定地点进行休整。要求在整顿部队中应一切为了新的行动和继续作战，切实克服太平享乐保守的观念。要教育全军指战员懂得革命如不全部胜利，局部胜利是决不能巩固的。只有迅速使蒋介石遭到全部失败，中国人民才能得到彻底解放幸福。

十一月六日，第二、三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

十一月八日，罗荣桓起草了向中央的综合报告，认真总结了九、十两月的作战经验。报告中对林彪打锦州一度动摇的问题，作了检讨。报告中说：增援之敌加上锦西葫芦岛原有敌军，将有九个师，这曾使我们攻击锦州之决心“一度发生顾虑”。同时还由于我军部署还未完全就绪，“因而发生疑问”。这个报告给林彪看时，他板起面孔将报告一摔，拂袖而去。十一日毛泽东复电说：“报告收到，阅悉，甚为欣慰，即转发各野战军前委阅看，以资参考”。毛泽东在复电中又向全军提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

十一月十六日，军委电令第四野战军早日进关包围津、沽、唐山。

十一月十九日，罗荣桓在野战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总结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动员部队立即入关作战。他说：我军取得伟大胜利是执行了中央、毛主席的思想、方针、政策路线的结果；是广大人民群众支援的结果。现在中央要求我们停止休整，立即入关，去拿下北平、天津。为了完成这一新的任务，首先就要做好思想动员工作，树立胜利的信心，使部队懂得东北解放军到关里去是义不容辞的，

解放全中国是光荣的任务。要克服部分人怕远离家乡，想休息享受的消极思想，保持光荣，争取更大的光荣。同时，他再次强调要加强部队组织纪律性，增强团结，特别是和华北兄弟部队的团结。

十一月，罗荣桓亲临三十八军给营以上干部讲话，动员向关内进军。

十一月二十三日，第四野战军部队开始向关内开进。二十七日解放山海关、秦皇岛。十一月三十日，罗荣桓等率野战军指挥机关由沈阳出发向冀东地区前进。

十二月十一日，毛泽东电示林彪、罗荣桓等第四野战军首长，具体规定了平津战役的方针。要求在两个星期内采取的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不让敌人跑掉，以待我军部署完成之后，将敌人各个歼灭。根据这一方针，野战军总部命令各纵队，与华北野战军协同作战，将敌人围困在北平、天津、塘沽、新保安、张家口五个孤立的据点之中，截断他们南逃、西窜的退路。至十二月二十日，上述任务全部完成。

十二月十一日，中央军委电示：东北我军正陆续入关，攻击平津张唐诸敌之作战业已开始。这是一个巨大的战役，不但东北、华北两区野战军应归林、罗、刘、谭统一指挥，冀中、七纵（华北）及地方兵团亦应统一指挥。

为了支援四野进关部队，华北地区党政军民全力开展支援前线工作。华北军区派出各方面的负责同志到平津前线组织支前，并一再通令各地要积极参加作战，坚决服从命令。

十二月十一日，第四野战军首长发出平津作战的政治

动员指示。指出了全歼华北敌人对于争取全国胜利的重大意义。要求各部鼓励士气，振奋全军，做英勇善战的模范，团结人民团结友军，做遵守纪律执行政策的模范。

十二月十七日，中央电召罗荣桓到西柏坡中央住地，与刘伯承、陈毅、薄一波等一起商量一九四九年整个作战的基本方针问题。

十二月二十日，为了搞好同兄弟部队及地方党和政府的团结，罗荣桓等四野首长指示各纵各师在与各地同志接触中，必须十分注意以阶级友爱的同志态度，交涉问题。要充分了解对方的困难，要认真约束部队，严格遵守纪律。

十二月二十二日，平津前线司令部以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名义发出布告，宣布解放北平、天津诸城市的约法八章。

十二月十二日，我军围歼了新保安之敌主力三十五军军部和两个师。二十四日又攻克张家口，全歼守敌一个军部七个师，共计五万四千余人。

### 一九四九年(四十七岁)

一月六日，林彪、罗荣桓致函敌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等人，要他们仿效长春郑洞国的榜样，命令所属部队自动放下武器。陈长捷等曾两次派人出城谈判，但只是拖延时间，并无诚意。

一月十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在六十五天的战斗中歼敌五十五万余人。



一月十日，为统一指挥东北、华北我军联合进行平津战役，党中央指示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前线党的总前委。统一管理平津唐及其附近区域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党务等各项重要工作。

一月十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铁道部，以迅速修复长江以北主要铁路，便于我军南进的运输供给，并委托罗荣桓与东北局商定从东北抽调行政干部和专门人员到铁道部工作。

一月十四日，在天津守敌拒绝投降之后，我军发起攻击，十五日解放天津，歼敌十三万人。

一月十六日，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致函傅作义将军，晓以当前形势，指出如果继续抵抗已毫无作用，并提出两条办法任其选择：一、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共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我军则保证其生命财产之安全。二、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在这之前，罗荣桓等曾两次与傅作义派出的代表进行谈判。傅作义将军接受了第二种办法，将其所属部队陆续开往指定地点接受改编。一月三十一日我军开进北平，二月三日举行隆重的人城式。至此，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和改编敌军五十二万余人。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连续决战的胜利，使国民党主力丧失殆尽，从而把解放战争推进到扫清残敌，解放全国，取得最后胜利的阶段。

一月二十九日，罗荣桓在四野干部会上作报告，指出一九四九年将是中国革命取得全部胜利的一年，必须把革

命进行到底。他分析了南下作战的有利条件和可能遇到的困难，具体布置了各项工作。要求部队以战备姿态休整两个月，解决南下思想问题，在政治上提高一步，同时进行军事上的训练和准备。

二月五日，罗荣桓等第四野战军首长提出两个月的休整计划。要求以政治整训为主，军事教育为辅。全部整训工作应以准备南渡长江作战，担负发动群众，管理一亿以上人口的地区，将人民政权，人民武装建立起来，使革命在长江以南各省取得胜利为目的。计划规定了整训的四项具体内容：一、进行形势教育，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二、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现象；三、从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教育改造大批解放入伍的战士；四、加强与改善连队管理教育工作与党的支部工作。二月八日军委批准这一计划，并转发给各军区、各野战军参照办理。

二月十五日，罗荣桓向中央军委提出在北平市委统一计划之内，直接吸收一万名知识青年参军。中央军委原则上同意了这一意见。后来这些知识青年随军南下，名为“南下工作团”，为部队建设和开辟新区工作增添了力量。

二月二十一日，平津前线司令部、政治部召集傅作义所属各受编部队师级以上军官开会，宣布改编方案。罗荣桓到会讲了改编的方针和意义。他说，这次改编不只是简单的军事改编，不仅仅是改旗易帜，而是一种政治的改编，是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改编为人民的军队，是根本改换立场的问题。因此首先就要学习解放军的一套政治制度，依靠启发战士自觉，讲真理，讲民主。他指示到会军官不要害怕发扬部队中的民主，而要看自己有没有决心进

步。他同时宣布为了实现改编，将派出政治干部到各受编部队工作。

三月一日，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四届代表大会在北平开幕。罗荣桓代表人民解放军到会祝贺。

三月五日至十二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决定了党取得全国胜利以及胜利以后的基本方针政策。罗荣桓因工作关系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三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迁来北平。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在西苑机场检阅了人民解放军部队。罗荣桓等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到机场迎接并参加检阅。

三月下旬，为了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第四野战军在北平召开师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三月二十九日，罗荣桓在会上发言，着重讲了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现象的问题。他指出全国胜利即将到来，要求全党全军更加团结更加统一集中，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服从军委统一军事指挥，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现象。这是一个基本的胜利条件。他要求各级党委要做到以下五点：一、认真学习中央二中全会决议，提高政策水准；二、健全党委的集体领导，加强党委的团结；三、克服手工业工作方式，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四、反对居功骄傲；五、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四月五日，罗荣桓作了会议总结报告，号召全军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二中全会决议，领导干部要做模范，加强部队建设。

四月，罗荣桓与邓宝珊等协商和平解放绥远问题。

第四野战军主力部队九十万人遵照军委的命令从十一

日起，由平津地区出发南下。由于一九四七年七月罗荣桓开刀后，一直未得休息，指挥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又过度劳累，他终因患高血压晕倒，于四、五月间赴天津养病。在此期间，仍关心部队南下，并作出许多具体指示。随后毛泽东指示他到北平继续休养。

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朱德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二、三野战军首先突破敌人长江防线向江南挺进，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南京。

五月十四日，第四野战军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一百余公里地段上强渡长江，五月十六、十七日解放武汉三镇。

六月七日，根据中央决定，华中局及华中军区成立，罗荣桓任华中局第二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十二月改称中南局和中南军区）。

九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罗荣桓作为第四野战军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被选入大会主席团。九月三十日，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府成员，罗荣桓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担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罗荣桓和党、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了开国大典。

第四野战军在其他野战军的配合下，渡江之后继续挥师南下，八月湖南和平解放，接着又进行了湘粤桂战役。十月十五日我军解放广州，逃亡到广州不到六个月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又告解体。十二月四日我军解放南宁，十一日



解放边防重镇镇南关(友谊关)。至此华中华南六省除海南岛及广东沿海少数岛屿外全部获得解放。

### 一九五〇年 (四十八岁)

三月至四月，第四野战军组织进行了海南岛战役，解放了琼崖全岛。

四月，中央决定罗荣桓任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傅钟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六月六日至九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讨论土地改革、财政经济、外交和统一战线、解放军整编等问题。罗荣桓出席了会议。

六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幕，讨论了土地改革问题，通过了土地改革法草案。罗荣桓出席了会议。

六月三十一日，军委和政务院决定“在国家生产建设开始时，人民解放军部队必须进行一部分复员，去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工作，以帮助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又必须继续加强国防军的建设，以捍卫人民祖国。”根据这个决定，总政治部七月七日发出《关于部队整编复员的政治指示》，要求各级领导要以对国家对个人负责到底的态度，慎重地、有准备有步骤地做好这一工作。要求教育大家在军队做一个光荣的战士，在地方做一个模范公民，尤应在生产建设中起模范作用。在军委和总政的领导下，全军迅速地顺利地完成了一百五十万武装人员复员的巨大工作，这对于促进国家经济建设的恢复发展，和建设更精干强大的国防力量都起了重大作用。

八月一日，军委颁发了总政治部起草的，经过毛泽东审查和亲笔修改的《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指出为了完成伟大的新任务，就必须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并从军队中培养大批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此，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学校。指示中还具体规定部队以百分之六十的时间进行文化教育；举办各种类型的文化学校；采取速成的、联系实际、正规的教育方针。这一指示发出后，得到全军热烈响应。经过充分准备，普遍深入地掀起了学习文化知识的高潮。

八月，罗荣桓在和空军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建设空军是一项新的重要的工作，过去没有经验，要注意研究总结。一方面要继承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一方面要学技术、学业务，把思想政治工作和技术业务结合起来。既要学习苏军的先进经验，又不要躺在顾问身上睡大觉，要以自己为主。工作中一定要谨慎，多请示报告，注意勤俭节约，不要当败家子。

九月二十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的批示中，向罗荣桓建议：“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于持久，请考虑。”罗荣桓仍旧坚持领导总政工作，掌握方针大计，总政日常工作由肖华副主任主持。

九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三十日，为了表扬革命战争中战斗英雄与各方面的模范，鼓励全军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推动各项工作的完成，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

议。罗荣桓在大会上致闭幕词。他强调指出：“在我们这里的英雄模范和历史上一切旧的所谓英雄人物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的英雄模范是属于人民忠于人民的，是从广大群众的集体英雄主义中创造出来的。”他勉励到会代表，“必须力戒自满骄傲居功，要永远站在群众之中，巩固与群众的联系；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毛主席走；要永远保持荣誉的英雄称号，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前进。”

十月，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结束后，总政治部向中央作了总结报告。报告总结了会议取得的成绩，还提出了会议中反映出来的在部队思想上急待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一、部队中相当普遍地发展着和平麻痹情绪，原因是爱国主义教育进行的不够深入，对帝国主义侵略阴谋及战争威胁认识不足。因此应加强教育，树立战斗队的思想。二、部队英模运动和立功运动还不够普遍和深入，尤其在干部中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在今后保卫国防、建设强大国防军的任务中，还应大力推行这个运动。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转全军，并指示“其中指出各点，请你们研究执行为要。”

十月，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整风工作指示》，要求各部队在冬季展开普遍深入的整风运动，以整顿与提高战斗意志，保持与发扬我军光荣的传统作风为中心，明确地、牢固地树立“永远是一个战斗队”的思想，准备随时用战争反对武装侵略者。整风采用学习文件，检查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以达到分清是非，启发个人觉悟的目的。反对追逼惩办及各种过火斗争方式。这次整风对加强部队思想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

十月，总政治部召开全军青年工作会议。二十三日罗荣桓在会上作总结报告，提出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展开普遍建团，为争取达到百万团员而斗争的任务。他在报告中指出，加强军队建设必须取得适应的文化科学知识做为基础，而这主要依靠青年。把青年的积极性发挥起来，成为突击力量，才可能打下这个基础。青年团应该以鼓励青年进步，团结广大青年在党的周围，以加强学习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根据这次会议精神，经毛泽东批准，总政治部于十一月发出《关于目前部队青年工作的指示》，明确学习是部队青年团的基本任务。

十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罗荣桓参与了这一重大决策，并为抽调干部参加抗美援朝和加强入朝部队思想领导做了大量的工作。

十一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正式组成，罗荣桓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他在成立大会上讲话，强调要发扬我军党管干部的优良传统。

十二月，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一九五一年全军政治工作方针与任务的指示》，规定我军今后政治工作的基本方针是，继续鼓舞部队高度的战斗意志，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部队铁的团结，开展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中心的练兵运动，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量。



## 一九五一年（四十九岁）

一月，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一九五一年部队文化教育实施方案》。根据全国抗美援朝的总形势，方案提出：文化教育应该围绕战争与战备的需要，适应各种部队的中心任务抓紧实施。要求部队充分认识在任何环境下，文化教育都是我军教育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明确指出提高文化对于提高我军军事、政治水平的重要性。

罗荣桓对部队的政治理论教育也很重视。他提出要系统地学习革命理论，作为部队思想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总政治部一月发出《关于一九五一年部队政治教育指示》，要求在各级干部中，有指导、有系统地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理论教育，以保证部队战斗任务的完成与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的建设。指示还具体规定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按现有水平分别编组。初级班以阶级观点教育与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为首要。中级班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问题、列宁主义基础、党的建设。高级班学习毛泽东选集、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思想方法论。

四月，总政治部召开全军组织工作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关于整党的精神，确定在军队党内进行一次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的整理工作。首先在党内普遍深入地进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提高党员的政治思想水平，教育改造那些有缺点错误的党员，淘汰极少数确实不可救药的分子。

十一月五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民兵政治工作的指

示》，指出，民兵这支不脱离生产的人民群众的武装，不但是目前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地方秩序的重要力量，而且是强大的国防后备力量与今后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基础。因此加强民兵建设是军事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指示规定民兵建设的具体任务是：建立与健全各级人民武装领导机构，加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整理与巩固现有的民兵组织，加强对民兵的军事政治教育，使民兵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提高起来；由自愿参加民兵的组织原则，逐步地适当地改变为普遍民兵制度，使之能够更好地担负保卫地方秩序与国防动员的伟大任务。

十一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一日，总政治部召开全军第二次宣教文化工作会议。罗荣桓做了总结讲话。会议肯定了开展文化教育的成绩，要求继续贯彻“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方针，不只要求速，更要强调成。强调效果的确实、巩固与熟练。

十二月一日，根据军委关于整编部队，精简机关，厉行增产节约的决定精神，总政治部发出《关于部队整编工作的政治指示》，指出，此次整编一方面要按规定的编制整编现有的部队、机关和学校；另一方面是动员大批人员进行转业建设。这是一项规模巨大、影响全军全国的任务，必须做好深入的动员与教育工作。使留队者安心，转业者满意，有利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有利于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十二月，罗荣桓写信向中央建议，为了保存和提高政治工作干部，除军区办政治干部学校以外，军委可以开办一个轮训师团级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级政治干部学校。毛泽

东、周恩来、朱德都批示同意。即由罗荣桓、肖华等组成政治学院筹备委员会，着手筹建工作。

十二月二十五日，罗荣桓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总干部管理部成立一年来的工作情况。为了适应新形势下建军的需要，总干部管理部在干部调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全军先后抽调了十多万干部建设各特种兵、学校和领导机关。调学校学习培养的干部有近二十万人，还有四万人转业到政府、企业、财政系统工作。

### 一九五二年（五十岁）

总政治部提出一九五二年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是：贯彻抗美援朝、增产节约和加强国防建设的思想教育。注意防止因部队整编及大量人员的转业而可能产生的思想混乱与战斗意志松懈的现象。保证整编、整党、三反、文化教育与组训民兵等工作得到成功。

八月一日至十一日，全军体育运动大会在北京召开。二十三日总政治部向中央报告大会情况，并提出今后我军应当更广泛地普遍地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把锻炼指战员的体质，作为我军训练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为了达到体育运动普及与提高的目的，建议在军队中成立专业体育工作队或体育训练班。

八月十四日，罗荣桓向中央军委报告全军文化教育的情况。到七月底为止，全军已有二百万人投入文化学习。已开办速成中学五十多所，建成小学二百二十多所。文盲迅速消灭，好学上进成为风气。由于广大指战员自己可以看一些书报，眼界在扩大，思想在开展，建设现代化军队

的信念在加强，学习军事技术更加便利。这是改善我军素质的一项重大措施。报告提出，今后要在这一基础上巩固起来，坚持下去，取得更大的成绩。

十二月九日，罗荣桓和内务部部长谢觉哉联名发出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军爱民，民拥军的口号下，进一步提高觉悟，加强团结，巩固国防，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并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

### 一九五三年（五十一岁）

总政治部确定一九五三年政治工作的方针是：志愿军部队要不断提高战斗意志，继续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提高战术技术，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随时准备粉碎敌人新的进攻。国内部队应该进行大规模的正规化的整训运动，继续加强以抗美援朝为中心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提高部队的文化水平与军事素养。巩固海防、边防，保卫祖国的和平建设事业。

一月十日，总政治部向中央军委报告志愿军一年来敌总工作情况。提出在国外作战中，同样应该而且可以做好瓦解敌军的工作。敌军工作做好了，不但对今天有意义，对明天也有作用。

三月，军委和总政发出《关于加强学校政治工作与政治教育的指示》，规定学校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学员，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提高教育效果，保证军事、政治、文化等一切训练计划的完成，为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培养干部。学校党委、支部与政治机关的工作计划，应该围绕着教学计划，围绕着教



育中心。学校的政治理论教育，应该采取系统的、联系实际、稳步前进的方针。学好政治常识、历史唯物论、中共党史和联共党史四门课。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引导学员领会课程内容的精神实质，联系思想和工作，提高认识。

四月，甘泗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五月，军委决定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起，全军实施以军事为主的正规训练。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实施正规训练中的政治工作指示》，要求全军同志认识这一正规训练是我军建军新阶段的开始，是我军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的重大步骤。要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勤学苦练的精神，投入这次训练中去。要注意训练的实际效果，反对走过场、赶进度、不求实效的形式主义。

六月四日，政治学院基建工程破土动工。罗荣桓对学院的筹建十分关心，他亲自选定校址，要求着眼于“快培养人”、“多培养人”，抓紧各项工作，先建学员楼、后建办公楼、宿舍楼，争取尽快接收学员。

十月一日，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公布。十二日，总政治部发出通知，要求在部队干部战士中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总路线，做为提高思想，鼓舞情绪，改正缺点，加强工作的有力武器。

十二月七日，在彭德怀主持下，军委召开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制度和方针，提出了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对我军建设具有巨大意义。罗荣桓参与了这些重要的决策。他主持研究了军队政治工作建设问题，由肖华代表总政治部做了《关

于军队政治工作建设几个问题》的报告。会议决定把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以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作为我军军事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在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是训练部队特别是训练干部。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加强党的团结，改善党的领导，切实执行集体领导的原则。会议经过讨论，对于我军是否要坚持政治工作的体制和传统问题，取得了一致认识。

反党分子高岗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到处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下半年有一天，他突然跑到罗荣桓家里，提出我国也要搞部长会议制度，让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罗荣桓吃惊地问：这是中央的意图吗？高岗说：“中央没有议过，毛主席也不知道，我们先议一议。”罗荣桓当即严肃地指出：“这样重大的问题我们来议不妥当！由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也不妥当。我们部队有一、二、四方面军的，还有十五军团的，谁干什么要由党中央毛主席统一安排。”义正词严地把高岗顶了回去。

### 一九五四年（五十二岁）

总政治部规定，一九五四年我军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在全军普遍深入地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有关军队建设的各项规定，提高全军同志的社会主义觉悟与现代化正规化建军思想。保证完成一九五四年训练计划和其他任务，使我军战斗力获得进一步的巩固与提高。

二月，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揭露了高岗的反党阴

谋活动，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罗荣桓因病没有出席会议。他写了书面发言，积极参加了反对高岗阴谋活动的斗争。

四月十五日，在罗荣桓领导下，总政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经中央军委批准正式颁布实施。条例的基本精神是：一、明确军队的性质和任务，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必须坚决地为着党的纲领路线，为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二、政治工作就是党的工作，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一句话是毛泽东审阅时亲笔加上的），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部队。三、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提高全军人员的军事素养，使全军熟练地掌握现代化的军事业务技术。四、政治工作在保证完成一切任务中，必须贯彻党的三大作风。政治工作条例系统地总结了我军政治工作建设的经验，是加强军队建设的一件大事。

六月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任命罗荣桓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八月三日至五日，东北军区选出罗荣桓等六人为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八月八日，军委及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指出，少数干部经不起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袭，在革命胜利之后滋长了极端严重的享乐腐化思想。为了坚决纠正不良倾向，要求加强党对高级干部的领导与监督，开展党委和高级干部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保证一切党的高级干部在各方面接受党的领导和群众的监督。必须严肃党的纪律，对那些屡教

不改的人，不论其职位多高，都要给予必要的党的纪律制裁。这一指示是根据罗荣桓的建议作出的，对于教育干部，加强党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

八月二十四日，军委批准政治学院根据罗荣桓指示起草的《办院基本方案》。方案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是全军培养高级政治干部的学校，其任务是提高全军高级干部（主要是政治工作干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素养、党的政策水平，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增强党性锻炼，学习现代化的军事科学基础知识和军队政治工作，使之能够更好地担负起现代化建军中的领导工作任务，有效地加强我军政治工作建设，以适应现代化建军和作战的需要。”方案还规定“遵循理论与实践联系的原则，贯彻教学与思想建设结合，学与用结合，学习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的教学方针。”

九月二十五日，罗荣桓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他说，五年来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我国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制度具有极其显著的优越性。任何势力也阻挡不住我们前进。当然我们工作中也还有一些缺点错误，但是我们有决心不断改进，我们一定会把我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还讲了军队工作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包围依然存在，国内的阶级还没有消灭，我军在今后仍需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并经常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防止和纠正各种不良倾向，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九月二十七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罗荣桓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二十九日，罗荣桓被任命为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十二月十二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实行义务兵役制、军衔制和军官薪金制等问题，通过了实行三大制度的政治工作报告。

### 一九五五年（五十三岁）

二月，第一届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决议》。

政治学院正式开学，罗荣桓兼任政治学院院长，肖华、莫文骅为副院长。十九日，罗荣桓出席速成系第一期一、二班开课仪式并讲了话。他说：我们部队正进行正规化建设，更需要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我们的政治工作也必须提高一步。政治学院的任务就是要培养高级的政治工作干部，提高他们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和政治工作水平。他要求大家发扬红大、抗大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把学习搞好。

三月二十一日，党中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罗荣桓因病没有出席。他在书面发言中深刻批判了高岗的反党活动，并从这一事件中总结了经验教训。他说：“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和监督，健全军队中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是军队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任何放松都会招致损失。”“加强各级党委集体领导和对干部首先是对高级干部的监督是极为重要的。”

七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八月，罗荣桓在《八一杂志》上发表《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一文。文章指出，在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不是削弱我军的光荣传统，而是要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党对军队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原则，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等等，是我军本质的体现，是我军战斗力的源泉，必须继续发扬。有的人把正规化与发扬民主对立起来；认为住进营房，军民关系就不重要了；生活条件好了，就不再讲艰苦奋斗；以及重视技术，轻视政治等思想认识都是不对的，必须认真加以纠正。

九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授予罗荣桓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并授予他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部队都普遍按照《军官服役条例》，为各级干部评定和授予军衔。

十一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监察委员会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组成。罗荣桓为书记，谭政、宋任穷为副书记。

十二月，罗荣桓和贺龙、谭政等一起到驻京部队视察。

### 一九五六年（五十四岁）

三月十六日，罗荣桓在政治学院授旗开学典礼大会上讲话。他说，我们的教学方针是：每门课程都要有系统地进行教学，但又是重点的。教学应注意联系实际，特别是当前党的路线政策；同时也要注意学习军事。他勉励大家

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理论水准提高一走。他还为学院题词：“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必须与完成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相结合。”

九月二日，罗荣桓向军委和中央写信，提出：“我长期身体不好，不能工作，而又挂名很多，精神上极感不安，请求解除我总政治部主任及总干部部部长等职，以免妨碍工作。”信中还推荐了继任人选。中央研究以后批准了罗荣桓的请求。十二月二十九日人大常委第五十二次会议决定任命谭政继任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继任总干部部部长，并兼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以后总干部部与总政治部的干部部合并。

九月十五日，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罗荣桓出席大会并被选入大会主席团。二十六日，大会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罗荣桓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九月二十八日，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中央领导机构，罗荣桓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十月十七日和十一月三日，罗荣桓和政治学院有关同志两次座谈。他详细介绍了古田会议的情况以及我军建军历史和优良传统，强调要坚持党委制、集体领导、发扬民主、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等建军原则。他说，这些原则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搞现代化建设同样离不开这些原则，否则就会使我们的人民军队变质。

冬天，罗荣桓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湖南衡山县。他和县机关工作人员、农业合作社干部以及人民群众广泛接触。他问农民有没有钱用，干部们说：“有是有点，但还不够。”罗荣桓说：“算是句老实话，没有吹牛皮。”他勉励大家要靠

山吃山，靠水吃水，不能只抓粮食，要开展多种经营，搞好副业生产。

### 一九五七年（五十五岁）

一月，罗荣桓由湖南到广东、海南岛、福建等地视察。每到一地，他都同干部、战士、工人、农民亲切交谈，了解他们在想什么，有什么困难。在海南岛，他步行到黎族村寨的茅棚里，询问群众生活情况，鼓励他们走合作化的道路，通过辛勤的劳动改善生活。在汕头部队，他首先到食堂了解生活情况。在福建，他深入前沿哨所看望战士们，当敌人炮弹打过来时，他首先考虑的是大家的安全，告诉战士们怎样防空、防炮，注意荫蔽避免伤亡。一路上他拒绝任何特殊的招待，不接受任何礼物，一再教育随行人员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四月二十日，罗荣桓对办好《解放军报》作了如下指示：一、要多抓思想工作。部队中存在不少思想问题，如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以及军队和地方党委之间都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很好解决。二、贯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部队中主要是充分发扬民主问题，部队原来就有民主的传统，今后应该进一步保持和发扬。三、反对教条主义。搞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应该向苏联学习，但不能抛弃我军的传统和作战经验，必须照顾到我军的实际情况，批判地进行学习。

八月一日，罗荣桓为《解放军报》题词：“发扬人民解放军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传统作风，为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



罗荣桓为“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撰写了《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一文，叙述了我军创建的历史和毛泽东建军原则的提出和发展，指出毛泽东系统的建军思想是通过实践逐步完成的。到古田会议，毛泽东建军的一套经验，便基本总结起来，成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几十年来，它一直对革命战争和军队的建设起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 一九五八年（五十六岁）

三月，党中央在成都召开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四月二十九日，罗荣桓在政治学院干部会议上讲话。他指出全军学校工作成绩很大，培养了大批干部，但也存在问题。有些毕业学员部队不欢迎，原因主要是学校训练与部队脱节，应引起注意。他说，有人把理论看成静止的，而不是发展的；没有发展的观点，就是读些经典著作也不能开动脑筋。

五月二十七日，罗荣桓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军队实行军衔、薪金等制度以后，一些干部的思想产生了新的问题，计较军衔级别，不安心军队工作，原因就是思想工作没有走在前面。他提出贯彻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精神，大家把意见都摆出来，以利于研究和解决部队中存在的问题。

六月十六日，政治学院召开座谈会，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一周年。罗荣桓出席并讲了话。他指出这篇文章是很重要的历史文件，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马列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创

造性的运用。应该结合实际学习贯彻。他还着重讲了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他说，学习苏军的经验也要独立思考，不能认为别人的一切都是好的，都适合我们的情况。现在搞现代化，有的人又提单一首长制，单一首长制是不是一点问题没有，是不是就是先进的，不见得。

八月二日，罗荣桓对政治学院一九五八年夏季毕业学员作题为《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坚决埋葬教条主义》的讲话，批判了那种把书本上的东西变成死的教条，把抽象的概念公式化的学习方法。他说，理论来自实践而又回到实践中为实践服务，并在实践中得到证明、补充和发展。对于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也要提倡实事求是，不提倡迷信。毛主席著作本身就是反对迷信的。学习毛主席的东西，不是要迷信，也不要象某些人对毛主席著作中的个别词句发生趣味，而是要领会它的精神实质。

九月，政治学院进行整风。十二日罗荣桓在学院党员干部大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上讲话。他强调政治学院肯定要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主，不能变。要学民主革命的经验，更主要的是学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教学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联系实际，改造思想。学习方法提倡独立思考，互相质疑。教学改革依靠党委领导，大家动手，政治机关要细致的组织，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九月二十七日，他又在一个座谈会上讲话，批评在一部分人中间，只强调自由，不要纪律，只强调民主，不要集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

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罗荣桓出席了会议。

## 一九五九年（五十七岁）

二月，罗荣桓和董必武、聂荣臻等一起到湖南等地视察。

四月初，党中央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工作方法的讲话。二十三日，罗荣桓向政治学院常委传达会议精神，要求领导干部要多找下面的同志商量问题，多与群众谋一谋，把工作搞好。

四月十八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罗荣桓参加大会并被选入大会主席团。二十七日，大会选举罗荣桓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二十八日罗荣桓继续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五月十八日，罗荣桓向政治学院轮训十四、十五班毕业学员讲话。他强调毛泽东思想、群众路线要反反复复地讲。不要满足于已经学到的东西，要到行动中去贯彻落实。

六月二日，罗荣桓对编写山东地区抗日战争战史的方针、方法作了指示。

六月五日，第四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组成，罗荣桓任主任委员。他对四野战史的编写作了重要指示。

六月五日，罗荣桓在政治学院座谈会上讲话，八日又在政治学院八、九、十班毕业典礼上讲话。在这两次讲话中，他针对群众的思想情况，对大跃进中的问题做了分析和说明。他说，一九五八年肯定是跃进，但缺点也不少，教训是很大的。搞工业没有群众智慧不行，但光靠群众热劲是不行的，一定要和科学分析相结合。要讲真话，不能

讲假话，一九五八年放的“卫星”虽多，许多是假的；有的“插白旗”的地方反而比较平稳。中央已经发现和纠正了这方面的问题，承担了领导责任。大家都要总结经验教训，要有克服困难的信心。他还讲了学校教学问题，提出毛主席著作要结合党史讲，政治工作要结合战史讲，这样讲更生动，更好理解。在学习中间，提倡自由思想，不要怕，有什么，想什么，就讲什么。通过大家研究，把问题搞清楚。

七月，罗荣桓为济南部队美术作品的选集题词：“普及诗歌、绘画创作，为鼓舞战斗训练、劳动生产、文化学习服务，让更多更好的花朵，开遍到每个连队。”

八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罗荣桓因病未出席。会上提出由林彪担任国防部长，在征求罗荣桓的意见时，他表示：林身体不好，不宜于担任这一职务，建议由贺龙任国防部长。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

八月，罗荣桓为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儿子罗东进题词：“学习专业与学习政治相结合。政治是确定方向，没有方向的航行，是会误入迷途。”后来，罗荣桓又在给罗东进的信中说：理论必须联系实践，离开了实践，就会成为空谈，成为死的东西。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也不要只满足一些现成的语句或条文，最重要的是了解其实质与精神。所谓带着问题去学毛主席著作，决不能只是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事物是多样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成万应药方。

九月，中央决定免除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由林彪继



任，并组成新的军委。罗荣桓为军委委员，分管民兵建设。

十月二十三日，罗荣桓和徐向前在北京地区视察了炮兵、装甲兵部队，对炮兵、装甲兵训练成绩和车辆器材维修保养工作表示满意。

十一月二日，罗荣桓和叶剑英同志视察空军部队。

十一月二十三日，罗荣桓主持起草了军委《关于民兵工作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报告认为，首先要提高全党全军对民兵战略地位的认识。民兵工作要普遍发展，重点应放在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工矿重点、交通枢纽地区和海陆边防地区以及沿海岛屿。省军区、军分区要把民兵工作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民兵的训练方针应贯彻军事、政治并重。要重视民兵干部的选拔培养，健全民兵领导机构。报告解决了民兵工作一系列的重要问题。十二月十四日，中央批准了这一报告，转发全国执行。

十二月，罗荣桓到安徽、上海等地视察。他在听取当地有关领导同志汇报时指示，要重视做好民兵工作。他说，最容易体现人民战争的就是民兵，我们过去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就是靠民兵。将来在新条件下的战争也要靠民兵。现在我们搞全民皆兵是很重要的战略问题。省军区、军分区要以绝大部分力量搞民兵工作。民兵的组织形式一定要适应生产需要。光强调军事化，不要民主化是不对的，整顿民兵工作一定要结合生产，结合学习。

十二月，中央军委建立民兵工作小组，罗荣桓任组长。二十五日，在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罗荣桓指出，战争主要

靠两个方面：一是物力，一是人力。物力要靠国家的工业化，人力主要靠积蓄兵员。我们发展民兵，做到全民皆兵，后备力量就大了，不管敌人从哪里来都是全民防御网。做好民兵工作，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把民兵建设提到战略问题的高度。第二要解决方法问题。民兵在工厂、农村以生产为主，在学校以学习为主。训练只能在生产、学习、工作、体育中间去搞。过去民兵的三大任务，只提保卫生产不提参加生产，这是方向问题。

### 一九六〇年（五十八岁）

一月，罗荣桓指示《解放军报》要宣传毛泽东思想，提倡干部通读毛主席的著作。在宣传上不要简单化、庸俗化。要提倡全面地系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

二月，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罗荣桓在会上发言说，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贯串着一个基本的思想即人民战争的思想。这只有在大搞民兵的基础上实现全民皆兵的方针，才会实现。在现代条件下不仅没有削弱人民战争，而且提高了对人民战争的要求。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就是要把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武装民兵、非武装群众很好地结合起来。过去如此，将来仍然如此。因此在战争准备上和兵力部署上，把民兵纳入整个作战计划之内，才是真正领会了新的战略方针所体现的人民战争思想。他还讲了如何加强民兵建设的问题，提出大搞民兵是战略任务，是全党全军的任务。

二月七日，总参动员部部长傅秋涛向罗荣桓汇报民兵

工作。罗荣桓指示说，城市民兵工作是最薄弱的一环。城市工矿地区是敌人打击我们的突出点。战争一起来，动员最快最有效的是城市。因此应抓好城市民兵工作。他还指示，民兵训练要依靠群众，土洋结合，指标不能太高。首先是普及，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

二月二十五日，在傅秋涛汇报民兵代表会议筹备工作时，罗荣桓再次强调，要把城市民兵工作抓住，海岛的民兵工作也要搞好。在海岛要注意把军民联防和坚守岛屿工作搞好。要搞好生产为将来战争打好物质基础。

二月二十六日，罗荣桓召集各军区主管民兵工作的领导同志座谈。他强调要特别注意工作方法问题，要脚踏实地的做工作，确确实实地为战争做好准备。

四月十八日，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开幕。罗荣桓致开幕词。

四月二十九日，罗荣桓在民兵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他肯定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开得成功，使大家对民兵工作的认识提高了一步。今后从应付战争需要出发，民兵工作要以岛屿、海防、边防、工矿、城市作为重点。要抓紧基干民兵建设和干部培养。民兵训练要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要和生产结合而不要妨碍生产。

六月，罗荣桓两次找总参动员部负责同志谈话。指示他们要注意民兵工作的工作方法。他指出各地抓民兵干劲很大，但工作方法尚未完全解决。有的强调正规化，机械地搬用部队的一套，搞集中脱产训练，影响劳逸结合，加重群众负担，这个问题必须注意解决。民兵训练的方法要生动活泼，注意劳逸结合，坚决反对形式主义，主要搞些

有实际内容又与本行业务相结合的训练活动。

十月，政治学院《思想战线》杂志创刊。罗荣桓题词：“要提高马列主义理论，必须联系实际，避免无的放矢。毛泽东的著作是我们学习的最好典范，应以此为指导，搞好思想战线同教学相结合的任务。”

九月至十月，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罗荣桓因病没有参加会议。

十月二十七日、十一月二日，罗荣桓对晋冀鲁豫辽五省和北京市民兵工作座谈会做了两次指示。他说这五个省是重灾区，如何做好灾区民兵工作是很重要的问题。在灾区停止民兵训练并不等于不进行民兵工作了。要在民兵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进行以农业为基础，增产节约，正视困难，克服困难的的教育。民兵工作要结合中心、服从中心工作；要了解地方情况，了解群众思想动态，了解中央和地方党委的指示，这样才能做好民兵工作。

十月二十八日，罗荣桓在政治学院干部会上，讲了贯彻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的问题。他指出，决议的基本内容还是古田会议的东西，但有发展。政治学院讲部队政治工作，就要以古田会议决议、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决议，还有延安留守兵团政治部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为依据。要列入教学计划，每期都要学这个内容。

十二月十二日，罗荣桓解答了山东地区抗日战争战史编写工作中遇到的若干重大问题。

十二月，罗荣桓在政治学院党委扩大会上讲话，提出



要以毛泽东著作和党的路线政策为主要学习内容，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要采取“一条线五结合”的原则，系统地、完整地学习毛泽东思想。一条线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党史为线索。五结合就是学习毛泽东著作和选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相结合；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与军队建设相结合；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学习党的路线、政策、决议相结合；通读和专题研究相结合；经常性理论教育和政治运动相结合。

十二月，在林彪的指使下，错误地批判了谭政。

### 一九六一年（五十九岁）

一月，中央决定，罗荣桓任总政治部主任。肖华、谭政、刘志坚、徐立清、梁必业、傅钟、甘泗淇为副主任。

一月，罗荣桓同志指示，当前民兵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纯洁内部，掌握好武器，加强军分区和武装部的工作。他强调说，民兵搞好了是地方之福，人民之福，搞不好就要闹大祸。根据他的指示，军委办公会议于十二日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单位认真研究情况，对民兵工作做出具体安排。整顿组织，纯洁队伍。彻底清查民兵武器，加强管理，保证一枪一弹都掌握在可靠的民兵手里。严格控制民兵的使用范围，任何时候都不准使用民兵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罗荣桓同志在总政治部党委会议和党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他强调军队政治工作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注意到群众中、实践中进行调查研究，把读书和调查研究结合起来，而不是死读书本。对总政今后的工作，他要求要以党委为核心，个

人分工负责，发挥大家的积极性，要面向连队，面向基层，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

二月一日，罗荣桓和团中央书记胡耀邦一起接见全军青年工作会议代表。罗荣桓对代表们说：毛泽东思想是政治工作的方向，也是青年工作的方向，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青年的头脑。组织青年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方法是进行党的传统教育，使青年把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

二月，罗荣桓和贺龙一起到南京、福州部队视察工作。他们听取了各级领导干部的汇报，和群众广泛交谈，对如何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二月七日，罗荣桓对驻沪部队说，在战士中不要划类，把若干战士划为落后分子没有好处。政治干部特别是连队指导员一定要与战士有浓厚的感情。战士心里有话要敢向指导员讲。如果战士有话不敢讲，只能说明我们工作没有做到家，所以落后不在于战士而在于领导。二月十日，罗荣桓在杭州指示部队要抓连队，不抓连队，工作就是建在沙滩上。连队指导员摸熟战士思想才能对战士教育。现在连队工作是复杂的，要帮助指导员去抓问题。十四日，他在福州指示省军区、军分区都要大抓民兵工作，整顿民兵组织一定要与整社紧密结合。二十四日，他在江西省军区的座谈会上，强调要服从生产建设，结合中心，搞好民兵工作。二十五日，他在南昌步校指示，学校教育必须与改造思想相结合。

三月上旬，罗荣桓在长沙先后接见了第一政治干部学校和工程学院负责人。他指示学校要做调查研究工作，针对部队情况，分别对象，联系实际进行教育。现在部队有些指导员主要缺两条：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和用群众路线

的方法做工作。学校要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三月二十日，罗荣桓指示各总部和大军区要有两套领导办法，一套对野战部队，一套对人民武装工作，根据不同性质的任务，提出不同的要求。各省军区、军分区必须明确自己的任务是民兵工作，在布置和转达上级指示时一定要结合自己的情况。照本宣读，比着葫芦画瓢的懒汉做法，必须纠正。

四月，军委召开民兵工作专业座谈会。会议期间，罗荣桓三次召集有关同志谈话。他说，民兵工作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细致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只大轰一下，实际上并不落实。所以要组织工作队去参加地方农村工作，参加生产救灾，参加整风整社，摸清民兵的情况，整顿民兵组织，在三年之内把民兵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部队广大干部战士听到和看到地方上搞大跃进的一些过左的现象；部队派出的大批工作队，深入农村，抓民兵建设，也发现了地方工作的一些问题，因此部队议论很多。罗荣桓指示：军队了解到群众对地方工作的意见，可以按军队组织系统向上级反映，由团以上的领导机关向地方提出。林彪发现此事以后，却说什么“军队不应插手地方工作，不要给地方增加压力”。把罗荣桓的正确意见否定了，并且在罗荣桓逝世以后，还作为他的一条“罪状”，对他进行迫害。

四月三十日，第二十六次军委常委会讨论《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时，罗荣桓当着林彪的面说：“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还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主要是学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在这前后，罗荣桓还曾多次反对林彪将学习毛主席著作庸俗化、简单化的错误作法。邓小平主持

中央书记处讨论此问题时，支持罗荣桓的正确意见。林彪因此对罗荣桓怀恨在心，极力打击和贬低他。直到罗荣桓去世以后，在十年动乱期间，林彪还把此事作为罗荣桓“反对学毛著”的罪状。

五月四日，罗荣桓接见总政机关全体共青团员和他们一起欢度青年节。他指示，青年同志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学好。

五月十八日，罗荣桓在全军管理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他指出在经常的思想工作中，在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时，不能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这样的办法。应该搞得细致一点，和风细雨，细水长流。对于思想错误要具体分析性质、根源，要看一个人的本质，不要把每一句话、每一个现象都罗列起来，不要采取围攻的形式，在思想批判中不要硬去找重点。

六月六日，罗荣桓和政治学院领导干部谈话。他说，要正确认识大跃进以来的形势。总路线是对的，问题是在执行中间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大跃进也要有一定条件，没有止境也不行。出现的问题，中央已承担责任，但执行中的问题也不能都说是中央的责任。社会主义道路不是现成的，要有一个实践摸索的过程。对于群众中的认识问题要做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是长期的、细致的，不可能速战速决。抓住几句话一下给压下去，思想问题就敞不开。我们要进行正面教育，正面讲道理。最近几年搞运动，动不动就是大字报，是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一定要把思想工作做好。

六月二十二日，罗荣桓在解放军党的监察委员会第三



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他提出，维护党内民主是当前监察委员会的中心工作。对待党内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不能凭个人感情、个人好恶出发，更不能打击报复。有些党的组织就听不得反面意见，只强调执行纪律，不强调有提意见的自由，这样就出现了党内斗争不正常，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现象。维护党的民主也就是维护党的纪律。处分党员要慎重。对于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要用批评教育去纠正，用纪律处分的方法去压服，也是简单粗暴。不要拿一点错误就否定一个人的一切。做结论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入情人理，一字一句都要慎重。

七月十八日，军委民兵工作组扩大为人民武装委员会。罗荣桓主持委员会的工作。他在成立会上讲话说：建立人民武装委员会，这是恢复过去的老传统。因为人民武装工作是全民性的，工农青妇都要有。几年来，民兵工作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工农青妇都出了很大力量，做了许多工作。但由于过去民兵组织与生产组织混在一起，误认为生产组织就是民兵组织，造成了民兵组织的不落实，同时也发生了一些强迫命令。今后要抓组织落实，解决干部问题，每年结合生产整顿一次民兵组织。

八月五日，罗荣桓为新创刊的《解放军报民兵专刊》题词：“加强民兵国防教育，把民兵组织落实在生产基层中。”

八月，罗荣桓和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几个青年学生谈话，教育他们要又红又专。他说：“你们这些人的政治任务就是要专，要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的专家。红不是空洞的东西，而是要落实到实际工作和斗争中去，对你们学习国防科学技术的人来说，就是要落实在专业上。谁要是真

正的红，谁就应当成为一个真正的又红又专的专家，为我国的国防工业作出一些贡献。”

九月，在全军保卫、检察、法院工作会议期间，罗荣桓对当前保卫工作问题做了两次指示。他指出，认为没有反革命了是不合事实的。但军内暗藏的反革命总是少数，坏分子和右派也是少数。目前要特别注意正确区分两类矛盾，要防止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不要搞得草木皆兵。矛盾性质难以分清的问题，可以先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保卫工作干部要提高政策思想水平，走群众路线，讲究工作方法，还要有坚持真理的精神。

九月十四日，罗荣桓在全军院校政治教育会议上讲话，指出学校工作成绩很大，但还有问题，教学工作上还有一般化的毛病。对于所谓“抓活思想”的问题，他说抓活思想是一种形象的说法，现在有人认为抓活思想就是就事论事，这是不正确的，那叫抓鸡毛蒜皮。应该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立竿见影”也是个形象的比喻。要强调积极改造思想，不是要求立刻就把一个人的思想改造好，思想改造当然是个比较长期的过程，不是那么容易的。闻风而动的作风很重要，但捕风捉影，听风是雨，弄得很紧张就不对了。关于红与专的问题，红要带领专，要保证专的实现。不应当只强调红不强调专。专业技术学校不用更多时间学习专业就专不了。学校领导要突出教学中心，一切工作都要围绕教学去做，为教学设想，不要妨碍教学。

九月二十八日，罗荣桓在全军文化工作会议上讲话，他

认为，部队的文艺工作是执行了中央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做了很多工作，起了很大作用的。他强调艺术一定要从生活中吸取营养，如果脱离生活，脱离实际，就没有根基，不会受群众欢迎。不要把艺术神秘化，政治工作者应该懂得艺术，文艺工作者应该懂得政治。文艺与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文艺是意识形态的东西，阶级性非常强烈，与政治分不了家。要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他要求部队文艺工作者要多反映军队生活，反映我军的光荣历史。为此，就要很好学习军队的历史和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建军原则。还要注意开展部队业余文娱活动，这是部队文艺工作的基地，也是文艺工作的后备力量。

十月，总政治部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十月三十日，罗荣桓陪同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接见了到会全体同志。十一月四日罗荣桓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关于连队“四好”运动问题，他提出四好的关系应该是思想领先，作风带头，训练落实，生活保健，今后四好连队运动要求落实、巩固和提高。红与专的问题，要落实在专上，只讲红不落实在专上也是空的。从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书本知识，尤其在院校要多读一点书，问题是如何结合实际去运用，不能怕人家读书。他还讲了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政治工作问题，特别是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他说，“有人问现在院校和科学机关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革命知识分子。我说一律算为革命知识分子。他们已经跟着党走了，已经参了军搞尖端，什么理由还要讲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要是从思想情况出发，不要去强调那个成分。”他还

要求科研部门政治干部的工作方法要来一个改变，不要瞎指挥，不要不懂装懂，那些尖端部门的技术问题，就是要尊重专家，向专家学习。

十一月，总政治部根据聂荣臻提出的科研工作政策和罗荣桓的有关指示，发出《关于加强国防 科学研究机构政治工作的指示》，明确科研机构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要保证提供新的科研成果和培养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人才。指示中还规定了许多重要的方针原则。要求保证科研人员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研究工作。在科技问题上首先由科技人员负责。科技人员应该又红又专。对他们的红要承认差别，有所不同，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为国防事业服务就是达到了红的初步要求，对有的人只要他们有爱国心，也要很好团结使用。今天我们的专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专的不是太深而是太浅，钻研科技的积极性是阶级觉悟提高的具体表现，应该爱护和鼓励。要鼓励不同学术见解的自由探讨，既鼓励集体研究也鼓励个人研究，互相结合，互相支持。党支部不要包揽技术业务，尤其不应在科技工作中瞎指挥。要改进思想工作，思想问题只能说服，不能压服。

十一月十五日，罗荣桓在全军组织部长会议上做指示，他强调组织部门的任务主要是抓党的组织建设，那种认为“组织部门就是管中心工作(四好运动)”的提法是不对的。组织部门必须紧紧抓住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否则就失去了工作中心。连队工作靠党支部的领导，党支部搞好了，中心工作才能搞好。党的建设主要应该抓好：加强党的教育提高党员质量；健全和活跃党的生活。他要求组织部门的干



部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建党学说，加强党性修养，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锻炼，发扬党的传统作风，成为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组织原则的模范。

### 一九六二年（六十岁）

四月二十九日，罗荣桓指示动员部对城市民兵工作要狠狠抓一下。他说，战时动员，真正快的还是城市。因为在城市，工矿、学校很集中，有工人阶级。要抓好几个城市，总结出经验来。工作重点还是放在基干民兵方面，以基干民兵带动普通民兵。

五月，蒋介石企图窜犯我东南沿海。根据罗荣桓的指示，总政治部以主要力量进行了准备粉碎蒋军企图的战备政治工作。六月初发出战备政治工作指示，并派出得力干部深入前线部队帮助工作，保证了部队以高昂的斗志，迅速由平时转入临战状态。

六月三十日，罗荣桓指示动员部要抓好民兵的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政治落实不仅是个思想教育问题，民兵的组织性、纪律性、社会治安等问题也是政治落实的问题。当前民兵工作重点除了东南沿海地区的工作外，要强调抓好城市民兵工作。

七月十一日，罗荣桓对山东地区抗日战争战史的编写工作再次作了指示。他说：山东当时的争论主要是以我为主的问题。以我为主，要以充分发动群众作基础。另一个主要争论是分散游击战还是运动战的问题。还有一个是统一领导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能保证山东抗日战争的胜利。

十月十日，罗荣桓主持召开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他指出民兵工作成绩很大，东南沿海紧急战备是一次很大的考验。他还说，民兵工作一定要靠党的农村政策的贯彻。农村民兵工作，实际上就是农民问题，农村政策搞好了，民兵工作就搞好了。民兵工作三落实也要落实到以农业为基础上去。抓中央发展农业的方针政策，这样在政治上就有了目的。

十一月，总政召开全军组织部长会议。罗荣桓对如何开好这次会议做了指示。他要求组织部门要用相当的力量搞好工作薄弱的支部，要在总结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加强党支部建设，反复落实，巩固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要经常化，不要搞突击；不要强调数量，而要强调质量，要从积极教育培养入手。党委建设也要好好抓一抓，着重解决民主集中制、原则空气、团结这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党委内部要互相谅解又要互相监督，坚持按原则办事。组织部门要如实地向党委反映情况，发现原则问题要敢于讲话，要有勇气。他还强调要重视党员干部的道德品质问题。对于严重道德败坏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干部，一定要严肃处理。

十二月十日，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时，罗荣桓指示，少数民族地区的民兵工作必须放在民族政策和民主改革的基础上。对民兵工作的要求应区别不同的地区。民族政策的贯彻，民主改革要经过一个时期，不能要求过急，一定要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民兵工作要做好，可先组织起来不发武器。能掌握武器的可以发一点。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民兵中提出保卫胜利果实，保卫生产，保卫社会治安的口号，这样也就巩固了后方，保卫了边疆。

## 一九六三年（六十一岁）

二月二日，总政治部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讨论继续狠抓基层和创造“四好”连队问题。十六日罗荣桓在组长会议上讲了话。他强调对连队工作要抓住不放，创造“四好”连队要反复落实，逐步提高。他着重讲了加强党委工作的问题，主要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他说，民主不仅表现在会议一种形式上，有时开会也不能说明就民主了。问题是个人说了算，还是大家说了算。开会应该事先有酝酿，会上充分交流意见，听取和吸收大家的意见，这样民主就广泛了。党委内部既要加强团结又要坚持原则。

四月二十一日，罗荣桓指示有关部门，在城市的民兵工作中，无论学校和工厂都要在不妨碍教学质量和生产质量的前提下进行。

九月二十八日，罗荣桓病重住院。在入院之前还嘱咐总政治部全体干部要通读《毛泽东选集》，学好毛泽东思想。

罗荣桓在住院期间，虽然病情严重，但他始终坚持同疾病作斗争，积极配合治疗，尽量不麻烦医护人员。只要病情稍为稳定，他就和青年医护人员谈话，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和工作。有一次他谈起护士工作说：“在医疗战线上，护士打的是第一线，这项工作需要细致、耐心、热心，没有高度的政治觉悟那是不行的。我看，如果把这项工作做到了家，确实是了不起的专家。既是战士，又是专家。”在病危以后，呼吸已感困难，他仍然关心着国家大事。在逝世前一天还询问周总理出国访问的情况。政治学院的领导同志来探望他，他拉住这些同志的手说：“我的身体恐怕

不行了，一定要把政治学院办好。”弥留之际，他嘱咐林月琴：“我死之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又告诉子女说：“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十二月十六日下午二时三十七分，罗荣桓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罗荣桓逝世的当天，聂荣臻向正在开会的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报告了这一不幸消息。毛泽东提议到会同志起立默哀。毛泽东说，罗荣桓同志逝世了，一个人数十年如一日，忠于党的路线，很不容易啊！

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向罗荣桓遗体告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讣告。讣告说：“罗荣桓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罗荣桓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并且最善于联系群众和团结干部。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革命化的建设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爱戴。”中央号召“学习罗荣桓同志的优秀品质和革命精神，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团结一致，为反对帝国主义，为加强我国的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同一天，中央军委也发出悼念罗荣桓的通知。这一天，当时处在被监视地位的彭德怀，冲破了阻挠，亲临北京医院，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而林彪却借口身体不好未去。





十二月二十二日，首都各界一万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公祭罗荣桓。刘少奇主祭，邓小平致悼词。悼词说：罗荣桓同志在他光荣的一生中“数十年如一日，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持战斗，坚持工作，鞠躬尽瘁，忠心耿耿。”“他始终坚定不移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站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方面，坚决维护党的利益，维护党的团结，反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度原则精神。”“罗荣桓同志在一生的工作和斗争中，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人民革命军队的作风。他从来相信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最善于动员组织群众和依靠群众，最善于团结干部。他对革命胜利具有无限的信心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论是在艰苦战斗的岁月里，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总是和人民群众和广大士兵同呼吸共命运，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贵品质。”“罗荣桓同志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将永志不忘。他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伟大的革命斗争精神和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永远值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

全国各中央局、各军区都集会沉痛悼念罗荣桓逝世，并表示要学习罗荣桓的优秀品质和革命精神。

毛泽东写诗《吊罗荣桓同志》：“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朱德于一九六四年一月也写诗《悼罗荣桓同志》：“起义鄂南即治军，忠诚革命贯平生，身经百战摧强敌，留得丰功万古存。”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六辑

作者 =

页数 = 1 0 0 0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